

# 炎黄春秋



1990年，叶剑英在珠海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马万祺先生

叶剑英与马万祺谊深情笃

察北抗日同盟军被葬送的悲壮故事

为争取湖西“肃托事件”  
彻底平反的郭影秋

于光远：北平沦陷前后的一段难忘经历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  
赔款的来龙去脉

高树勋率部  
起义亲历记



郭影秋

9  
95

# 为世妇会献上炎黄赤子一片心



《百花赞》长卷

贊之百

大筆  
墨  
是  
白  
花  
絕  
中  
一  
枝  
風  
松  
圓  
朱  
一  
枝  
雲  
居  
千  
面  
不  
小  
畫



《孔雀展翅 百花爭榮》长卷局部

孔雀展翅  
百花爭榮

老舍書  
在  
北  
京  
國  
立  
大  
學  
作  
畫  
時  
所  
作

# 本期导读

## 察北抗日同盟军被葬送的悲壮故事

1933年5月，冯玉祥在中共党员的影响下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很短时间便拥有十万兵力和十万支枪。正当这支队伍对日寇屡战告捷之际，蒋介石为“防止赤祸蔓延”，下令对抗日同盟军进攻；当时中共察哈尔前委执行“左”的政策，使冯玉祥的处境更加困难，冯玉祥被迫下野，一支轰轰烈烈的抗日队伍，凄凄惨惨地被中国人自己搞垮了。

## 为争取湖西“肃托事件”彻底平反的郭影秋

发生在1939年的湖西“肃托事件”，40年后才得以彻底平反。在我们总结其历史教训之际，绝不能忘怀每一个坚持原则，仗义直言，为还历史原貌而不懈努力的人。

## 叶剑英和马万祺谊深情笃

“人生贵相知”，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和叶剑英有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交往。马先生酷爱诗文，更喜欢叶帅的诗词，两位可说是心曲相通。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血与火的考验，患难中铸下的友情就更为动人了。

## 北平沦陷前后我的一段难忘经历

卢沟桥的枪声打响，22岁的于光远准备“为保卫北平流最后一滴血”，后被党组织调到保定去建立民先临时总队部，并致力于发动河北游击战争。一路上历经惊险，进入保定后没休息就开始工作；紧接着又按照彭真的指示去石家庄、太原，在太原见到周恩来……。这是抗战初期一个革命青年难忘经历的实录。

## 文革后期被扭曲了的报人办报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一切，也破坏了报纸的正常出版。中国的有些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人不知道，办报的人不知道，只好向北京、上海、湖南、江西……挂长途电话，询问，猜测，推理，对版面，依照葫芦画瓢。真是发人深思啊！

##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使中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寻觅历史轨迹，探索个中缘由，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但愿中华民族能够团结一致，日益强大，不给他人以可乘之机。

## 轰动天京的“杖责天王”事件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在揭起义旗之初，领袖卓尔不群，将士同心戮力；而一旦步入太平，则不免堕入腐化。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也未能摆脱这一局面，因而在定都天京后，发生了杨秀清规劝天王洪秀全的“杖责天王”事件。

## 盛世天子李隆基与“救时之相”姚崇

在大唐内乱的阵痛后，李隆基践登王位，立志政道惟新，开一代新纪元；三朝老臣姚崇捐弃前嫌出山辅政，君臣虽亲密无间，但又不以私情而枉法。由此可追寻出一代盛世创立的深层原因。

## 下期要目

- △周谷城：要正确对待民国这段历史
- △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
- △用中国人的脊梁保卫大武汉
- △抗联总司令赵尚志的壮曲悲歌
- △“政治夫人”李德全
- △为包产到户拼搏无悔的周日礼
- △周恩来与国民党杀手张冲
- △红军总供给部长乌兰巴托讨饭记
- △柳亚子和毛泽东的诗交

##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契青 费孝通 谢冰心

##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徐 孔 洪 炉  
丁洪章

执行主编: 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李华鹏 贝兆汉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 编: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5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016633-227

6076801

定 价: 3.20 元

## 求实篇

④ ⑩ ⑩ 「文革」后期被扭曲了的报人办报  
④ 为争取湘西「肃托事件」彻底平反的郭影秋  
④ 察北抗日同盟军被葬送的悲壮故事

陈 英 茨  
王 俊 义  
林 里

## 春秋笔

②② ②⑥ ②⑨ ③⑦ ④⑥  
②② 叶剑英与马万祺谊深情笃  
②⑥ 宋庆龄与三个美国友人的交往  
②⑨ 高树勋率部起义亲历记  
③⑦ 北平沦陷前后的一段难忘经历  
④⑥ 李汝泰三进虞城的传奇故事

范 硕  
唐 宝 林  
吴 景 略  
于 光 远  
杨 步 胜



# 目 录

| 信息窗                     | 古镜台                        | 人海浪                        | 文荟苑                                                   | 争鸣录                        | 古今谈                                                                                     | 殒星篇                                                        |
|-------------------------|----------------------------|----------------------------|-------------------------------------------------------|----------------------------|-----------------------------------------------------------------------------------------|------------------------------------------------------------|
| ⑧6 为世妇会献上炎黄赤子一片心……………吴塘 | ⑧3 盛世天子李隆基与「救时之相」姚崇……………艾子 | ⑧0 长眠于斯里兰卡的女外交官陈依弥……………宗道一 | ⑦8 辜鸿铭：清末民初一怪才……………李宝奇<br>⑦4 热心引进西方文化的清末巡抚徐继畲……………任复兴 | ⑦1 唐浩明撰写《曾国藩》为曾国藩正名……………潘荻 | ⑥9 感慨的余音——读孙犁同志的一则随笔以后……………李冰封<br>⑥5 轰动天京的「杖责天王」事件……………魏文华<br>⑤9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梁文 | ⑤4 太行《新华日报》社长何云殉国记……………戈基<br>⑤2 团成砥柱止中流——朱德在临汾抗敌前线……………张文和 |

# 察哈尔 抗日同盟军 被葬送的 悲壮故事

● 陈英茨

1932年到1933年，中国华北发生了一件以轰轰烈烈开始，凄凄惨惨结局的可歌可泣的大事，即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事件。那时，日寇占领了东三省和热河省，逼进察哈尔省和长城一线，华北告急。当时蒋介石集团先安内后攘外热衷剿共，镇压抗日运动。另一面，国内尤其华北人民对日寇的进迫，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结束内战，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中共爱国人士的策动下，威信极高的冯玉祥将军振臂一呼，号召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赴察哈尔前线，对日作战。四面八方的抗日爱国志士便踊跃汇集到冯玉祥武装抗日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中间起了极大的组织作用甚至中坚作用，几个月时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便组织起来了，拥有十二万兵力、十万条枪支，可说轰轰烈烈。但是正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寇屡战告捷之际，蒋介石集团勾结日寇，直至出兵捉拿冯玉祥，进攻这支真正抗日的武装部队。在这支部队中工作的一些中共党人，尤其那个柯庆施积极执行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要将队伍拉到河北省南部建立苏区……，对这支抗日武装部队采取了分裂、破坏的方针，起到了日寇和蒋介石集团想做而做不到的作用。冯玉祥领导的这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便彻底失败了。冯玉祥被迫下野回到泰山，中共党人方振武、吉鸿昌等人被蒋介石集团杀害。



冯玉祥将军

当时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老同志，这些年陆续写了一批回忆文章，近年来文史工作者整理出一批珍贵资料。笔者也查阅过有关档案，访问了若干亲历者，草成此文。

##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怎样成立的？

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退隐到山西省汾阳县界峪道河村，一面读书，一面同反蒋势力李济深、李宗仁等秘密联系，还派他以前的交际处长赵彦卿牧师长住北平，了解国内外的动态。

1931年秋，中共中央特科的陈康，让曾担任过中共北平市特别支部书记的吴成方，组建华北政治保卫局，吴通过张祝唐结识了赵彦卿，从而和冯玉祥接上了关系。吴成方那时知道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连发两电，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径，并号召从速组织代表民意之机关，团结全国民众力量，一致对外，并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抗击日本之侵略。吴成方便想同冯合作共同抗日。

冯把同反蒋爱国势力的往来书信和电报密码等转交给了吴成方，还提出捐献一笔经费，吴把这些呈交了特科。赠款事则请冯直接交付中共中央。于是冯便去上

海，中共中央收下了这笔款。但当冯提出合作抗日时，当时的中共中央却提出冯必须“打红旗”，冯认为方案不现实，难于接受。

冯回到汾阳后请吴成方来一趟。吴想到了肖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奉党派遣同邓小平、刘伯坚等回国，去冯的西北军工作过。吴便让肖代他前往。行前，吴成方根据陈赓转达的周恩来的指示，商定了与冯玉祥合作抗日的几条方案。同冯一谈，冯非常赞成。之后，冯为动员自己旧部、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抗日，便从汾阳移居山东泰山。

1932年9月，奉军刘翼飞旅调离张家口，同时卸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继任察省主席，冯便于同年10月9日离泰山去张家口。

冯玉祥到张家口后，吴成方又让肖明去张家口，商谈了筹组抗日同盟军事宜，并派吴化之、武止戈、张存实、许权中等到张家口，建立了中共特委，由吴化之负责。特委一方面协助冯玉祥组建同盟军、领导军中的中共组织，同时领导地方上中共党的工作。不久，又派张金刃（走时改名张慕陶）去同盟军、派刘仁（化名王崇义）去任张家口市总工会任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1月3日，侵占了东三省后的日军，又突然侵占了山海关，然后分兵三路，向我热河省进攻。

日寇占领热河后，3月11日又向长城沿线挺进。宋哲元、冯治安等部奋起抗击，从喜峰口到罗峪口长城全线，一周间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这就是当年威震一时的“长城抗战”。

1933年3月20日，蒋介石飞抵北平，下令禁止抵抗。并于5月31日，令何应钦与黄郛同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当时我国在华北的军队有30多个师共30余万人，日军则只有3万，如果不是蒋介石频频不抵抗，我军是完全可以击败日寇进攻的。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军民的愤慨，一些爱国军人和志士，得知冯玉祥组建抗日部队，便纷纷来归。如原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率他的旧部鲍刚和张人杰两个师，挥戈北上张家口。中共内蒙特委书记陈镜湖，组织了“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号召蒙汉青年参加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变卖了在天津的家产，携款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在山西省汾阳军校的3千余师生，在校教育长、共产党员尹心田率领下也赶来张家口，改编为抗日同盟军一个师，曾担任过骑兵师长的张砺生，从南方归来也组建起军队加入抗日同盟军。从东北退入关内的抗日义勇军冯占海、邓文、李忠义、富春、汲汲东以及热河的地方部队姚景川等，也全都率部来归。

真是冯玉祥振臂一呼，抗日大旗一立，四面八方的抗日志士便汇集到抗日同盟军的麾下。到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举行隆重而盛大的成立大会时，已有官兵12万，枪10万支。

在成立大会上，冯玉祥就任总司令，邱山宁为总参谋长，张允荣任政治部长，徐继烈任副部长，（为便于我党在总司令部协同工作，冯玉祥委张慕陶为政治部实际负责人，但名单不公布）。

各军负责人为：

第一军军长佟麟阁，参谋长何章海，下辖两个师。

第二军军长吉鸿昌，参谋长崔贡琛，下辖四个师。

第四军军长米文和。

第五军军长阮玄武，下辖两个师。

第六军军长张凌云，副军长徐福胜，下辖两个师。

第十八军军长黄守中，下辖五个师。

第五路军总指挥邓文，下辖三个师。

第六路军总指挥刘桂堂。

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

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参谋长傅同善，下辖两个挺进军，第一挺进军司令雷中田，第二挺进军司令高树勋。

察哈尔自卫军：军长张砺生，先成立了三个师，两个支队。

蒙古军：第一军军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第二军军长卓特巴扎普。自卫军军长富龄阿，下辖三个师。

另外还有一个教导师，师长王中孚。四个独立团，一个卫队团。干部学校，校长张克侠，下设军官大队、军士大队和学生大队。

同盟军还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共有委员35人，候补委员29人，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担任常委、冯玉祥为军委主席。

会上，冯向全国发出通电，称：“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之后，冯宣布解除代理察省主席佟麟阁职务，委佟麟阁为察省主席，委吉鸿昌为察省警备司令兼公安局长，张砺生为副司令，下令逮捕了原察省公安局长，派兵查抄了察省国民党特务机关蓝衣社的“张家口骡马补充所”。

在此之前，中共特委还成立了“察哈尔省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创刊了《抗日阵线》报，这一会一报，在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日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吴成方、肖明和特委与同盟军的合作，使冯深受鼓舞。冯说，我同共产党合作，力量强大起来，与共产党分手，被蒋整得损兵折将，势孤力单。并且赞扬共产党

人有能力，讲信义，不但予以重用，参与决策，还界以兵权。中共的同志们则以为，共产党人无一兵一枪，如果没有冯的巨大号召力，不会有这样众多的人来归。

## 柯庆施到达张家口

同盟军发展壮大，亟需大批我党的干部，吴成方便于三月去上海，请中央速派大批得力干部去同盟军。他送上书面报告后，久不见答复。他催了几次，中央仍未派人接见他，一个多月后，他只好返回北平。

当时，北方有党中央代表石心（孔原），代表处还有全总代表饶漱石、军委代表柯庆施等。吴成方向饶讲了抗日同盟军情况和需要干部之事。饶说他可以介绍一位游击专家去，不久，饶带来游击专家同吴见了面。吴成方向他们介绍了我党与冯玉祥的协议要点：即一只提抗日，不提打倒英美等其他帝国主义；二是反对蒋“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提打倒蒋介石及其政府；三是争取地方势力和军队的支持与合作；四是共产党员“不露红”，荫蔽在关键岗位，领导同盟军。饶和那位游击专家都表示赞同。此后，吴才知那位游击专家就是柯庆施。

五月中旬，柯庆施按吴介绍的关系到了张家口，自称姓张，他鼻子大，人们便呼他为“张大鼻子”。随后，柯经河北省委同意，另建了前线工作委员会，柯任书记。并从河北省委调来一批干部。柯的势力强大以后，在当时中共中央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柯庆施便积极执行了一套“左”的方针，组织上则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排斥打击。特委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吴成方，吴让饶告知柯不要违背同冯达成的协议，柯则向上级指责特委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诬告吴成方要搞“第二党”。吴成方意识到柯庆施是不让他再插手同盟军的事了。

柯庆施不信任冯玉祥，认为冯玉祥是一个军阀，冯玉祥执行的方针是同蒋介石妥协。于是在同盟军正式成立的第二天即5月27日，即用御侮救亡会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党内传达说是“反妥协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时，组织群众捣毁了国民党察省党部，赶跑了工作人员，砸烂了国民党铁路支部和黄色工会。电灯公司工人纠察队联合汽车公司工人捉拿和斗争了公司经理。把日商“西北拍卖行”捣了个稀巴烂。紧接着命令“抗日阵线”报停刊，另出“老百姓报”，委派陈伯达任主编。《老百姓报》按“左”的一套方针进行宣传。当5月25日党中央发出的《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送到前委后，柯庆施更按其中讲的《与日本

强盗作战，与万恶的卖国的国民党作战》的号召，大量宣传与国民党作战，还布置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处贴标语、散传单，把张家口搞了个“一片红”。这样一来不但使国民党特务获得大量情况，也引起了察省抗日同盟军官兵的疑虑。

久与蒋介石打交道的冯玉祥，深知蒋介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地方势力、杂牌军甚至土匪武装，但决不能容忍共产党，他一旦得知共产党在同盟军中的活动，必然借口“剿共”进攻同盟军。因此，冯玉祥在大会小会上讲，一定要注意“不露红”。他说，你们参加同盟军，抗日救国，很好。不过，你们还比较幼稚，还不够老练。我们要争取更多的朋友，而不可过多的树敌。譬如对国民党，最好是实行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而不要实行皮红肉不红的“红萝卜政策”。

其实，“不露红”还不单单指对国民党，也还指对冯玉祥的部下。冯玉祥知道同盟军的成份非常复杂，有些人跟着他抗日救国可以，要让他们跟着共产党走，听从共产党的指挥，是不会同意的。因此，他经常告诫共产党员要十分注意荫蔽。

但前委和一部分党员对冯的意见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在告诫和教育无效以后，迫使得冯不得不对一些过火行动加以限制和禁止。因此，柯庆施对冯越发不满，矛盾进一步加深。

柯庆施把上述情况向上报告后，6月13日，中央给河北省委一封秘密指示信，要求前委改组为秘密的军事委员会。把原特委同志调离同盟军各关键岗位，把在张家口和察哈尔受党领导和影响的同盟军集中起来，建立司令部，移师河北南部，进而改组为红军，建立苏区。6月中旬，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河北省组织部长史汀生（阮锦云）到张家口，传达中央指示和视察工作。阮锦云听了柯庆施的当面汇报和看了看一些部队后，即要前委坚决准备南下，加紧反日反蒋反冯（玉祥）的群众运动。

在当时的临时中共中央采取这样一种方针，不是偶然的。早在1932年，就对国际国内的形势作了错误判断。当年6月，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方各省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中，就讲过：满州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之后，日本不是企图进一步占领华北和平津，而是要进攻苏联。说满州成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前线。同时，认为国民党“开发西北”和“充实西北边防”的目的，也是企图对苏联和蒙古进行军事冒险。因而认为中共的任务不是保卫华北，抗日救亡，而是必须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还批评“在我们队伍中，还存在着对于反苏联



争的机会主义的轻视,……这是最有害的、最可怕的机会主义”。还认为“一切在野的反革命”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国民大会决定对日宣战”、“断绝邦交”、“对日经济绝交”等等,在“实际上不过是掩护国民党的出卖与投降的烟幕弹”。1932年7月,河北省委全盘的接受了这个错误的决议。并且说冯玉祥是“在野的反革命”,说吴成方和和特委是“最有害、最可怕的机会主义”者。

富有军政斗争经验的冯玉祥,怎能觉察不到中共前委的这种态度呢?但由于历史的经验,他不想再同共产党闹翻了。

## 同盟军血战杀日寇,收复失地

抗日同盟军自1933年5月26日正式宣布成立之后,即决定出兵收复察北察东失地。此时,日寇已侵占了察东重镇多伦,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还向外国记者宣称:“为保卫满州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果然,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便侵占了察北沽源、康保、宝昌等三县,察省形势日益危急。

6月20日,冯玉祥任命方振武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6月21日,吉、邓、李将所部主力分为三个梯队,集中到张北县附近,第五路军为左翼第一梯队,由左卫出发,第十六路军为右翼第二梯队,由万全出发。骑兵第三师为第三梯队,从张家口出发。柯庆施为了执行中共临时中央与河北省委的指示,需要加紧在部队中进行工作,也组成了三人团,由他负责,带领十余名宣传队员随军北上,名义上是做原义勇军的工作,发动民众支援部队和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实际是想争取和分裂出一批部队,尔后南下建立苏区。由于原驻守沽源的伪军刘桂堂已归顺同盟军,所以很快就光复了沽源,康保和宝昌也很快被攻克。紧接着,部队就乘胜前进,夺取多伦。

多伦是察省连结东北和蒙古的枢纽,是经济和商贸中心,华北、东北甚至陕西等地的商贾多云集于此,人口近14万人。素有“小北京”之称。此处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日寇在侵占多伦后,即驻有小野津指挥的精锐日军一千余人和伪军两万余人。同盟军光复三县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又把荒木骑兵旅团和原驻承德之重炮队调来,加强防守。

同盟军进抵多伦后,为查明敌情,吉鸿昌派副官带领40多精明强悍之侦察员扮作回民商贩,分批潜入城

内,分别住在五所清真寺里,然后送出情报,并约定了放火为号,里应外合。

7月7日,同盟军开始攻城,守敌日军和伪军李守信部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11日夜,总攻开始,城内几处燃起熊熊大火,吉鸿昌赤膊抡着大刀片上阵,带头英勇冲杀。全军将士,浴血杀敌,激战至12日中午,攻克多伦,日伪军死伤无数,残部溃逃。我军也伤亡一千六七百人。多伦的胜利,鼓励了许多青年,纷纷参加抗日同盟军。

## 蒋介石向抗日同盟军进攻

1933年6月初,何应钦向蒋介石详细报告了共产党在抗日同盟军和张家口的活动情况,请示处置办法。蒋立即电复何应钦,称:“察省地方赤祸萌动。为安定地方计,亟应设法防止赤祸蔓延。”同时授意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制造舆论。6月8日,市党部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诬称“冯玉祥勾结汉奸,割据地盘,捕杀党委,驱除政府任命官吏。并宣传共产,实行赤化,显系背叛党国”要求国民党中央“开除冯玉祥党籍,明令讨伐。”

6月9日,何应钦向冯玉祥发出“请取消同盟军名义”电。冯于第二天和第三天连发两电。对何应钦的无理要求严词拒绝,并向全国民众介绍同盟军情况和抗日决心。

何向蒋介石报告了冯玉祥不听劝告后,蒋即密电何:一、命令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进攻察哈尔;二、派宋哲元劝冯玉祥取消名义。

宋哲元一方面答应劝冯,一方面秘密派人报告冯,请冯早作打算,又授意冯治安找庞炳勋谈话,冯治安问庞“是否真打?”“庞说,我怎么能打先生?不过做做样子罢了!”冯治安说,“这样好。你要真打,你在前面打,我就抄你的后路。”庞炳勋赶紧说,“我决不打,我决不做这样对不起大家的事。”

蒋、何在命令庞进攻的同时,还命令孙殿英的四十一军攻打同盟军。孙部驻察哈尔南部的沙城,正好挡在庞军的前面。但孙在该军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李锡九、韩麟符和罗念冰等的劝导下,拒绝受命,并公开通电称:“与其阉墙以自争,勿宁屯垦以实边。否则解甲归田,亦决不再向国人发射一枪。争城夺地,宁死不为也!”还向他的部下讲,“冯玉祥生先抗日,我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作千古罪人。”

蒋介石对孙殿英的这个态度十分恼火。但他知道如果进一步逼迫,孙可能站到冯一边去。因此,只好委

孙为青海西部屯垦督办，答应给予40万银元的开拨费，要孙殿英部去青海屯垦。何应钦还命令傅作义和晋军孙楚部进攻同盟军。傅作义主张抗日，并对冯玉祥很敬仰，因而根本不理会何的命令，他只是想把部队开回绥远去。因必须借道张家口，便事先派人向冯玉祥说明了原委。冯玉祥表示热烈欢迎傅部过张家口回绥远。当傅作义部队途经宣化和张家口时，冯玉祥布置了群众欢迎、欢送，摆下馒头、茶水，双方官兵和群众拍手欢呼，互致敬意。孙楚部也不听指挥，按兵不动。

蒋、何严令庞炳勋军前进，但庞炳勋的部下大多反对。待到部队往前开拨时，更有成连成排的士兵投向同盟军。何应钦被迫改令蒋介石嫡系王敬久、关麟徵、黄杰等五个师做先锋，总兵力达15万人，还配备了飞机和装甲车等。何应钦同时派人潜入同盟军内部策反。

自蒋介石下令对抗日同盟军进攻后，冯玉祥连连通电，责问：赤化者何人？赤化者何地？既以赤化相诬，又为何欲界我林业督办？这不以赤化相勉吗？并邀请各地新闻记者来张家口参观，以辨真伪。冯玉祥并痛斥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方振武、吉鸿昌为首的19名将领，也发表通电称决心为民族生存而战，既不辞玉碎于强敌，更何求瓦全于内奸。先复察省失地，再图还我河山。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指东三省与热河省），此志不渝”。

国民党中央委员、军政要员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李宗仁、胡汉民、孙科、程潜、李济深、白崇禧、陈铭枢、蔡廷锴等更是激烈反对。到7月17日西南政委会还发出请北方各将领一致主张正义电，请庞、关、黄杰等勿为个人利用。李济深、陈铭枢还向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呼吁，停止向察省进攻。各地人民团体的通电反对之声更是如春雷滚滚。

对国民党造谣同盟军中有20余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从库伦（今乌兰巴托）给同盟军运去大批军火等事，苏联政府外交委员会新闻部发表声明加以驳斥。申明苏联对中国、日本问题持绝对中立态度，不以任何途径干涉中国或日本国内事件。

同盟军在蒋介石大军压境，内战一触即发之时，正需中共察哈尔前委同冯玉祥团结一致，风雨同舟共同御敌之际。但中共前委却采取了相反的完全错误的方针，加紧了反蒋介石反冯玉祥的工运，组织工人大罢工，号召同盟军士兵罢操罢岗和索薪索饷，成立要兵不要官的“士兵委员会”。六月下旬，中共中央的北方代表、河北省委又连发两项指示，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新的苏区与红军，以争取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甚至指示前委“准备出发攻打卖国的北平政府

和南京政府”。后来竟真的成了部分察北抗日同盟军“到北平吃月饼”的行动口号。

中共前委这些过左的行动，无异是给蒋介石的进攻火上浇油，从而也使得冯玉祥感到前委的矛盾已到了无法弥合的程度了。

## 冯玉祥被迫下野

蒋介石使用军事压力，冯玉祥不肯就范，于是蒋介石又派黄郛到张家口，向冯施加别的压力。黄郛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任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曾秘密同冯玉祥合作过。黄郛到张家口同冯玉祥进行了彻夜长谈。黄郛讲由于实力过份悬殊，你若抵抗不能取胜。还说同盟军内部不稳，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同你冯玉祥两条心，摆出了诸多事实。这番谈话，使冯玉祥感到蒋介石、何应钦对自己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并非完全挑拨离间之词。冯玉祥于是说道：为避免内战，不使日军获渔人之利，我们可以进一步商谈，但蒋介石必须首先下令停止对察哈尔的进逼。我方条件：一是让宋哲元回察省主政；二是保留抗日同盟军，使之守卫边疆，抵抗日军之侵略。否则，再无谈判必要。黄郛答，让宋哲元回察省主政，估计问题不大。保留同盟军问题因涉及军内有共党活动，我回北平后向蒋、何转达。

在此前后，同盟军内部的确出现了一些不幸之事。一是鲍刚率部投降了蒋介石。不久，张人杰也率部叛变，并将反对叛变的7名营连长杀害。之后，冯占海也不听冯玉祥命令，把部队开到察南的蔚县。邓文的一个旅长向冯玉祥告密说，邓文与何应钦勾结，邓被忠于冯玉祥的潘蕴玉派人刺杀于一家妓院。8月10日，第十六军骑兵二十四旅参谋长古松年又策动叛变，虽被军长李忠义镇压，但不久，这个军的李忠义却同汲汲东部等又投靠了何应钦。

同年8月3日，冯玉祥召开了十余人的紧急会议，被迫表明了下野的意向，并通电：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察省主席宋哲元即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当天，宋哲元等抵达张家口东边的沙城，双方达成了原则协议，宋哲元即派秦德纯赴张家口接收政务。

蒋介石欲让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去南京，许以担任中央训练总监、陆军检阅使、监察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全国林业督办等，让冯任选一项。均遭冯玉祥拒绝。冯玉祥表示仍愿回山东省泰山读书。

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前，主持了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烈士纪念碑、全国军民抗日死难烈士祠和烈士

墓落成奠礼，发表了《告抗日同盟军全体将士书》，提出了“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决心继续抗日亦决不足以明吾人之初志”。还同他的重要骨干成立了秘密的《抗日同盟会》，冯任会长。8月14日，冯玉祥在宋哲元、秦德纯、张吉墉、过之翰、刘治洲、邓哲熙、李忻等陪同下，乘火车南下到河北省沧州，换乘韩复榘派来的铁甲车回到山东省泰山。

## 同盟军的失败

冯玉祥被迫下野后，中共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党领导下的二师、五师、十六师、十八师、和干部学校、以及地方党、工会、救亡团体等，除留少数人员坚持地下斗争外，全部撤到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坝上一带。并以方振武、吉鸿昌名义发表通电，反对何应钦与冯玉祥在沙城会议达成的协议，誓死抗日到底。8月24日，前委在张北县二泉子村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军队去向和下一步行动。柯庆施主张去河北中部或南部建立苏区，张慕陶主张去陕北与红军会合，吉鸿昌主张东去，与前些时去独石口的方振武会师。会议争论得异常激烈。最后由柯庆施决定从商都县城出平地泉去察南的蔚县，在河北中部或南部建立苏区，并成立了军委，由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等为军委常委。当时由前委指挥的部队仍有一万五千人。但当这支部队到达商都县城附近时，驻在那里的高树勋部已接受了宋哲元“收编”，阻止部队通过。于是柯等决定先到独石口，然后再去河北省蔚县。但二师领导人和骨干由于是宋哲元旧部被宋哲元部收编了。

我部队与方振武部会合后，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决定改“同盟军”为“讨贼军”，推方振武为总司令，先打北平市东北的密云、怀柔，然后攻打北平，提出“中秋节前到北平吃月饼”。

此时，前委宣布开除张慕陶和五师王沛南、尹心田、周茂兰、贾振中等党籍。理由是他们未尽到督促二师到独石口，反被宋哲元收编的责任。并让各师党员讨论贯彻下一步行动计划，部分同志不同意开除张慕陶等5人党籍，也不同意公开集会讨论认为这会暴露党员身分。但柯庆施未予理睬，并通知吉鸿昌把张慕陶驱除出同盟军。

9月14日，这支我党指挥的部队兵分两路。前委随方振武为右路，吉鸿昌为左路。9月20日和21日，方部攻占密云、怀柔，攻占顺义之牛栏山等和昌平的小汤山。吉鸿昌率领的五师一部，途中与擅自新部遭遇，

张韬团长同不少官兵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损失很大，后被吉鸿昌派部队接应到黑山寨。原来自方振武部占领怀柔后，何应钦即与日驻华武官柴山，商定了共同出兵夹击这支同盟军。他们在这一带出动了强大兵力，封住了各个要冲，这时同盟军已处于被包围的异常险恶形势中。当此正需前委加强领导，与同盟军将士同生共死、勇闯难关之时，柯庆施却自行决定回北平报告工作，前委改由周仁山和邹春生负责。一些党员不见了柯庆施，以为他溜走了，并感到“红帽子”已为众人所知，必遭敌人毒手，因而也陆陆续续寻机离开了部队。

当方振武、吉鸿昌两部主力会合后，于10月4日凌晨刚冲出包围圈，但在国民党军五个师与日寇的飞机轰炸、扫射下，这支同盟军又被包围在一个更小的圈子中。此时，经多次战斗，减员甚多，且处于内无粮草弹药、外无救兵之绝境。

10月12日，北平市商会会长冷家骥奉何应钦旨意，到这支同盟军总部会见方振武、吉鸿昌，表示愿出面调停，和平解决。并讲南京政府希望二位出洋考察，政府给予相应名义和资助。方答应予以考虑。

15日，冷家骥又同慈善团体17人及汽车8辆迎接方振武、吉鸿昌去谈判。方、吉便将所部暂交商震部下师长李杏村关照。李示意方振武脱下上将军服，换上便衣。路上，何应钦指挥的关麟徵带领百余武装人员，劫住汽车。此时，他已奉蒋介石之令：“拿获方振武，就地枪决”。因蒋等当时尚不知吉鸿昌为共产党员，故未命令对吉鸿昌下毒手。方振武见状，立即机警地以“解手”为名，跳下汽车，隐藏在厕所内。他的随从人员也跳下汽车紧随其后。关麟徵查前面车，答称方振武在后车，待查后车时，答称方振武已乘前边车走了。待商震在军部招待同盟军人员时，关麟徵才知方振武不在。他立即带兵四处搜寻，但方振武已趁人乱天暗之际，逃到一农家，当夜被这家农民掩护并护送虎口。

这之支残余同盟军，后来有的被国民党收编，有的被缴械。至此抗日同盟军已片甲不存。此后，吉鸿昌、方振武、宣侠父等，也先后遭蒋介石杀害。

冯玉祥在泰山时，宋子文等曾专诚请他回南京任职。冯婉言谢绝。直到1935年，在我党“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冯玉祥才带领李连山、李紫翔等去南京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冯玉祥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好评。惜在1948年由美国回国准备参加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时，不幸在途中因轮船失火殉难。

(责任编辑：仲文)

发生在1939年的湖西“肃托事件”，40多年后才得以彻底平反。在我们总结其历史教训之际，绝不能忘怀每一个坚持原则，仗义直言，为还历史原貌而不懈努力的人。

# 为争取湖西“肃托事件”彻底平反的郭影秋

● 王俊义

1939年秋冬，在湖西（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抗日革命根据地，曾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桩罕见的冤假错案。虽然案发不久即被当时驻山东地区的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等领导同志发现，并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性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案拖下的尾巴、留下的后遗症，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才得到彻底的纠正和平反。

原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郭影秋，是湖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也是这次“肃托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当时在他即将被处死的千钧一发之际，幸经星夜飞奔湖西的罗荣桓同志的营救，才得以幸免。在此后4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郭影秋曾历任湖西地区专员、军分区政委、司令员及冀鲁豫区敌工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川南行署副主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北京市委书记等职。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担任繁忙的党政领导工作中，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以坚强的党性原则，为争取这一事件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曾做了不懈的努力，直到这桩冤案彻底平反。

## 一、湖西根据地的发展和“肃托事件”的由来

郭影秋（1909—1985年），江苏省铜山县马兰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他祖父、父亲直至其童年时代，都租地主的地，住地主的房，正如他的诗句所说：“我家本是田舍郎，祖孙三代住人房”。然而，他自幼勤奋好学，刻苦自励，在艰难困苦中，靠借贷与师友周济，时续时辍求学，直到江苏教育学院毕业。他在学生时代，即追求进步，参加学生运动。193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狱，经历过狱中斗争的严峻考验，如其诗中所咏：“打掉门牙

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党组织委派，在徐州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部做统战工作。1938年徐州沦陷后，他又按党的指示，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担任过湖西人民抗日武装义勇队第二总队政委，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政委，苏鲁豫支队政委等职，与湖西特委书记王文彬等，共同领导开辟了湖西抗日革命根据地。1939年8月，湖西“肃托事件”发生时，他正担任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为发展和壮大根据地，在湖西地区外线开辟工作，进行抗日斗争。

湖西根据地，位于江苏、山东和河南三省交界处，亦称苏鲁豫边区，所辖范围曾包括二十多个县，是华中与华北相连的枢纽，又是当时华东、华中各根据地与延安联系的交通要道。1938年7月，成立了湖西特委。1938年1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组成苏鲁豫支队，在彭明治等同志领导下，开进湖西地区，使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

正当湖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令人痛心的“肃托事件”发生了。

这次事件，始发于七八月间。当时，湖西区党委所属的湖边地委干校，有些学员在议论毕业后的工作去向时，有不愿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情绪，并在学员的文艺演出及自发组织的“同乡会”中，明显地流露出来。湖边地委发现后，认为问题严重，甚至主观臆断有阶级敌人煽动，决定由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此事。据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隐藏在党内的暗害分子。由于在此前后，党刊曾有反托派的文章发表，王须仁在处理此事时，便捕风捉影地把湖边地委干校的问题与托派联系起来，随意搜集了主持干校工作的教师魏定远的一些材料，罗织罪名，将魏定远逮捕。而后，又施加酷刑，采取诱供、逼供方式，迫使魏定远承认自己是“托派”，并编造了湖边地区有“托派”组织的供词。

王须仁将逼供所得的“托派”材料，先后向湖边地委与湖西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做了汇报。这些领导人没有认真调查研究王须仁所弄材料的来源，反而大加赞赏其“能干”、“有肃托经验”，还正式指定他为湖边“肃托”的负责人。王须仁更加有恃无恐，胆大妄为，依据魏定远的所谓交待材料，又逮捕了一些干部，并采用更加残酷的肉刑指名逼供。这样，被逼供出来的“托派”便越来越多；被指控为“托派”的人，也由一般学员、教师，扩展到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一些县委书记，及湖边地委的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妇女部长等等。

王须仁感到事态越来越大，要放手大干，必须有主力部队支持。这时苏鲁豫支队的主要负责人彭明治等正在远离湖西区的外线作战。在湖西区中心地带活动的只有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大队长王宏鸣等人。王宏鸣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但参加过长征，居功自傲，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与王须仁一拍即合，未向苏鲁豫支队及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请示汇报，便主观肯定湖边地委的“肃托”完全正确，甚至擅自决定“肃托”工作由他统一指挥，从而使事件进一步恶性发展起来。“二王”狼狈为奸，相互勾结，随意逮捕审讯，逼供诱供，甚至以“托派”罪名成批屠杀革命同志。在此过程中，湖边地委书记也被打成了“托派”，整个湖边地委被瓦解。“二王”又将罪恶矛头指向湖西区党委。可悲的是当时任湖西区党委书记的白子明，在“二王”的威逼利诱下，完全成了他们的傀儡、工具和帮凶。他们率先逮捕了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同志，这是一位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强的党性。他不惧“二王”等的淫威，受尽种种酷刑，拒不承认自己是“托派”，竟被活活打死。接着，他们又将区党委的统战部长王文彬、组织部长郝中士、军事部长张如等逮捕刑讯，并不顾他们的忠言和抗争，竟将王文彬等这些开创湖西根据地、在当地人民中有很高声望的老党员，或在逼供中打死，或者当众枪杀。

在“二王”的控制操纵及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参与下，“肃托”像瘟疫一样，在湖西地区迅速蔓延。继瓦解了湖西区党委之后，又逮捕了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指挥长李贞乾，并将其罪恶之手，伸向苏鲁豫主力部队。

## 二、郭影秋的被捕与“受审”

当“二王”在湖西区中心地带，以“肃托”为名，疯狂进行逼供和屠杀时，郭影秋作为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正带着队伍在陇海铁路以南打游击。由于当时日伪封锁，交通与联络不便，他虽然隐约听到湖西



1949年1月郭影秋任十八军政治部主任时留影

“肃托”的一些情况，但了解得并不真切。

1939年10月，留在湖西中心地带的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大队长梁兴初，突然带了一个骑兵排，来到陇海路南郭影秋部队的驻地，像是要执行什么任务，但又支支吾吾，态度暧昧。在接触中，郭影秋曾向梁兴初询问路北的情况及“肃托”问题，当问及王文彬、李贞乾、陈筹等同志的情况时，梁兴初说他们都是“托派”。郭影秋简直不敢再问下去了，因为这些被认为是“托派”的同志，有的是同他一起开辟根据地的战友，有的是他从徐州带出来的干部，他都了解底细。怎么竟然成了“托派”呢？实在令人不解。梁兴初在路南呆了一个多星期，又回去了。后来，郭影秋才知道，梁兴初原来是奉命捕他来的，只是因为郭影秋带着队伍，怕引起事端，未能轻易下手。

不久，郭影秋突然接到命令，被免去独立大队政委职务，降级调任支队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科长。这个十分蹊跷的任命，使郭影秋很快意识到，一定是把他和“托派”联系了起来，但他也不得不离开独立大队，到支队司令部去报到。郭影秋刚到铁路以北不远，便突然被逮捕。这时他才知道，梁兴初也是在返回路北途中，以同样的方式被“二王”逮捕的。梁兴初到铁路以南，原是“二王”玩弄的一个阴谋，一则利用其捕郭；再则也是调虎离山，趁梁兴初到路南之际，严刑逼迫一些人制造



了梁是“托派”的口供，待梁返归途中下手。

郭影秋被捕后的第二天，即开始对其审讯。最初出面审问他的是王须仁。郭影秋担任义勇队第二总队政委时，王曾是他手下的锄奸干事，因其来历有些可疑，在部队改编时将其调到地方工作。未料，他却在地方连连高升，直到任地委组织部长。郭影秋对王的审讯，根本不屑于理睬。王须仁不得不把区委书记白子明搬来。郭影秋看到这位党委书记后，认为他应该了解自己，情况可能会有好转。因为湖西特委成立时，正是白子明传达山东省委的指示：“特委书记与部队政委之职，非王（文彬）即郭（影秋）”。后来，王文彬任特委书记，郭影秋担任了部队政委。谁能料到这时的白子明却对郭影秋冷笑着说：“那时有那时的情况，现在你已经走向新的生活了！”说着，竟亲自对郭影秋动起刑来，各种刑具轮番使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压杠子等。一边动刑，一边逼迫其交待“托派”问题。郭影秋始终实事求是，坚强不屈。审讯从下午两三点钟起，一直持续到晚上九、十点钟。郭影秋曾几次昏死过去。他们仍不罢休，后来又把电话机一根线插到他身上，再猛摇电话机，使之浑身麻木，汗流如雨，再度昏迷。

当郭影秋处于半昏迷状态时，那位区委书记，又拿了一张电报纸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说：“你是不是一直在郭子化领导下工作？”郭影秋回答说：“是。”他又说：“那好！山东分局这个电报说得很明白，郭子化是托派，他在分局已主动交待，而且供出了你也是托派。你还能抵赖吗？不管你承认与否，我们都可以定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郭影秋有些惶惑，他对这伙人的阴谋诡计毕竟估计不足，还以为真是山东分局来了电报；加之，七、八个小时的审讯和动刑，他的头脑早已昏沉麻木，便说：“我一直是在郭子化领导下的干部，他本人既然是托派，又发展了我，我还能讲什么呢？”这样，就算是郭影秋承认了自己是“托派”，因而审讯才终止。

郭影秋被押回牢房，至夜深人静时，他的头脑才逐渐清醒，想到审讯中的一切，猛然醒悟。心中暗想，莫非是中了他们的圈套？他愈想愈觉得问题严重，彻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天一亮，他就请来警卫营长，向他要了一些纸和一支笔。然后，给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说，自己昨晚的口供有错误，郭子化如果在山东分局承认自己是托派，那是他的问题，他过去领导我做的是革命工作，从未向我讲过托派的事，更没有说过发展我加入托派。我参加的是共产党，是按党的指示工作的，即令他是托派，也与我无关。昨天在昏迷中承认自己是托派，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请求组织处分。不料，这封信却未能送出去，反又落到“二

王”等人手中，这下可惹了大祸。

当天上午，“二王”等人又把郭影秋提来审讯，同时受审的还有萧县的民运干事陈景文同志。审讯开始后，王须仁先训斥陈景文不该翻案，一边骂，一边打，陈坚持不屈，他们便用一根大木棍，将陈活活打死。而后，王又凶狠狠地对郭影秋说：“郭影秋，你是不是也想翻案，你自己看着办，下午再审问你，再要翻案，就是陈景文这样的结果。”当时，郭影秋已做了被害者的准备，但内心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他想到，死并不可怕，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不是牺牲在与敌人拼搏的战场上，而是被诬为“托派”，就要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他甚至想面对苍天高呼：“党中央，毛主席！您们可否知道，湖西的党员和干部正在遭殃！”

### 三、罗荣桓星夜奔湖西， 扭转危局

就在这一天下午四点左右。郭影秋果然又被拉了出来，他怀着悲怆的心情，做了最后被处决的思想准备。他被带到一家四合院的三间西屋中。进屋之后，他看到在中间厅内的桌子旁坐着三个人，但都不认识，而“二王”等人却不在。他觉得情况似乎有变，正纳闷之际，其中有个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答：“郭影秋！”

问：“你认为‘肃托’怎么样？你可以坐下讲！”

郭影秋坐下后答：“‘肃托’是正确的，但我是被冤枉了！”

问：“谁冤枉了你？”

答：“郭子化。”

问：“郭子化在山东分局，他怎么会冤枉你呀？”

答：“郭子化在分局自首是托派，还咬了我！”

问：“谁说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了，你怎么知道？”

答：“我们湖西区党委书记拿着山东分局来的电报讲的。”

发问者听了这样的回答非常生气地拍着桌子说：“岂有此理！这完全是捏造，造谣！”稍停，他又平缓地说：“告诉你郭影秋同志，郭子化并没有自首，山东分局也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这件事是错了，你是被冤枉了。”接着，他又自我介绍说：“我是罗荣桓。”又指着旁边的两位同志说：“这是张经武，这位是郭洪涛，我们不是来审讯你的，我们是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湖西问题的。”还说：“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一会儿也会见到他们。”

郭影秋听到罗荣桓同志的名字，又知道张经武、郭

洪涛、郭子化同志都来了，而且是来解决湖西问题的，顿时，激动得泪如雨下，甚至放声哭了起来。满腔的委屈痛苦与不平想一下倾诉出来。

罗荣桓同志抚慰了郭影秋后，又亲切地说：“郭影秋同志，我们了解你是个好同志，八路军正规部队到来之前，你就在湖西打游击，我们是知道的。你好好养伤休息，准备继续为党工作。”

就这样郭影秋得救了，梁兴初、李贞乾等同志也得救了。那些被关在“训练班”里的几百名“肃托”对象也得救了。罗荣桓同志的到来，挽救了大批干部，也驱散了湖西地区连续几个月的血风腥雨。

原来是“二王”的倒行逆施，早已激起天怒人怨，湖西地区的干部和家属，不断想方设法向有关方面反映。有些被审查而跑出来的干部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山东分局和党中央报告。还有些在重刑逼供下承认了自己是“托派”的同志，在牢房中也共同研究，偷偷写了详细材料，托人转到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首长了解了湖西的不正常情况后，几次打电话给湖西区党委负责人王宏鸣等人，告他们要停止乱捕、乱杀。特别是李贞乾、梁兴初和郭影秋等人被捕后，苏鲁豫支队也直接给一一五师与山东分局作了报告。于是，罗荣桓同志感到事态严重，便会同山东分局的领导同志，马不停蹄，星夜飞奔，急急赶到湖西。而且，动身之前，就电示湖西：在他们到来之前，即刻停止审讯和捕杀。

当时，罗荣桓是一一五师政委，郭洪涛是山东分局书记，张经武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长，郭子化是山东分局统战部部长。他们日夜兼程，越过日寇的层层封锁，到湖西之后，严厉斥责了“二王”等人乱捕乱杀的非法行径。罗荣桓还明确宣布：立即释放一切被冤枉的同志，恢复他们的工作；解散训练班，对当时集中在各地县的“肃托”对象，一律回原地区、原单位正常工作；改组苏鲁豫区党委，为稳定局面，仍由白子明任党委书记，郭影秋和郝中士任常委；撤销王宏鸣现职，调回一一五师师部；将王须仁押解一一五师师部审查。

如此处理后，王须仁自知罪孽深重，在押解途中畏罪自杀。王宏鸣后来也原形毕露，于1941年2月，叛变投敌，充当了汉奸郝鹏举的团长。

罗荣桓同志在湖西地区处于危急关头时，挺身而出，采取果断措施，终止了“肃托事件”进一步恶性发展，挽救了郭影秋等一大批党的干部，重新恢复了湖西区党的工作，从根本上扭转了湖西岌岌可危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深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爱戴与赞扬。1963年，当罗荣桓这位功高德重的元帅病逝时，郭

影秋在《吊罗荣桓同志》的悼诗中曾写道：“四围敌垒不闻鸡，雪拥南阳急马蹄（按：南阳指微山湖北端的南阳湖），惠及生人肉白骨，至今歌颂满湖西”（见《郭影秋诗选》）。

在返回一一五师师部之前，曾召开过两次军政委员会，解决了湖西地区急迫的军政问题，并指定专人如吴文玉（即吴法宪）负责处理“肃托”的善后问题。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负责人未能完成罗荣桓同志的重托，以致使湖西“肃托事件”的遗留问题，长期未能得到完善解决。

#### 四、郭影秋的不懈努力与 “肃托”事件的彻底平反

湖西“肃托”中被杀害的干部三百多人，受到审查和被牵连者更不计其数。受害者家破人亡，家属悲愤难平；许多被捕受审者，身心受到摧残；整个湖西根据地的元气大伤。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而实事求是地处理“肃托”的善后问题，乃是关键所在。

但原湖西地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作为“肃托”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对其“肃托”中的严重错误一直缺乏应有的认识。在一次“肃托”的善后会议上，他仍一再强调：“肃托”是正确的，错误只在于扩大化，造成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受审者不能坚持气节，乱提口供，混淆了阵线。”郭影秋对这种掩耳盗铃的说法极不同意，当场向这位负责人指出：“造成扩大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严刑逼供，乱捕乱杀，而不是受审者乱提口供。你最清楚，口供是怎么被逼出来的。”但这位负责人却反咬一口说：“你在‘肃托’中承认了口供，难道没有错误吗？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在敌人的法庭上坚持气节，也要在自己的法庭上坚持气节。”郭影秋又严加质问说：“我们只知道敌人有法庭审讯共产党人，却没有听说共产党设立法庭审讯自己忠贞正直的共产党员，对自己的党内同志怎能私设法庭，严刑拷打呢？”

1940年四、五月间，山东分局派了一个“肃托”问题调查组，来到湖西，但他们未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偏听偏信，最后定了七个所谓的“真托派”，并对湖西的“肃托”做出了结论。结论中指出了“王须仁是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但对造成“肃托”恶性发展的另一个罪魁王宏鸣，却认为其“主观动机是正确的”，只是“政治上幼稚，组织观念淡薄，政治立场不够坚固”，“建议一一五师对之开展斗争”。对于“肃托”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原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只“给予严重警告处罚，在行政上撤销工作”。而对于那些在严刑逼供下屈

打成招的同志，却看成“毫无气节，自首叛变”，“失去党的忠贞人格”，要视不同情节，分别给予“永远开除出党”、“开除党籍”、“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致使在“肃托”中受害的同志十多人被“永远开除出党”，郭影秋也受到“严重警告”处分。那些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同志，精神上再一次受到严重刺激，有的甚至精神失常，投湖自杀。不少干部和群众反映，这简直是“第二次肃托”。

对于这些不实事求是的处理，郭影秋和许多同志继续向山东分局和党中央反映意见。因此，党中央于1941年2月又作出新的决定，决定指出湖西“肃托”事件造成的严重恶果与危害，并对主要肇事者、参与者提出重新处理意见：“王宏鸣应即撤销工作，开除党籍，交军法处判处徒刑”；对白子明也给予“撤销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预备党员”的处分。同时，还决定“对于无辜牺牲者，应分别安慰抚恤”；“对于被诬同志严刑拷打而表示自首，基本上应当原谅他们的幼稚，不能当叛徒看待”。这一决定比之原来的结论更加实事求是，但当时限于对“肃托”中的许多具体情况了解不够，仍然对事件留下尾巴，而且，在具体贯彻中，依然给不少同志保留了过重的处分。再者，对已定的所谓七个“真托派”，虽然证据不足，却未予以平反。

此后，郭影秋抱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又进一步向有关组织反映，建议对已定的七个所谓“真托派”重新审查甄别，对保留着过重处分的同志也应重新审理。但他的建议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郭影秋仍坚持认为“肃托”中的这些遗留问题，如不能实事求是地妥善解决，将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不良影响，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权利继续向组织上反映意见。因此，他仍不断地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也曾当面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自己的看法。

1942年秋，刘少奇同志从华中返回延安，路过湖西。郭影秋当面向他陈述了自己对湖西“肃托”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如对严刑拷打下承认是“托派”的干部，处分过重，处分面过宽等。少奇同志耐心地听取了他的陈述，并就有关的问题诚恳发表了意见。少奇同志说：当时你被捕了，不是被敌人逮捕，而是被党的领导机关逮捕，而且要拉出去杀头，杀你的人还是区党委书记，手里还拿着山东分局的电报。在这种情况下，你究竟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呢？”少奇同志沉思一下，又十分感叹地自我回答：“难乎其为人呀！当时你承认了不好，因为你没有这件事；但是，不承认。又要被杀头，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了。这的确是难以处理的事情。面

夜是中秋  
滿頭夾道有人餽梨  
始知昨  
微湖西岸亂雲稠  
戰罷歸來霜  
中秋  
一九四〇年

（郭影秋遺墨）

对这样的事，不用说你们年轻幼稚的党员，就是老党员也不容易判断清楚。”最后，少奇同志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反映的问题，我一定带回延安，请党中央认真研究，妥善处理。也请你转告所有受委屈的同志，都要积极为党工作，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只有积极为党工作，才能不倒霉，否则就要更倒霉！”

郭影秋曾将少奇同志和他谈话的内容，转告有关同志，大家都很受鼓舞。

1944年，郭影秋到平原局去开会，又向平原局书记黄敬同志反映了对湖西“肃托”的看法。黄敬同志也指出，被冤枉的同志承认自己是“托派”，当然是错误的，但这与在民族敌人或阶级敌人的法庭上的自首，具有不同性质，应予不同看待。要考虑当时的情况，原谅他们，教育他们。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湖西地区的党代表郭子化、孙子谦同志，受郭影秋和许多同志的委托。一再向中央反映湖西“肃托”中的有关问题，引起党中央的进一步重视。七大之后，中央就湖西“肃托”问题，专门成立了由陈云、彭真、李富春、陶铸等同志组成的五人小组，在陈云同志主持下重新审查了湖西“肃托事件”。而后，明确指出：这次“肃托事件”的错误是由于领导者大搞逼供信造成的。那些在刑讯逼供下自己承认是“托派”，并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不要给予处分，所有处分应一律撤销。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湖西地区的代表郭子化、孙子谦同志从延安回来，召开了湖西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了上述意见。至此，湖西“肃托”的善后处理才基本结束。郭影秋和许多受到错误处分的同志也正式被撤销了处分。

全国解放后，湖西“肃托”中一些被冤枉过的同志，在肃反中又曾遇到麻烦。因此，当时担任云南省长、省委书记的郭影秋又曾在口头上并两次书面报告中央组织部，说明湖西“肃托”问题中央早有明确意见，已撤销对所有受冤枉同志的处分，但每逢一次运动，都要审查一次，查历史，查处分，牵连了好几百个同志。以后不应再提了。对此，邓小平同志、安子文同志都作了批示，并下达文件，再次重申：中央对于湖西“肃托”这件事，已多次做过决定和指示，在政治上早已解决了，所有在这次“肃托”中被冤枉的同志，他们本身都没有错误，以后在运动中不要再查这件事了。

不料，在天昏地暗、是非颠倒的“文革”十年动乱中，造反派又捕风捉影地把湖西“肃托”的事端了出来，又对一些有关的人，审来审去，七斗八斗，把问题搅得一团混乱。这种状况，迫使郭影秋再一次严肃地考虑问题。他认为几十年来，湖西“肃托”的事之所以一直搅来搅去，不能平息，主要的问题在于它不是扩大化问题，而是根本错了。因为被定为“真托派”的七个人，当时材料就不充足，不能再让他们受冤了。必须认真的彻底澄清。“文革”后期，在他有病住院期间，仍从高

度的党性原则出发，找了几位同志认真研究原有的材料，并要求这些同志不畏风险，不怕艰苦，跑东走西，南查北调，几乎走访调查了“肃托”中涉及的所有在世的同志。原来“肃托”中被定的七个“真托派”，其中五个早在“肃托”当时就已被杀掉，仅有两人尚幸存人间。大量确凿材料充分证明，这七个人根本不是“托派”。于是，郭影秋又依据大量调查材料，再次写报告给山东省委。山东省委又经认真调查核实，最后向中央作了报告。1983年12月，中央转发了山东省委的有关报告，明确指出：“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已经中央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以消除影响”。山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以下意见：

一、首先明确湖西“肃托事件”的性质，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不是扩大化错误，应予彻底平反。

二、原定单子英、牛籍庵、朱华、朱新民、王天章、曹广善、魏定远等七位同志为“真托匪”是毫无根据的，完全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三、对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错杀、错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昭雪。对受株连尚未纠正的家属、子女，予以彻底平反，消除影响。1941年中央对被难家属已按烈属对待，这些家属今后仍可享受烈属待遇。受冤枉的同志所戴各种政治帽子和给予处分的，凡未纠正或纠正不彻底的，一律予以彻底纠正。他们档案中如存入有关肃托的结论，处理材料等，应由组织部门清理、销毁。

湖西“肃托事件”从其发生到最后彻底平反长达44年，这自然会引引起人们深沉的思考。不容讳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冤假错案，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但也必须肯定，中国共产党毕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已发生的历史冤案，不管是多么复杂，也不管是过去了多长的时间，只要其不符合历史实际，终究会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郭影秋同志为争取湖西“肃托事件”的彻底平反，几十年来所做的不懈努力，也给人以宝贵的启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坚定的革命者，同样也应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面对现实，实事求是，要有为追求真理，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打击陷害的献身精神。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和曲折，但只要百折不回，勇往直前，最后终归会得到应有的支持和肯定，得到公正的评价和正确的结论。

（责任编辑 洛松）

# “文革”后期被扭曲了的报人办报

● 林 里

审查，批判，斗争，下干校。

拳打，脚踢，低头，哈腰，“坐飞机”。

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古代的体罚，现代的折磨，统统用在清白无辜的共产党人身上。

苍天不肯慈悲，上帝自身难保，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北方佬”，总算熬煎了过来。

1969年8月，我在干校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各项科目”，“毕业”了，“解放”了。9月，奉命回广州。

广东新闻界的“五·七”干校，在英德县黄陂镇辖区。是1968年12月9日“开学”的。前不靠村，后不依店。红土沙丘，像火烧过一样焦灼。我不知道这儿离广州有多远，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少得可怜的几处土木建筑，是弃置有年的军营、马棚。我在马棚里呆了9个月。

回广州时，“干校”当局派蔡鉴清护送。

军用卡车把我带到韶关。蔡鉴清帮我托运行李，买火车票。就在托运行李的一刹那，蔡鉴清呼唤：“老总，量量体重。”

“正好100斤。”蔡鉴清说毕，又低声问道：“比来干校前少了多少？”

“20斤。”顿感失言，随即改口，说：“没什么，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我像惊弓之鸟，时不时地东张西望，环顾左右。深怕突然出现的红卫兵，再次把我抓走。

我得到了宽待，被分配到《南方日报》。起码没有改行转业之苦嘛！

《南方日报》，原在广州市区的西南角，紧靠沙面东桥。后搬到广州市区的东北角。大门口，高围墙，宽阔、排场的庭院，加上那座高高大大的毛泽东主席的雕像，确实壮观。今非昔比。

我到报社的傍晚，南方日报革命委员会主任孙惠

畴同志接见。他代表党的核心小组，代表军管会表示欢迎，说我是第一个回到报社工作的原在各报工作的革命领导干部。我受宠若惊，不知怎么一下成了革命领导干部。

话虽这么说，并没有让我当领导，而是分在第二采编组，当编辑，负责处理工商方面的来稿。老实说，不当领导，正合吾意。真是巴不迭呢？再说，昨天的“牛鬼蛇神”，今天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够优待的了，我感到满足。否则，真不知道这个“革命领导干部”怎么个“领导”法呢！

第二采编组组长，每天分配给我三五篇稿子。当天可以处理完毕。有时多一点，也不过七八篇。稍微加把劲，也可以编发完毕。我给自己订了个规矩：不压稿、不积存，当天来稿，当天编发。其实，工作量不大，用不了多少时间，但又不得不坐在办公室。对此，我感到无聊，总想找个藉口，到室外活动活动。于是，我打开水，送稿，取信，拿报，干勤务员、通讯员所干的事。我的所作所为，被好心人看在眼里，写了墙报表扬稿，而且标题用了红颜色。这一下，捅了漏子。他们说，对于一个正在“改造中的试用干部”，怎能轻易表扬？又有人说，墙报表扬，未必不可，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用红色标题呀！更有人说，墙报委员会里“有鬼”，是“鬼”替我抬轿子，吹喇叭。

原来，广州地区的三家报纸合并以前，军管人员对三报干部情况作了研究。军管人员认为，广州日报的干部队伍比较整齐。一是党员多，二是工农出身的人多，三是年轻人多。当时，广州日报的干部，平均年龄37岁。在三报当中，算是最年轻的了。因此，在组织新的南方日报干部队伍当中，就确定了个以广州日报为主的方针。这样一来，广州日报的干部比重，竟占60%多。军管人员所说的要害部门，像政工组，保卫组，几乎全是广州日报的干部。墙报，便是政工组主办。一些人说墙报委员会里“有鬼”，意指表扬我的墙报稿，是

出自原广州日报的“鬼”所为。

恰在这时，我编的一篇稿子，登了一版头条，占了差不多半个版的篇幅。当着人们发现这条消息是我编发的时侯，不仅议论纷纷，而且告了状。一些本来没有看过这条消息的领导者，也特地找出这天的报纸，并且立刻发现了问题。

“哎呀呀！一条消息，竟有9条语录，成何体统？”

“不是早就说过了嘛！语录不能乱用、滥用、一般不用吗？用这么多语录，居心何在？”

吵吵嚷嚷，终于吵到我的耳朵里，“文化大革命”初期，只因我删掉了一条本来是多余的毛泽东语录，我被戴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一次批斗，两次批斗，三次批斗，总也过不了关。我申辩说，党中央宣传部一再通知，学习毛泽东著作，不能简单化，不能庸俗化，不能穿靴子戴帽子。……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造反派的拳头打断。

“你知道不知道，军报有条规定，没有语录的新闻，不能见报？”

“没听说过。”我回答。“再说，军报是军报，军报管军队不管地方。”

“呵哈，军报管不着你？你还在迷信中宣部，那是阎王殿，打倒啦！”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你不按军报规定办事，说明你不但反对毛主席，而且也反对林彪副主席。军报由林副统帅领导，你知道吗？”

曾几何时，因为删掉毛泽东语录，挨批，挨斗，挨打；此时此刻，又为保留了毛泽东语录而横遭非议。天啊！该怎么做人？我委屈，我不服。心想，我现在是个编辑，连保留毛泽东语录的权力都没有，我这个编辑还怎么当呢？再说，编辑头上，还有大大小小的一连串头头。还有总编室主任，还有值班编委。你们不全都看过，不全都签字放行吗？干嘛推到我一个人头上？再说语录不能乱用、滥用、一般不用的规定，在哪？没有人对我说过呀！你们不是说，没有语录的新闻，不能见报吗？好心的群众说我“穿新鞋，走老路，认识跟不上形势”，劝说领导人放我过关。

省革委会传来消息，说刚从干校回来不久的某领导，军管人员说他没有把政治历史问题交代清楚，省革委会让他回干校，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行前，领导人找他谈话，要他“死心塌地，老老实实做一辈子五·七学员”。另一个消息说，某领导人刚一回到广州，便“旧病复发”：“上班喝茶水，下班喝药水，月中拿薪水”，“革命群众”看不惯，令其回干校去了。第三个人“年龄老化，血管硬化，思想僵化”，领导劝他“回干校，

等火化”。

会不会也送我回“干校”，9条语录，稍一上纲，就是政治问题。要是真的送我回干校，该怎么办？

干脆，解甲归田，投笔从农，算了。那时我47岁。有4个儿子，大的22岁，小的16岁。都是强劳动力了。再说，土地改革时期，给我分了房子，分了地。回干校，我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老家，说不定还要“教育”别人呢？于是，我得意忘形，居然唱起了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要回到老百姓。

报社领导传达首长指示：加强山区建设，提倡艰苦奋斗。还说，首长发现了典型，称高鹤为山区建设的模范。要报社组织力量，突出报道。这里所说的首长，是指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兴元。此时，他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遵照首长指示，南方日报组成高鹤报道组。组长康裕霖，组员许立源和我，此外，还有4名解放军战士，“文化兵”，报社通讯员。

我们7个人，浩浩荡荡，好不威风。在高鹤，先是听取县委汇报，继而分别各地采访。然后，集中到县，“讲用”，提出报道设想。再同县委一起商讨报道计划。4位解放军战士，年龄都在20岁上下，正是青春旺盛时，再加上中学毕业，有文化。讲用特别认真，也很动人。对我来说，确实受益匪浅。高鹤报道中的灵感、警句，几乎全是来源于他们。4位青年，都很懂礼貌，把我当作长辈，给予热情照顾。我们相处甚好，想起来，还真是打从心里想念呢？

根据采访材料，报道组决定由我写全县概貌，其他6人，各写一个专题。我在概貌中，写了高鹤的治山，治水，修路，造桥，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高潮和精神面貌的改变。全文13000字，配上照片、评论，正好两个版。

稿子带回编辑部，立刻发排送审。

军管时代，非常时期，典型报道的送审稿件，一般要40份小样，分别送给省级领导审查。高鹤报道的送审小样，要印120份，不但送到省级领导，而且要送厅局级的首长审查。如此众多的审稿官员，不知道是由于我执笔的缘故，还是因为典型是由刘政委的发现所为？我只知道，审稿队伍扩大了两倍，一共有240只眼睛。

出人意外的是，稿子还没有送出，就遇到了麻烦。排字房提出意见，说是没有见过这样办报的。打印这么多的送审稿，还要你们这些头头干什么？工人的语言，经过总编室过滤，只剩下了“打印不出来”。于是，总编室人员去找军代表。军代表跑到排字房，找工人面谈。工人尊重军代表，不再说怪话，而是算细账。他们说，13000字的稿子，有7张小样。打印120份要多少



纸张?印多长时间?排字房,每天排多少字,要多少人,都是早有定额,丁是丁,卯是卯。突然增加这么大的劳动量,无法安排,抽不出人。

“不是专门弄了一台打样机吗?”军代表提出质问。

“打样机是要人来开动的嘛!”工人答。

军代表劝说无效,跑来找我。

“我?……”我震惊万分,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算老几?”

从干校回来的领导人,一般都要向职工群众汇报审查结果,还要表明决不向曾经打过自己的人打击报复,叫做“正确对待”。我回到报社,却没有向群众汇报,还缺这门“课程”。要我直接同工人打交道,着实害怕,胆怯。

“工人对你有感情。”军代表解释。“排字房的工人,多是南方日报的,文革中跟你没有直接交锋,再说,他们都知道你做过工会工作,把你当成自己人。”

在军代表的一再央求下,我硬着头皮,去了。

穿过铅字架组成的长廊,远远看见车间主任张辉。我大步走向前去。

“老林,你来啦!”正在排字的青年工人一拥而上,挡住了我的去路。

“听说,高鹤报道是你写的,是吗?”

“哪里,哪里,大家写的,稿子上面不是署着高鹤报道组供稿吗?”我边说边走。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的字迹,你的口气,我们都还记得呢!谁的,就是谁的。不署名,也瞒不过排字工人呀!”

排字房,占的是广东工学院的课堂。高大,宽敞,光线好,空气好,豁亮极了。——我想把话题岔开,便说:“好阔气的排字房啊!比我们‘老南方’排场多了。恐怕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呢!”

我同工人握手致意,问长问短,故意躲开主题,不谈来意。我怕一句话弄错了,不好下台。说话之间,已经来到张辉老人面前。

“你是来拿送审样的吧?”张辉老人亲切地捉住我的双手,和蔼地提出问题。不等我回答,就主动地说:“没问题,你说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送去。”

我哭了。两眼热泪,夺眶而出。我使劲紧握张辉老人的手,连声道谢:“谢谢,谢谢。”张辉老人也很激动,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我,像是吐诉什么苦衷,以致于过了好一阵儿,他才低声细语:“能回来,不简单。我们总算又见面了,真不容易啊!”

送审稿如期分送出去。

240只眼睛,盯着同一份清样,可以看出上千个侧

面。再说,当时的党政官员,都学会了“鸡蛋里边挑骨头”的本领,都有“人人都做批判家”的训练,不同意见,自不待说,只要有谁说声“否”,稿子的命运也就寿终正寝了。稿子后面,本来署着高鹤报道组的名字,但是,不知是谁披露了出去。这就给审稿官员增加了顾虑,也提高了警惕。因此,过了好几天,都没有一篇退回。负责处理高鹤报道的军代表曲惠良同志,逐渐逐渐地收起了笑容,脸的愁云一天一天多了起来。

曲惠良,原在广州部队《战士报》任科长。他勤勤恳恳,善于思索,是个认真负责的好同志。他曾不止一次鼓励我们尽快拿出初稿。还为高鹤报道出谋献策,付出不少劳动。此时此刻,他同我们一样焦躁不安。

就在这忐忑不安的紧张时刻,人们再一次提起那些回到广州又送回干校去的新闻界人物。人们绘声绘色,说那新闻界的有名人物,下去采访,写报道。一不作记录,二不提问题,而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又说刘兴元政委审阅那位头头的稿子时,边看,边摇头,随即写了批语:“看不懂,退政工组。”……

我听着,听着,忽然发现对方是专门说给我听的。我不寒而栗,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时钟敲了12响,已是午夜24点了。

叮铃叮铃,叮铃叮铃……

曲惠良抓起电话听筒,一下就听出是刘兴元政委的声音。

“政委,您好。我是曲惠良。孙主任,陈副主任,刚刚下班。政委有什么指示,我记下来,转告他们行吗?”

“高鹤报道的稿子,不就是你经手的吗?”刘兴元没头没脑,张口就点了曲惠良的名字,以致于使曲惠良不知所措。

“是我经手的。政委,您看怎么样?”

“是谁写的呢?”刘兴元问。

“呵呵,这个同志是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曲惠良以为刘兴元否定了高鹤报道的稿子。又急忙补充说:“他回来不久,还不到3个月,对于当前形势不甚了解。如果政委认为不成,我们再另外派人去写。”

“啊!啊!啊!原来这样。”刘兴元没有立即放下电话。忽然又问了一句:“这位同志是山西人吗?”“不,不是。政委,据我所知,他的老家在河北平原。”

“这么说,他对山区的感情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个……,”曲惠良不知如何回答,又不能默不作声,“据我所知,他原是广州日报总编辑。在早,是人民日报记者。陶铸把他要来广东。……还当过南方日报副总编辑。”曲惠良揣摸不清政委用意,想尽办法使用客观、公正的词句。

“好吧！我再看一遍。”

一小时后，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曲科长吗？我是刘兴元。”

“政委，是我。您怎么还没有休息？现在是凌晨一点多了啊！……”没等曲惠良说完，刘兴元便急不可耐地说话了。

“高鹤报道的稿子，我又看了一遍。是一口气看完的。我认为，可以见报。”

“是嘛，政委，我们核心小组也认为不错呀！”曲惠良如释重负，喜上眉梢，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天一早，曲惠良把刘兴元的改稿，连同其他首长的修改意见，一并交还给我，要我尽快整理、修改，力争早日见报。

1971年四五月间，我被省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南方日报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相当于副总编辑、党委委员）

至此，南方日报党的核心小组有了7名成员。军队干部4人，地方干部3人。

我在南方日报担任领导职务，实际上只有七八个月。时间短暂，经历却非同寻常，体会也特别深刻。我曾不止一次回味，如果不是这七八个月的领导职务，我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报纸是怎么鼓捣出来的。

也因为有了这七八个月的领导职务，我才得出结论：“文化大革命”搅乱了一切，破坏了一切。在这一切的一切当中，报纸首当其冲。不光破坏了报纸的正常出版，而且也把报社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搅得一塌糊涂。实在是一场战争性的浩劫、灾难。

按照中央规定，日报应在凌晨2时截稿，4点钟以前开机印报。从开国大典到“文化大革命”，一直按照这个规定行事。可是——1971年7月16日的南方日报，是这天傍晚7时开机印报的，比正常出版时间迟了15个小时；1971年9月18日的南方日报，是18日夜晚19时开机付印的，比正常出版时间迟了17个小时；1971年国庆节期间的报纸，即10月1日、2日、3日的报纸，是3日午夜同时交版、开机付印的，读者是4日上午收到4天报纸的。

南方日报的夜班编辑，通常是夜晚9时上班，凌晨4时下班，工作7小时。可是，现在，持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几乎成了定律。原来的单班制，吃不消，增设了“二梯队”、“三梯队”。就是说，天亮以后，如果还不能交版付印，便由“二梯队”接上。如果下午23时还不能交版付印，便由“三梯队”接着干。

当时的南方日报，是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

发行到全省各地。广州地区以外的报纸，要由客运火车、飞机、轮船和长途汽车运送。中央规定4时前开机印报，也是为了赶上早班车、船、机。错过这个时间，当天的报纸便运不出去。外地读者就看不到当天的报纸。政治上的损失暂时不谈，经济上的损失是罚款。第一天的报纸运不出去，就要同第二天的报纸集中一起托运。这样一来，超重、超载，影响客机、车船的安全运行，很容易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1971年7月6日，由我值班。凌晨2时，接到新华社的“等稿”通知。说有重要新闻，“请勿关机”。这是对接收新闻稿的电台的通知，也是对全国各地的报纸编辑部的命令，还意味着这条新闻必须当天见报。

通常，可以询问“等稿”内容，可以询问大体字数。可是，这天，所有问题概不回答。而且，每隔半小时，便重复一次等稿通知，表示稿件特别重要。

4版报纸，本来早已编排完毕，只因这条等稿消息，不能交版付印。

夜班编辑，从来都是分秒必争。对他们来说，坐在办公室等稿，比等待情人相会还要心急。他们想早一点知道消息内容、字数，以便考虑放在什么地方，留出多少版位。因为新华社拒不回答，编辑请示军代表，军代表要他们打电话问人民日报。原先，人民日报很客气，有问必答。这次，一反常态，非常冷淡。给人一种“不再来往”的不祥之兆。他们冷冰冰地回答说：“我们人民日报不承担领导省市报纸的任务，如何安排版面，请向省委请示。”

碰了钉子。编辑们越发感到事非寻常，越发想早一点知道消息内容。军代表指示，给光明日报打电话，给北京日报打电话。电话打了，但是，一无所获。因为他们也在等待着。

早晨8点钟，军代表从省革委会得到消息，说“重要新闻”的内容，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特使基辛格访华。并说，从7月9日到11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双方议定，16日上午10时，两国同时发表新闻公报。还说，公报只有161个字，人民日报准备放在右下角。题3文2，直排。……有了这些，本来可以组版，画样了，但是，编辑不敢动手，一级请示一级。说新华社的电讯稿还没有来，省革委会的消息，准不准呢？要是万一多出来或者没有这么多字怎么办？再说，标题怎么做？用几号字？要不要眉题？副题？

根据军代表指示，夜班编辑给《解放军报》打了电话。

“公报安排问题吗？我们也在等。人民日报也还没有最后决定。一旦有了准确讯息，马上打电话转告。”解

放军报的同志很客气。

另一军代表说：“听说，上海的文汇、解放，同人民日报关系最好，别家报纸问不到的事儿，文汇、解放都能问到。”

于是，给解放日报打电话，给文汇报打电话，打去都是一个“等”字。

记不清是谁，说江西日报消息灵通，同北京某报甚为友好。江西日报的军代表，是广州军区任命的。如果他们得到确实消息，不会对我们保密。

于是，用军代表名义，给江西日报打电话。江西日报却说：“我们正准备给你们打电话哩！我们给北京、上海也都打了电话，但是，都没有结果。”

广州军区的下属部队，还有湖南、广西。

于是，又给湖南日报社挂电话，给广西日报挂电话。凡是有点部队关系的省或市，包括福建、湖北全都挂了电话，全都不知道如何处理。

上午，9点40分钟，新华社开始播发公报全文。内容，字数，同省革委的“传闻”一模一样，只是公报改成了“公告”。

夜班编辑急忙打开收音机，又急忙摆好录音机。编辑要录下音来，目的是同新华社的电讯稿核对。可能的话，还可以找到解决安排版面疑难的办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0点钟播发了公告的口播稿，同新华社播发的电讯稿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然而

“公告只有两个字，怎么标题？要不要另标新闻题？用宋体字、楷体字、还是黑体字？”编辑提出问题。

电话打了半个中国，没有解决问题。现在，只好再打长途。

夜班编辑的眼睛，一直盯着解放军报的电话。每隔半小时，就打一次电话。直到中午12时，解放军报在长途电话上回答：“我们的值班编辑，全都游泳去了。——北京的天气，好热呀！35度以上啦！编辑们要到下午2点才回来。请你们在2点半以后再来电。”

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肯说如何处理。

“现在还有一条路：等人民日报的传真版。”总编室的同志提出了方案。

接收人民日报传真的机器设备，就在我们南方日报大院，近在咫尺，是条捷径。我马上发号施令：就地休息。

同时，派一编辑到传真室坐镇。我告诉他，只要传真的机器一开，马上打电话给我。

我随手拉过一把躺椅，靠在电话机旁。我很累，想

睡。但是，无论如何睡不着。脑子澎澎乱跳。我已经连续工作15个多小时了。

1971年9月15日，

深更，夜半，12时。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工组长单印章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他办公室。我来南方日报，几乎没有同省的任何领导同志联系，单副主任是军队干部，见过面，顶多是在会前会后握握手，点点头，说声你好。如今，突然打电话给我，究竟有什么事？

从报社到省革委会的汽车上，我万般猜测，不得要领。汽车忙不迭地停在省革委会办公大楼底下。我灵机一动，对司机说：“马上去接陈越平副主任，就说单副主任有请。”

警卫人员似乎早有准备。我刚一跨出车门，便带我走到电梯门口，还替我按动开关，伸手示意，说了一声“请”。

按照部队习惯，上级对下级，一般是开门见山，没有俗套，在这深更半夜，单副主任更是言简意赅。

“革委会决定，从明天开始，由我审阅南方日报的大样。你要派人准时送大样给我。”我掏出笔记本，记了下来。

“其次，为保证报纸按时出版，你要把第一版的小样，提前3天送我。不经我的同意，不得组版见报。”

陈越平破门而入。单副主任感到诧异。我急忙解释，是我请陈副主任前来接受指教的。“那好，那好。”单副主任满怀喜悦，并把前面说的话，又重述一遍。这才继续说：“第三，从明天起，不许外出采访的记者、编辑乘坐飞机、轮船。

“第四，供记者、编辑采访用的汽车、摩托车，一律不准开出市区。

“上述规定，如果确有需要，要事前请示，送我审批。”

我在埋头记录，陈越平也在埋头记录，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举措，我们2人毫不动容，没有问个为什么。

陈越平问单副主任还有什么指示，表示告辞。我一手抓起单副主任面前的电话机，要南方日报总机帮我接通食堂的电话。我知道，编辑人员全在食堂“宵夜”。要是再晚一会儿，白班人员就下班了。我找到总编室主任，要他通知各组正副组长，到小会议室集合。我还告诉他，陈副主任和我，都在省革委会，我们马上回报社，有事相商。

传达完单副主任的指示，马上有人提出问题：“备战，战备，备谁？跟谁作战？敌人在哪？”

记不清是谁，立刻站起来，诙谐、幽默地说了两句

俏皮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嘛！”说完，他拔腿就走，其他人等，也都跟着退了出去。

是啊！敌人在哪？跟谁作战？

我忽然发现，我们的革委会主任孙惠畴同志，两天没有上班，党的核心小组的军队干部，也都没有前来。再看其他军管人员，有的愁眉苦脸，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有的诚惶诚恐，像是真要“备战”一般；有的一反常态，忽而东，忽而西，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偶尔问起孙主任，甲说下乡了，乙说生病了，丙说开会去了。尤其令人疑惑的是，送审大样上的签字，写的是单印章的名字，笔迹却是孙惠畴的手书。

地方干部蒙在鼓里，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有个女仔，从《美国之音》听到消息，悄悄告诉我：“林彪出事了。”但她不肯说出了什么事；另一个男仔，从港澳来客哪儿知道，“林彪完蛋了。”但他只说结果，不说过程。在我一再追问下，他说：“港澳报纸大登特登，全世界都知道了。”

中国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的事，中国人不知道，办报的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推理。

由于职业的本能，我立刻联系到办报。这几年，揪出谁，谁就从报纸上消失，不再见报。既然林彪出了问题，当然就不再让他的名字见报。至于批判，恐怕还要迟一些时候。连陈伯达，不也是用“政治骗子”一词来代替的吗！

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领导人不给我明讲的事，我不问，绝对不问。“文化大革命”使我的固执性格上升了一级，更加不予过问了。

9月18日，大样送了去，直到上午10时，还不见退回，为什么？

我把4版大样再看一遍。

4版报纸，有3个多版是新华社的电讯稿，我们自己的地方稿，只有一篇通讯，一篇评论。两稿合在一起，也不到一个版的3/5。就是说，这天的南方日报，80%的篇幅，用的是新华社的电讯稿。于是，我在那仅有的多半版的地方稿上找问题，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林彪的名字，也没有林彪的语录。理应准许交版付印才是。

为什么扣住不放？我问总编室的编辑，想试探试探他们有没有“内线”。编辑不言不语，只把嘴巴努了两下，示意我看时事版上的照片专栏。

这时，单印章打来了电话，要我把时事版上的照片专栏换成文字稿。他不说为什么，也不说有什么问题。我放下电话，再问总编室的编辑：“照片专栏是纪念‘九一八’的，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更换？”

“……”总编室的编辑，还是不言不语，用手指头



作者林里和儿媳、孙女

使劲捅了捅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是林彪在平型关指挥打仗的镜头。

电话来了，又是单副主任找我。

“人民日报的传真版开始传真了没有？”

我问过传真室，回答说没有。

“我要到传真室参观。他们什么时候开机？有了准确消息，马上打电话给我。”

不知道是不是也因为同样的缘故，这天的人民日报，又是下午2点钟以后，才开始传真的。

陪同单副主任参观传真室，我顺便说了关于照片的问题。我告诉他，照片是预发稿，几天以前就制版备用了。按照南方日报的惯例，值班人员一般不看电讯稿。单副主任不置可否。他在聚精会神地查看传真版。看了一版又一版。当他看完人民日报的时事版后，情不自禁地笑了：

“你看，人民日报也没有用那组照片呀！”

“啊！单副主任原来是来‘对版面’的呀！”随从参观的军管人员跟单副主任开玩笑。直说得单副主任面红耳赤，十分尴尬。

“单副主任，现在可以开机印报了吧？”为了冲淡玩笑引起的僵持局面，我急忙岔开话题。

“可以，可以。”单副主任同大家一起，一笑了之。

单印章亲自下来“对版面”，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对版面”的合法化，或者说是对“对版面”的工作方法的肯定。当然，也说明，“怕”，不光存在于地方干部当中，也存在于军管领导人员当中。

从此以后，对版面已不再打长途电话，而是等人民日报的传真版。——传真版一来，依照葫芦画瓢，绝对没错。

（责任编辑 杜 晋）

## 叶剑英和马万祺谊深情笃

● 范 硕

惊闻叶帅驾归天，痛失元勋意黯然。  
赤胆忠心酬党国，鞠躬尽瘁效先贤。  
安邦定国传千载，厚德真诚载万年。  
有幸亲情垂四代，长江浪盼后推前。

这是1986年10月马万祺先生悼念叶剑英同志的祭诗。

马先生，广东省南海人，曾获澳门东亚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博士学位。他是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他在企业界、文化界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量有益于祖国的工作。他和叶剑英有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交往。马先生酷爱诗文，更喜爱叶帅的诗词，两位可说心曲相通。

早在三十年代，在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初期，马万祺从要好的朋友柯麟医生那里知道叶帅其人，柯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叶帅大革命时期的战友，和叶帅一直保持着联系，相知甚深。他常常向马先生谈起叶剑英许多传奇般的革命故事，使马先生听得入迷，从此便十分敬仰这位伟大的革命家。1944年以后，柯麟出任澳门

镜湖医院院长，负责党的地下联络工作。马万祺先后任该医院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不久，广州解放。叶剑英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华南军区、广东军区司令员，集党政军领导重任于一身。当时解放军在向广西进军和海南岛战役中，迫切需要从港澳向大陆输送一些急用物资，而当时从香港运进较难，叶帅便指示侧重从澳门进口，柯麟医生及其弟弟柯平与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马先生商议，马先生听说是叶帅嘱办的事，立即行动竭诚协助南光公司积极筹办，并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大批粮食和五金、器材、汽油等应用物资，支援大军解放广西和海南。

1950年5月，欣欣向荣的祖国首次邀请中华教育会理事长马万祺和黄长水先生共同组织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回内地观光，全团由港澳工商界及文化、新闻、医务等各界人士共70多人组成，黄长水任团长，马先生任副团长。东风作伴好还乡，他们一行抵广州后，首先受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叶剑英主席、方方、古大存副主席

的热情接待。马万祺第一次见到叶帅就好象见到家乡亲人一样,无拘无束,倾吐衷肠。他虽然尚未见过叶帅,当他的老朋友方方和统战部长饶彰风等作介绍时,一见如故,叶剑英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嘘寒问暖,微笑着说:“你为祖国做了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叶剑英身居要职,却平易近人,对海外侨胞和民主人士礼遇有加,不但设宴款待,还单独接见,亲到迎宾馆畅叙家常。他那时雄姿英发,谈笑风生,一派儒将风度。在交谈中,他敞开心扉,对港澳的爱国工作非常支持,勉励马万祺立足当地,团结大多数同胞,热爱祖国,支援祖国建设,并警惕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

马万祺这次回国观光,从广州到武汉、北京、天津、沈阳、旅大、长春、哈尔滨、南京、上海等十多个城市,并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李先念、李富春等同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

在离开广州,将去东北观光之际,马万祺欣然命笔,作诗一首。“序”云:“余将赴东北观光,首途广州,蒙叶剑英主席热诚款待,亲如家人,作此志感。”诗曰:

北国观光万里行,广东首长意真诚。

迎宾馆叙家常话,赢得侨胞仰慕情。

港澳工商界观光团从东北观光回到广州,马先生和董事长倡议组织广东省政府和港澳海外侨胞合资经营实业公司,以推动海外侨胞投资,促进广东和国内的工业建设,发展经济。这个倡议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从此以后,马先生在叶帅的鼓励下,积极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内地参加祖国各类工业建设投资,参加物资交流会、出口商品交易会等活动。1952年至1953年间,他经常应邀到广州出席会议,多次有幸直接聆听叶剑英讲话。他的演讲,或谈形势,或讲建设,或忆往事,或叙乡情,既实在又风趣,款款说来,娓娓动听。常常是讲今比古,妙语珠玑,引起会场上时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使马万祺激动不已。那时叶帅工作极忙,在会议休息时间,特意和港澳人士联系,找机会和马万祺等交谈。每次会见,都使大家感到温暖,很受教育和鼓舞。他向大家介绍清匪反霸和工农业建设成就,时常询问澳门局势,并一再嘱咐马万祺要适当地情况,与当地群众结合,树立长期观念。他还虚心征求各方面意见,凡是马先生和港澳人士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只要合理的,又能办到的,他都亲自料理。即使办不到的,也向他们解释清楚。那时马万祺听到中山县在土改中落实归侨政策有些问题,曾向叶帅反映,叶非常重视,当即答应调查,慎重处理,不久便落实了政策。

1954年以后,叶剑英从广东调回北京,与马万祺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他仍然没有忘记马先生,经常捎信

问候。尤其使人难以忘怀的是十年浩劫的那些岁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一伙即对叶剑英进行迫害。马万祺在澳门陆陆续续听到一些不好的传闻,听说老帅被打成“二月逆流”,孩子们也被投入监狱,感到十分不安。那时马先生的两个大孩子,长子马有建在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工作,次子马有恒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林彪党羽得知马与叶帅的关系,便指使造反派拘禁马家的孩子,企图逼供“黑材料”,制造攻击叶帅的“炮弹”。孩子们断然拒绝了。叶剑英知道后,非常气愤。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仍排除困难,设法搭救保护马万祺的儿子,把他们接到住处,留在身边。他象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亲自给他们讲革命历史,教他们读书学诗,嘱咐他们不要乱跑,还同他们一起游泳、打乒乓球,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马先生和他的全家每念及此,都感激叶帅的大恩大德,更令马氏夫妇和孩子们感激不尽的是,次子在叶帅身边滞留期间,叶帅十分关心他的婚姻大事,经与廖承志商量,为他介绍对象,后与荣毅仁的娇女荣智婉订婚,结为秦晋之好。

1969年至1970年间,马万祺的肺病发作,时好时坏。叶帅知道后,特别关心,要他将病历从澳门寄来,并请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著名教授钟惠澜和在京的著名肺科大夫为马诊断。后来,叶剑英特邀他到京,又请了吴垣兴、钟惠澜、吴应凯及首都几家医院、北京结核病研究所的著名专家教授为他会诊。马先生因为沉痾在身,心情急躁,提出只要可以做手术,就不如彻底将肺切除,剪除后患。而六家医院有五家主张做手术,一家认为可做可不做。最后报请叶帅裁定。叶帅询问病情,又仔细看了病历,劝马用医治肺结核的新药治疗,不赞成手术。马先生遵照他的意见用药,果然奏效。马万祺感动地说:“这多亏叶帅的关怀帮助,使我战胜疾病,幸福地活下来。”

“文革”期间,只要条件允许,马万祺每年都要争取回内地一两次,只要有会,每次回来总要去探望叶剑英。那时群魔乱舞,人妖颠倒,全国陷入极度动乱之中,他总是担心叶帅的安全,但马万祺没有料到,他每次看到叶剑英,叶帅都是那样没哲乐观,稳若泰山,即使在受到监视、“审查”那一段时间也是如此。从叶帅身上马万祺得到不少启示和力量。有一次他去看望叶帅,老人家身体欠安,他祝叶帅健康长寿。叶剑英点头致谢,小声默诵曹操的《龟虽寿》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经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叶剑英怕马万祺听不清,特意拉过他的手,在手掌上写了“老骥伏枥”四个字。马万祺心领神会,暗自想到年逾古稀的老帅,虽然不得已



“韬光养晦”，但他对国家大事依然耿耿于怀，志在千里。

在十年动乱期间，叶剑英身处逆境，遭到迫害，但他逆流而进，勇敢搏击，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各种方式的斗争。

林彪“自我爆炸”后，叶剑英的处境稍有好转，仍在与“四人帮”苦苦周旋。征途坎坷，重任在肩。1973年春，马万祺又去看他，叙谈甚欢，马先生向老人家表示，以后每年至少看望他一次，祝福他“寿比南山”。叶帅听了微笑点头，表示谢意。这一年，马万祺写了《再祝叶帅寿辰》的诗。诗曰：

京华几度同欢叙，领益良多仰劲松。  
大树雄风天可柱，将军怀抱海能容。  
平生肝胆追红日，一片丹心透九重。  
唐代汾阳功不匮，位高名显半儒庸。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北京人民为了悼念周总理，冲破“四人帮”的种种禁令，纷纷走上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白花，发表演讲，朗诵诗篇，愤怒声讨了罪恶滔天的“四人帮”。“四人帮”慌了手脚，导演血腥镇压的“四五”惨剧，扬言要抓天安门悼念活动的后台邓小平和叶剑英。其时，担任澳门乒乓会会长的马万祺正率领澳门乒乓球队访问朝鲜，归途路过北京，又适逢叶帅寿辰，遂偕夫人罗柏心女士去向正在“养病”的老帅祝寿。叶剑英此时此刻，见老朋友来访格外高兴，招待他们夫妇共进晚餐，暗示自己并无大病。“老骥伏枥”，依然故我。此次虽未多谈，但马先生伉俪看到老帅依然那样稳健达观，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默默祝福他老人家劲松常青。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之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在此危急时刻，叶剑英不负重望，挺身而出，精心筹划，在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马万祺在澳门欣闻这个喜讯，当即挥毫，作诗为贺：

电闪鬼狐警，将军一怒平。  
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  
德厚人歌颂，风调物阜生。  
鞠躬钦尽瘁，济济庆功成。

清除“四害”，举国欢庆。马先生当时喜不自禁，赋诗之余，又填《沁园春》一首，词曰：

锦绣神州，云驱雾散，一片光明。看红旗漫卷，妖氛扫尽，人心大快，举国欢腾。

启后承先，指挥若定，除“四害”深庆得人。兴中国，有宏才伟略，八亿同心。

工农秣马厉兵，树雄心壮志把天擎。

喜老帅安康，胸怀浩荡，狂澜屡挽，竭尽股肱。

放眼江山，恩情万种，八十年华盛誉享。

最难得，是忠心党国，社稷苍生。

打倒“四人帮”，人心大快，祖国山河，阳光普照。

叶剑英以耄耋之年，身负重任，全力扭转局势，拨乱反正，清除流毒，为振兴国民经济，健全民主与法制，实行改革开放而呕心沥血，尤其注重团结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开展侨务工作，推动祖国和平统一。1977年4月17日，叶剑英以人大委员长身份邀请港澳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事，特设宴招待何贤、马万祺先生。马先生欢快异常，诗兴大发，写《欢乐宴》一首，回敬叶帅：

欢乐宴，  
举酒千杯欢欣遍，  
万众同心愿；  
恭祝老帅长寿，  
再颂国家强盛，  
三愿宏图早实现，  
壮志如虹练。

粉碎“四人帮”后，百业待兴。八秩高龄的叶剑英犹然风尘仆仆，巡视大江南北，研究解决四化建设问题。马万祺出于对叶老帅的爱心，陪同他到广州、珠海、深圳等地视察。马先生从叶帅甘冒酷暑，为国事辛勤奔波的实践榜样中受到教育和鼓舞，自己也处处关心祖国四化大业，献上一片赤子之心。

1978年3月，为了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高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来自全国各条战线上的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学者、济济一堂，研究制定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在这样一个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上，邓小平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叶剑英填《忆秦娥》词，特致祝贺。马万祺在澳门闻此盛会，依叶帅词韵亦填《忆秦娥》一首，为之祝贺。词曰：

赶科学，神州俊杰争飞跃。  
争飞跃，必然王国，自由王国。  
攻关勇向尖端索，雕弓敢把苍龙缚。  
苍龙缚，卫星交响，红旗燎烁。

“人生贵相知”。马万祺在同叶剑英长期相处过程中，相知默契。他感到，叶帅待人处事，真诚厚道，廉洁和藹。他常向身边的人员和子女说，叶帅兼有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适应性这两种高贵的品格。人们都愿接近他，向他坦露心怀，“无事不可对他言”。凡是和叶



叶打过交道的国内外同胞都有同感，有口皆碑。

马万祺与叶剑英的友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血与火的考验，患难铸真情。他虽然远在澳门，但是一颗赤心是永向北，向着叶帅的。每逢叶帅的寿辰，他总不忘记前去祝贺，即使因故不能亲自拜谒，也写诗属文，以为慰藉。

1980年作《咏老帅》：“指点江山情未已，叮咛后继倍依依。”1982年4月20日写诗一首：《恭祝叶委员长八十五寿辰》。

1985年，马万祺得悉叶帅卧病，极为忧虑，夜不成寐，书《怀念老帅》，以表达思念叶剑英的深情：

北望京华思老帅，平安喜讯慰心田。

气功谱就黄昏颂，温暖人间十五年。

叶剑英病情恶化，长卧不起，终于在1986年10月22日凌晨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举国志哀。“惊闻叶帅驾归天，痛失元勋意黯然”。马万祺立即发出唁电并与夫人罗柏心携子女离澳，赴京奔丧，痛悼这位由衷敬爱的开国元勋和良师益友。

叶剑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行由邓小平题字的叶剑英半身石雕像、墓碑的揭幕和灵骨安放仪式，马万祺特地从澳门赶来参加凭吊，并在《人民日报》上著文《感怀叶帅同胞情》。文

中写道：“敬爱的叶剑英元帅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追忆与叶帅相处的那些日子，想到他对我亲切关怀和教诲，不禁潸然泪下。”马万祺回忆往事，不胜留恋，瞻望祖国建设形势和美好前景，由衷喜悦。他在文章最后写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完全适合我们的国情，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拥护。祖国的建设成就辉煌，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声誉日隆。1985年和1987年间，先后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归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为台湾的回归、早日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叶帅在天之灵，亦将感欣慰。这是老人家多年的夙愿。叶帅对祖国对人民立下的伟绩，随着岁月的迁移，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的心中。”

为了缅怀叶剑英，这些年马万祺每年到北京开会，总是以深切怀念的心情去叶帅故居瞻仰，在他过去晤面叙谈的屋子里坐一坐，而且每每利用节假日邀请老帅的子女与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聚一聚，忆叙往事，启示未来。由此也可以看到，马先生对叶老师的一片赤诚和爱慕之深。

## 《中华周末报》

《中华周末报》四开16版，周五出版，文摘为主，每期近十万字，是我国目前容量最大、拥有读者最多的周末报之一。

《中华周末报》集全国各地书报刊之精萃，并刊登本报精心组织的专稿，融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于一体，贴近生活，紧跟时代，突出热点，适合各种层次的读者赏阅。

《中华周末报》辟有“本报专稿”、“百姓视点”、“周末扫描”、“环球经纬”、“竞技场”、“经济广角”、“生活与法”、“市场景观”、“消费指南”、“家庭、人生”、“文采风流”、“卫生与保健”、“科学与未来”、“纪实与连载”、“娱乐休闲”、“演艺圈”等16块专版。

《中华周末报》以其独有的品位，走俏市场，倍受各界朋友青睐。

《中华周末报》单价0.80元，全年定价40.80元，邮发代号1-205。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欢迎订阅，欢迎荐稿。

报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858.5980

图文传真：858.5981

## 《法制文萃报》

由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制文萃报》，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到广大法律爱好者的交口称赞。创刊四年，已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法制文摘类报纸。

1996年，《法制文萃报》将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强化权威性，增加服务性，扩大信息量，更具可读性，以适应广大读者日益提高的法律意识和阅读欣赏水平。更精、更广、更新、永远是《法制文萃报》的追求。

欢迎订阅1996年《法制文萃报》。邮发代号1-163。四开八版，每星期四出版，月订价：2.60元，全年订价：31.20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 宋庆龄

## 与三个美国友人的交往

● 唐宝林

宋庆龄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在抗日战争中，她为争取国际援助中国和中国援助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因而与许多国际友人结下了深厚而感人的友谊，这里简述她与斯诺、史迪威、卡尔逊三个美国人的故事。

### “你属于中国”

1931年9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华的时候，在中国当记者的埃德加·斯诺应美国《先驱论坛报》之约，准备撰写宋庆龄传略，请求拜访宋庆龄，宋热情地接待了他，从此开始了俩人长达40多年的友好交往。那时，斯诺还是一个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有误解，而对蒋介石政权有幻想。宋庆龄经常坦率而耐心地向他交换意见，深深地感动了斯诺，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正如他的夫人惠勒·斯诺所说：“斯诺对这位英勇的妇女极为钦佩，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置身于革命一边。”于是，斯诺也开始同情并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工作，尤其在抗日救国斗争方面。1935年，日本侵吞我国东北领土后，策动华北“自治”，企图不战而得华北五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北平的学生于12月9日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当时在北平读书的黄华、姚依林等一些爱国青年在伟大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中，曾得到宋庆龄和斯诺的帮助。

1936年，斯诺为了感谢宋庆龄给他的帮助，纪念这一段友谊，把自己呕心沥血花费五年多时间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献给了宋庆龄。这年7月，这部集子在伦敦出版时，斯诺在卷首写了这样

的献词：

献给 S. C. L (宋庆龄)，

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这个集子收进了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十余位进步作家的作品。斯诺说，他在这些作品中，不但“看到了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伤痕血迹，还看到这个民族倔强高贵的灵魂”，看到“正在改造着中国人民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

这年6月，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获准到当时被封锁而完全隔离于外部世界的陕北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采访了三个月，写出了震惊世界的巨著《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斯诺从此一举成名，被誉为“建立了本世纪一位记者单独做到的最伟大的功勋”，“西方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很快陷于敌手，抗战形势十分困难。宋庆龄与斯诺又紧密合作，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发起“工业合作化运动”，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并把成千上万的难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收养战争和饥荒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等等。

1941年，斯诺因在宋庆龄的支持下，首先向国际上报道了国民党袭击抗战先锋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触犯了蒋介石，被勒令回国。临行前，宋庆龄对他说：“你以后回来吧，你属于中国。”

以后斯诺果真多次来华，与宋庆龄共叙友情。1972年，斯诺在瑞士逝世后，家人又根据其遗愿，将其一半骨灰安葬在他走向光辉的起点——中国北京西郊燕园未名湖畔。

雪中送炭人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时，史迪威正好在华盛顿度假。从此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多次来华。1942年1月，美、英、中等国为协调太平洋上对日作战，成立了西南太平洋区统帅部。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包括越、泰）最高统帅，史迪威任美军驻该战区司令兼蒋的参谋长。因此史与中国上层人物的关系十分密切，对比之下，他深深地被宋庆龄的风采和远见卓识所吸引。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些人的不同评价和好感情感：1942年4月1日，“关于蒋夫人”（宋美龄）“她是一个机智和灵敏的好人。看来了解西方的观点，刚直，强硬，殷勤，崇尚权力，喜欢出风头 and 谄媚，对历史很淡薄。

……文章写得很动人，却很浅薄，……会装得很迷人。”1942年8月4日，“孙夫人（宋庆龄）是三个女人（指宋氏三姐妹）里最容易相处的，或者也是最有修养的。她富有情感，可亲，安静庄重，见闻很广，穿得很高贵。”

因此史迪威总是喜欢与宋庆龄长谈，探讨中国和世界的各种问题。在宋的帮助影响下，他比较客观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坚决主张共产党应与国民党一样地得到国际援助。1944年7~8月间，他派出两批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和几个抗日根据地访问。他们写的调查报告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因此，他在宋庆龄支持共产党游击队的工作中给予了许多特殊的帮助。当时中国与外面的通道只有一条滇缅公路，由史迪威控制。他经常帮助宋庆龄用这条公路接运外来物资，又同意让从印度飞来的美国军用飞机，帮助宋庆龄将药品及救济物资运往延安等各个解放区，甚至从他管辖的军用仓库里拨出一些药品和物资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有一次，国外捐来一架大型X光机。那时能飞到延安去的只有美国军用飞机，可是这部X光机的体积太大，搬不进舱口。当时做周恩来的助手又曾是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回忆说，我请示恩来同志，他叫我去跟庆龄同志商量，庆龄同志让我去找史迪威将军的杨副官。那是一个夏威夷华侨，深得史迪威信任。我把情况说明后，他立即报告史迪威将军。史迪威向来钦佩孙夫人，一口答应帮忙。而且怕夜长梦多，立即下令改建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把X光机装进去就飞往延安。宋说，这台X光机是当时人口已达九千万的解放区第一台和



### 宋庆龄与史迪威

仅有的—台。

由于如此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史迪威终于得罪了蒋介石。美国总统罗斯福最终让步，决定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20日，史在接到回国调令的第二天日记中写道：“忙极”，但还是“去看孙夫人”，告别，“她哭了起来，难过得很。”由于从1913年大学毕业追随孙中山开始太多磨难，宋庆龄平时很少哭泣，特别是当着外国人的面。这说明对史迪威友情之深。日记还写道，她忿忿不平地表示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去向美国总统说明事实真相，指出他的决定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史迪威努力安慰她，并互道珍重。

### 英雄所见略同

埃文斯·卡尔逊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在1929年南京中山陵奉安大典上，他说见到宋庆龄“在深沉哀痛中跟着她杰出的丈夫的遗体后面去到他在南京紫金山陵墓的最后安息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他实际作为罗斯福总统的顾问来华考察，他不仅广泛地与国共两党高级人物交谈，而且深入到国统区和华北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全面调查。1938年12月，在这次考察结束回国前，他特意来到香港，带着他考察中获得的印象、结论和问题，与他视为“中国局势中的关键人物”宋庆龄交换意见。他说：“我想知道，在这危急关头，她的态度如何”，以作为“我对这场伟大斗争的数月观察的结束”。他后来写道，宋庆龄“自然地诚恳地”接待他时，“具有我在八路军中遇到的‘不要客气’的态度，使我觉得象在家里一样”；“当我向她讲一些我在北方的经历时，对我所说的人民的各种反应，她常快活地插话。”结果，从他后来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看到，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卡尔逊

完全同意宋庆龄的观点，例如：

宋庆龄当时猛烈抨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日本侵华采取绥靖政策，即声称“中立”，实际上大发战争财，把大量武器和战争物资卖给日本。卡尔逊说他在华北某地考察时曾巧遇在那里检查工作的邓小平，邓也说“去年，美国向日本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当时他不相信，认为必是共产党把电讯搞错了。后来，他终于弄清事实真相，特别这次与宋庆龄交谈之后，知道美国确实把大量“废铁”等物资出售给了日本。日本便使用来制造枪炮弹药，屠杀中国人民。于是，他不得不完全同意中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谴责，并且与宋庆龄站在一起，积极投入制止美国援助日本的斗争。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辞去了军官的职务，因为“政府官员是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涉及国际事务方面的意见，以免使他们的政府难堪”。

卡尔逊尤其赞赏宋庆龄关于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的论述。“七七”以后，宋庆龄曾以日本轰炸机追击英国大使，险些儿送了他的命；日本军舰拦阻英国商船，阻止其对华贸易；轰炸美国侨民，袭击美国教会医院，炸死护士、医生和伤兵等事实，向西方人士说明，日本侵华也损害着西方国家的利益。卡尔逊也以他考察所得对此提供许多实证。他亲眼看到日军在侵占上海时，一个机枪小队完全无视租界的“中立”和“不可侵犯”性，肆意向法租界射击，打死《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老板斯蒂芬斯和里彻博士。因为他们曾指控日本侵略，惹怒了一个日本报人，从而遭到这个暴行。而且，据卡尔逊考察估计，在日军侵沪战争中，他们虽不敢攻入租界，但由于起火和轰炸，“外国财产的损失约有一亿美元”。



宋庆龄与斯诺

讲到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时，宋庆龄说：“中国不仅是为了这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日本法西斯……不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而且也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和平与自由”；“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一个自由的中国，是对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一个自由的中国，将是全世界向和平与自由迈进的第一与最重大的步骤。”卡尔逊就此发挥说：“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声称要为亚洲的民主而战是可笑的，可是，对我们这些从近处观察这场战争的人来说，中国人的声明并非奇谈。如果中国人被打败，日本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帝国。……处在西半球的我们，一定要认识这场斗争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极权国家企图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它们的势力，摧毁民主的理想。欧洲战争和亚洲战争是同一斗争的主要组成部分”。他还强调指出：“中国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自己有权力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如果她能保持独立，她将在亚洲成为一个民主的堡垒。”

不仅如此，他对日本要征服世界的野心的观察，与宋庆龄一样深刻，说：“我对远东政治已观察了12年，其中8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其间常去日本，我的观察使我相信，控制着日本的海军集团有着贪得无厌的权欲，如果不予制止，有朝一日这个国家在东太平洋将向美国挑战。”这个预言是在“珍珠港事件”前3年说的。

可是，卡尔逊起先并不同意宋庆龄对国民党腐败和共产党将获得胜利的观点，但对她概括的“新中国的精神：忠诚、不自私、强烈爱国、为更好的更平等的生活方式而不知疲倦地工作”，极表赞同。他认为宋庆龄本人就是这种精神的象征，从她“装饰朴素的房间，我看到了这位妇女的精神”，“她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她任主席的中国保卫同盟，在她的指导下，同盟正在从国外筹集资金和补给品，用来开办和装备医院，照顾前线的伤员，救助难民。她要使每一元钱都用在正处。在她鹰一般的眼睛下面，绝没有资金进入无耻官员的腰包。”

在宋庆龄的帮助和事实的教育下，1946年，卡尔逊终于预言：“中共将取得胜利。”

斯诺、史迪威和卡尔逊当时与罗斯福的私人关系都很好，由于宋庆龄的工作和他们的影响，抗战后期，美国对中国的中共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这是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美国与中共关系最好的时期。

# 高树勋 率部起义 亲历记



● 吴景略

作者吴景略近照

1945年11月，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有一支队伍称作民主建国军。这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我当时任高树勋的机要秘书，参与了这次起义的全过程。这支队伍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零八个月，但在历史上不能不载上一笔。

## 平汉战役与高树勋起义

高树勋在平汉战役中率部起义是解放战争开始之初载在史册上的一件大事。他的起义对于我军阻挡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解放区，取得平汉战役的伟大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37页）

上党战役尚未完全结束，平汉战役是蒋介石为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于1945年10月，进行的一次战役。当时，蒋介石命令十五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所辖的三个军由河南新乡北上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打通平汉路，进驻石家庄。这三个军是高树勋的新八军，马法五的四十军，鲁崇义的三十军，另外有附属新八军的一个纵队，人数约45000人左右。孙连仲本人已经飞往北平，这三个军由十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宋肯堂负责指挥。

10月14日这三个军从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向北前进。由于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所以敌军前进较快。10月20日敌军先头部队已经渡过漳河。22日主力全部渡过漳河，分为左右两翼交错掩护前进。24日上午，新八军与三十军跨过滏阳河，占领磁县，进到马头镇。当夜我晋冀鲁豫军区由陈锡联任司令员的三纵发起反

攻，与敌新八军形成对峙状态。敌右翼四十军及三十军一部经临漳向邯郸东南一纵防线猛攻，战斗非常激烈。

25日至26日早晨，四十军以猛烈炮火轰一纵阵地，掩护其部队连续攻击。我一纵一个团阻击四十军一个师，战斗非常艰苦。一纵在崔曲的防线一度被四十军突破。26日夜，一纵组织力量反击，攻入崔曲村中，与四十军逐屋争夺，苦战一夜。

10月28日我一纵与敌四十军仍在崔曲村中争夺对峙。这时由陈再道司令员率领的二纵已赶到指定地点，开始正面发动攻击。战斗仍是在崔曲，双方伤亡都很惨重。29日下午，四十军连续向崔曲增援，但经不住一纵与二纵协同猛攻，四十军放弃崔曲向后收缩。

夺回崔曲后，晋冀鲁豫军区命令各部迅速整顿队伍，准备再战。

马法五在崔曲一战受到挫折后，感到共产党的兵力强大，前进困难，改变攻击为防御，等待漳河以南的三十二军前来接应。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0月30日下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马头镇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他宣布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倒戈起义。他打电话给四十军参谋长李旭东，告诉李旭东说：“看来，北进是过不去的。我已决定不走了，你们可以赶快撤退。现在八路军的代表就在我这里。李旭东听了这话，当时就哭了。马法五与宋肯堂听到高树勋这电话后，如晴天霹雳，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决定撤至漳河南岸待命。

11月1日，高树勋率起义部队离开战场，开赴武安。

10月31日黎明，马法五率司令部及四十军与三十军向南突围，四十军与三十军一部在东，鲁崇义率三十军主力在西，以多路纵队向南逃跑，退到旗杆张周围



十几个村庄。这时漳河以南的三十二军企图越过漳河前去接应。

31日下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全线出击,马法五的主力在旗杆张凭借优势火力及村中的建筑物顽强抵抗。三十二军向漳河南岸的晋冀鲁豫独立支队猛攻。

31日晚至11月1日上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十次攻击,一纵与二纵在黄昏时分开始总攻。马法五的四十军经不住这次攻击,被迫在子夜放弃村庄突围南逃。突围后来变成溃退,大部被围歼或成了俘虏。马法五被包围在棉花地里,无法逃出,当了俘虏。鲁崇义利用黑夜率残部三千余人逃回漳河以南。

这两个军可以说全部被歼。高级军官被俘的除马法五以外,有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三十军参谋长李旭东、副师长郑树森等人。

三十二军这时已无北上的必要,停止在漳河以南。从石家庄南下来接应的胡宗南部队停止在高邑,平汉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那篇文章里对高树勋起义的评价是:“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邓小平文选》上卷337页)。

## 高树勋的经历及他与共产党的关系

高树勋,河北省盐山县人,起义那年47岁,他虽然是行武出身,但上过四年私塾,并不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18岁投到冯玉祥部下当兵,由于他打仗机智勇敢,逐步从士兵晋为高级军官。

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就和共产党打上了交道。共产党员刘伯坚、宣侠父等人先后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在部队中发展党员。高级将领中如赵博生、董振堂、吉鸿昌、张克侠、何其沅等人都是共产党员,中下级军官也有不少党员,所以西北军受共产党影响很深,高树勋多少也受些影响。

1930年蒋冯大混战,冯玉祥失败,西北军被蒋介石瓦解。高树勋在孙连仲二十六路军任二十七师师长,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围剿红军。高树勋知道这是蒋介石消灭西北军的方法,不愿卖命。赵博生与董振堂发动宁都起义,二十七师官兵都被带走。蒋介石要追究高树勋擅离职守、没有掌握好部队的责任,高树勋逃往天津租界躲避。

这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已经一年,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高树勋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经常同吉鸿昌及一些进步人士讨论反蒋抗日办法。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与吉鸿昌去张家口投奔冯玉祥。在同盟军中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张仲实、宣侠父等人,对于革命形势有进一步了解。

同盟军失败后,高树勋又返回天津蛰居。1937年初,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任命高树勋为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负责训练各县保安队的工作。这时党中央派朱瑞同志到保定作统战工作,与高树勋频繁接触,谈论抗日问题。后来彭德怀偕同边章五同志来保定与宋哲元会谈,高树勋奉命接待,欢送欢迎都非常热情。高树勋与边章五是老相识,因为边章五是宁都起义时的旅参谋长,所以他与边谈得非常融洽。高树勋请边章五派人帮助他作抗日工作,不久,共产党员唐哲民来到高的部队,高树勋委他为保安处的上校参谋,负责组织各县保安队。

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树勋与共产党的联系更多。为培养干部,经朱瑞同志联系,派唐天际、钟辉两同志负责培训。在八路军的支持下,高树勋部队扩充为九个团,实力大增。但部队中军官多是宋哲元的旧部,思想反动,反对共产党员在部队中活动,并且向蒋介石告密,说高树勋赤化了。这一时期是高树勋与共产党关系最好的一段时间。

后来蒋介石任命石友三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为新八军军长,隶属三十九集团军。

石友三为人阴险,翻脸无情,高树勋对他时时怀有戒心。石友三认为高树勋不容易任他驱使,也把高树勋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石友三起兵反过蒋介石,自知蒋介石最终一定要收拾他,他决定投靠日寇。高树勋是爱国的,决不作卖国投敌的事,因此他与石友三从个人恩怨又加上一层敌我的对立。蒋介石利用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先除掉石友三,1939年秋天,石友三投敌的行动逐渐公开化,高树勋于是下决心除掉他。

1940年,孙良诚为调解高树勋与石友三的关系,陪同石友三来到高树勋的驻地柳下屯。高树勋立即命令卫队营营长扣押石友三,当晚派连长高鸣天把石友三勒死。

杀死石友三后,蒋介石委任高树勋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这时高树勋对国民党产生幻想,向国民党方面倾斜,部队中反动势力上升,他们推动高树勋驱逐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高树勋把共产党员集中起来,礼送出去。

高树勋吞并了石友三的一个军，又升任了集团军总司令，得意洋洋。但是幻想很快破灭了。到国统区不久，汤恩伯就收买原石友三的六十九军军长米文和，把六十九军从三十九集团军割裂出去，归汤恩伯直接管辖，这叫高树勋伤心透了。经过长时间与石友三生死斗争，好容易吞并过来的一个军，又辛辛苦苦从敌后带到国民党统治区洛阳，现在轻易被汤恩伯夺走，实在叫他难以忍受，但是现在自己是在国民党治下，只有忍耐。

事情不止此，蒋介石又派一个叫作胡伯翰的人来担任新八军军长，把高树勋的军权完全夺掉，这新八军是高树勋起家的老本，决不轻易放弃，拚死也要保住。这时高树勋又想起共产党，产生了投奔共产党的思想。

高树勋的这段经历，说明他在平汉战役中具有战场起义的思想基础，但真正实现战场起义，是经过党做了许多艰苦工作努力争取的结果。

## 高树勋起义的内情

在高树勋任军长的第八军有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当时，新八军部队中有三个团长是与共产党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他们是周树一、田树青、聂志超。他们虽然与党失掉联系，但仍然一心向着党，还有我和王定南也是共产党的力量。王定南是1931年入党的党员，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到高树勋部，任冀察战区总部参议。我任高树勋的机要秘书。我们的任务，是推动高树勋走向进步，靠拢共产党。

早在1945年初，我们就根据高树勋对国民党不满的情绪，开始想办法与共产党的部队联系。

1944年4月，日军进占河南，党中央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抽调部队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根据地。当年9月下旬，由皮定钧、方升普及郭林祥率领一支1500人的队伍，从新安与孟津之间渡过黄河，插到伊阳县境。这支队伍就在临汝、禹县、登封、宜阳地区活动。

1945年1月，王树声、戴季英率延安警卫队6000人从延安出发，取道山西吕梁山南下，从新安附近踏水渡过黄河。这支部队由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他们到达豫西后，即成立河南省军区。

6月，河南省军区为扩大根据地，向伏牛山进军。当时高树勋的部队驻在南召县境，西起车村，经马市坪、李青店，东抵下汤，横档住八路军南下的去路。

根据当时的形势，我对王定南说，与八路军联系的机会到了，我们要立刻去与八路军联系，不是你去就是我去。

王定南去见高树勋，谈与八路军接头的事，高树勋

同意。于是王定南冒着酷暑，经车村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二郎庙。

当时是河南省军区三支队二连在那里驻防，在弄清王定南的情况后，二连连长李凤刚把王定南送到团部。经谈判，我军要求高树勋的部队撤出作为马市坪总部的前卫阵地车村以表示诚意。王定南回来向高树勋报告，高树勋同意，立刻命令驻车村的部队撤出。王定南又利用时机，安排高树勋与三支队司令员陈先瑞在双方哨兵线中间的阵地上会面，各自跟随一名警卫员。高树勋与陈先瑞在火线上见面握手，双方都很坦率，约定双方立即停火，互不侵犯。

这一来，国民党反动派惊慌了。胡宗南立刻派李文的九十军由卢氏向嵩县移动，对高树勋进行监视，并对新八军的给养供给严加控制。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新八军调统室主任陈仙洲和复兴社分子袁家洪耳中。他们两人推副军长马伯言出面，说王定南和我都是共产党，要求高树勋把我们二人处死，高树勋没有理他，把他顶了回去。

虽然这些人想加害我们，但我们不顾一切，仍然要加快进行与八路军联系。我认为双方既然罢兵言和，向前走了一步；应当趁热打铁，再促进一步。我要求再一次去八路军方面洽谈。

王定南与高树勋同意，于是我又出发去二郎庙。

到二郎庙以后，发现八路军已经北去，我没有休息，紧追到瓦屋。这是一个小山村，在这里我找到八路军政治部人员。他们对我说，负责人都北去了，没有人接头，我留宿一夜，第二天返回。他们赠送一本小册子给我，说是党中央七大的重要文件。

高树勋的总部这时由马市坪转移到李青店，与军部驻在一起，主要是高树勋为了控制军部。

到李青店后，我把八路军赠送给我的小册子拿出阅读。这是毛泽东主席当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所作的报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我读完之后转给王定南，王定南读了之后，又转给高树勋。这本小册子使高树勋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又多一些了解。

这时我同王定南商量，高树勋投奔共产党的行动已经起步，要推他继续向前走，不要叫他的热情冷下去。我们在这里找不到部队，可以到晋冀鲁豫军区去找彭德怀副总司令员。

当天王定南就向高树勋提出这个建议。高树勋同意，就在一块绸子上写一封密信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叫王定南带去。王定南把信缝在鞋里，8月1日出发北上。王定南走后，新八军中那些反动军官就把矛头指向我身上。马伯言又向高树勋进言，把我拉出去活埋。高



树勋立刻叫他的卫兵通知我,令我搬到他院子里去住,免得马伯言那伙人对我暗下毒手。

与他住在同一院内,我有机会与高树勋谈话,他几次对我表示他会坚决走向革命。

这时重庆又来电报命令新八军开赴后方整编,经过整编后,才能给以新的供给待遇,这使高树勋又增加一层烦恼。一天晚饭时,他多喝了几杯酒,酒后耐不住性子,发起牢骚来。他不称呼蒋介石为委员长了,直呼蒋介石三字。“你蒋介石以为我好摆弄,哼,我高树勋总有一天叫你伤透脑筋!”

我在一旁看他这样大胆发牢骚,一方面怕他小不忍则乱大谋,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样也好,斩断了退路,像过河卒子,只有向前了。

8月中旬,王定南到达新乡,后来又到达林县。

这时陈毅同志从延安返回华东路过林县,薄一波和滕代远二人也在这里。王定南向他们三人报告高树勋近几年与蒋介石的矛盾,反映高树勋想和八路军联合的心愿,并把高树勋写给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信交给陈毅同志看。陈毅看过后,送给薄一波和滕代远二人看。

陈毅对王定南讲:“你来得很好,我们在延安时就听到中央领导同志说,曾接到陈先瑞同志的报告,说他在南召马市坪和高树勋在火线上见面。党中央作了分析,认为高树勋有争取的可能,希望是很大的。我们几个人都是路过这里,听说你来了,和你先见个面。具体如何工作,你到涉县去见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他们会对你作出具体指示。”

第二天王定南去涉县赤岸,在那里见到黄镇同志。黄镇告诉他,阎锡山正向长治一带进犯,上党战役已经开始,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去黎城前线指挥部队去了。

王定南在赤岸住一夜。第二天参议室的申伯纯去找他,告诉他说:“刘司令员和邓政委从前线来电,叫你去黎城。”

申伯纯陪同王定南奔赴黎城。刘邓二人在县政府接见王定南。王定南首先把高树勋写的密信交给他们看,接着报告了高树勋受国民党的排挤与猜疑的情况,最后谈高树勋深深感到,只有靠近共产党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写这封信,希望友好联合。

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对高树勋的态度表示欢迎。刘司令员讲:

“蒋介石已经调几十万大军准备向我各个解放区进犯。第一战区胡宗南的两个军已在同蒲路南端集中,准备北上。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三个军已汇集新乡一带,高树勋的新八军在内,意图现在不甚清楚,但可以

断定是来抢夺抗战果实的。”

邓政委接着说:“你来得正好,我们也准备作这项工作。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蒋介石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队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和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在这一工作上迅速作出成绩,所以你赶快回到新乡去,做好高树勋的工作。”

刘司令员看完高树勋的信,对王定南说:

“彭总已不在太行,到延安工作去了,我给高树勋写封回信,你带给他吧!”

刘司令员马上用毛笔写了回信,信的主要内容是,欢迎高树勋和八路军联系,希望他不断前进,为革命、为人民作出贡献。王定南带了信件,返回新乡,见到高树勋。高树勋急忙问王定南,“怎么样,你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吗?”王定南回答,“彭总已调回延安,我见到陈毅、刘伯承、邓小平三位。”说着王定南把刘司令员写给他的信交给他。高树勋聚精会神地看了信,非常兴奋和高兴。为了不泄露秘密,当时把信烧了。

高树勋对王定南讲:“日本正式投降后,老蒋给我一道命令,叫我原地待命。我不理他那一套,立刻带领队伍出发,到新乡来了。老蒋不仅没有追究我违抗命令,反而封我作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王定南说:“那是为了让你去跟八路军打内战。如果你能打败八路军,他们以后再收拾你,如果你被八路军消灭了,他们是如愿以偿。”

高树勋说:“蒋介石耍的那一套,我早就领略过了,我是不会上当的。”

高树勋接着对王定南说,他原是冀察战区总司令。这次他打算带领新八军和河北民军沿平汉路北进,沿途把伪军收编带往冀察战区。把伪军占据的城镇全部交给八路军。等他到达北平及其以北地区,就与八路军联合起来。

过了几天,高树勋对王定南说,新八军和河北民军马上要沿平汉线北上。他叫王定南赶快去太行山,请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对他的建议作个答复。

于是王定南和那两位晋冀鲁豫军区派来的人员随高树勋部队北上到汤阴,然后向太行山涉县赤岸走去。

在赤岸王定南见到刘司令员和邓政委。他把高树勋北上的计划向刘邓二人报告。刘邓二人研究一下,表示同意高树勋的计划,允许他的新八军北上。

王定南当即出发,向安阳方向走去。

但在这时,解放军与国民党的四十军在崔曲发生激烈的战斗,刘邓决定部队暂时休整,重新部署,然后

发起总攻。

为争取高树勋起义，邓小平派人把已经走到彭城附近的王定南追回。王定南立刻返回峰峰矿区的刘邓指挥部。

邓政委对他说：“把你追回来，是因为敌人的行动改变了。我们原来确定的方针不适用了。”

刘司令员接着说：“现在国民党军队沿平汉路北上的已不是高树勋的一个军，而是三个军。马法五的四十军、鲁崇义的三十军也来进犯我解放区。”

邓政委又说：“因此，党中央、毛主席来电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拦国民党这三个军北进。这已是我们的严重战略任务。”

刘司令员接着又说：“国民党蒋介石的意图，是让十一战区这三个军进至北平，使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去侵占我东北。因此，我们必须守住南大门，掩护我东北部队。”

邓政委说：“所以你对高树勋讲，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让他不要到冀察地区去了，而要配合我们完成党中央阻止国民党这三个军北上的战略部署，就地起义。”

刘司令员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让他当机立断。”

王定南走出指挥所后，刘司令员又召见与高树勋熟悉并常有往来的靖任秋同志。刘司令员对靖任秋说：

“这次国民党进攻平汉路的部队是马法五的四十军、鲁崇义的三十军，和高树勋的新八军。高级将领中还有原西北军的军长李旭东。这三个军都是冯玉祥将军的旧部，其中三十军已变成蒋介石的半嫡系部队。论作战能力，这三个军都是比较强的，但他们深入解放区，对于解放区的群众情况了解不多，又远离后方，供应困难，加上杂牌部队向来受歧视，内部矛盾重重，这都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我军虽组成野战兵团不久，而且上党战役后尚未得到休整，但我们有群众基础，得到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国民党军想打通平汉路，这是办不到的。”

刘司令员一面分析敌情，一面在屋内来回走动。他说：“毛主席有电报来，指出当前这一仗必须打好，如果打不好，被迫再度上山，中国革命胜利就要推迟20年！”他指示靖任秋要设法和高树勋见面做工作。

除了靖任秋之外，邓政委另派申伯纯同志协助王定南进行工作。

他们三人乘汽车奔向前线，到达三纵队的司令部。他们向陈锡联讲述他们来的任务，陈锡联也向他们介绍这一带的敌我情况。

为了寻找高树勋部队的位置，他们三人向紧靠马头镇的村庄中老百姓探听，了解到驻在马头镇里的是新八军一个团，团长是田树青。

他们又回到三纵队司令部，与陈锡联司令员商量，决定由王定南写一封信给田树青，说明他要马上穿过火线去见高树勋。信写好后，陈司令派一名便衣侦察员送过去。

这个侦察员冒着弹雨，一边前进，一边喊话：“不要打枪，我是给你们田团长送信的。”很快他就安全到达对方阵地。

傍晚，送信的侦察员回来，带来田树青派来的一个士兵。这士兵捎来田树青的回信。信中说，“看到你的信非常高兴，已转告高先生，高先生希望你迅速过来见面。”

王定南即用电向刘邓二位报告，邓政委指示，可以马上穿过火线，先见田树青，向他了解高树勋近来的动态。并叫靖任秋同他一起去，陈锡联也派一名参谋与他们同行。

于是王定南、靖任秋和那位参谋随同田树青派来的士兵在黑夜中间向马头镇走去。离马头镇不远处按照约定的信号，由那士兵点燃一把火。原约定只去一人，现在来了三个人，守军不知究竟，开枪射击。子弹从他们身边嗖嗖飞过去，他们急忙躲在高粱杆堆后面。

带路的士兵先上去说明，守军只让三人进去。于是王定南叫靖任秋留下，他和那位参谋跟随那带路士兵过去。

他们穿过守军的前沿壕沟、鹿砦等障碍物，到寨墙边，翻墙进去，进入马头镇内，直奔田树青团部。田树青见到王定南，急忙对他说：

“高先生要马上见你。”王定南问：“高先生近来的态度怎样？”田树青说：“他的口气中，我听出他对现在三个军北上十分不安，他一直望你早日回来。”

这时已经太晚，十二点前见高勋已经来不及了。王定南向田树青讲述刘邓的指示，要求高树勋尽快行动，配合八路军阻止十一战区这三个军北上。

田树青听到这话，兴奋地说，“太好了，现在应尽可能争取早日行动，你最好赶快去见高先生。”

王定南说，“我必须在十二点前赶回去，有急待解决的问题。十二点八路军要发起攻击。”

以后王定南又偕同随来的参谋穿过火线，回到三纵队司令部，用电向刘邓二人详细地报告了和田树青见面的情况。三纵原定当夜十二点发起攻击，刘邓下令停止攻击。

第二天清早，王定南又穿过火线来到田树青的团

部，田树青派一名士兵送他去十一战区长官部。十一战区长官部由高树勋、马法五及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组成。高树勋见到王定南，叫他的特务营营长孙元儒安排王定南住在营部、并负责王定南的保卫工作。

随后高树勋到营部会见王定南。他对王定南说明，在新乡时，他曾对孙连仲提出，单独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沿平汉线北上，但孙连仲说，你单独带一个军过不去，让四十军、三十军和你一起去。

王定南说：“这是孙连仲对你不放心，才这样决定的。”

高树勋说：“我已有所感觉，不过既然是三个军齐头并进，我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王定南说：“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原来同意你一个军北上方案的，但现在三个军北上，毛主席已电令刘司令员、邓政委决不允许三个军北上，让国民党实现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因此刘邓要求你配合阻止蒋军前进。”

高树勋看了看王定南说，“现在？”

王定南说，“对，当前正是关键时刻。现在起义，对你，对人民，对国家都贡献很大。”

高树勋这时心情很不安，思虑万千。他在屋内来回走动，低声说，“要走向革命，我是有决心的，只是现在……”

王定南说，“像你这样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何不尽快走向光明呢？”

高树勋说：“四十军、三十军都是老西北军同仁，我如单独行动，他们必然被歼。这样，原西北军的人更会骂我。”

王定南说：“你要革命，三十军、四十军是不会同你一道革命的，那他们就会继续成为革命的敌对力量。他们早一天被歼灭，对革命只会带来好处。”

高树勋说：“1940年我杀石友三，西北军老人就骂我不仁不义，说什么石友三该杀，但我不应该杀他，因为石友三是我的上司，不该以下犯上。如果这次又因我使三十军、四十军遭到毁灭，旧西北军的人更会恨我入骨、骂我专干不利于西北军的事。”

王定南说，“石友三投敌有罪，人人得而诛之。你杀石友三是爱国的行动，人民是赞成的！”

高树勋仍然沉吟不语。

王定南说，“大是大非要当机立断，切不可优柔寡断，非常之人才立非常之功。”

高树勋说，“还有一个问题，我的太太和你的太太都还在徐州车站，如果我们马上起义，国民党一定会迫害他们。”

王定南说：“汉朝的刘邦为与项羽争天下，抛妻弃子在所不惜。今天你要走向革命，就不能计较这些。但你提出的问题，我马上向刘司令员、邓政委报告，看他们如何处理。”

这时高树勋高兴起来说，“对，对，你快去快回，我等候你的消息。”

王定南又穿过火线，连夜赶到峰峰矿务局刘邓的指挥部。

10月28日清晨，王定南向刘邓二人报告与高树勋谈话经过。

刘司令员说：“他杀石友三，不是什么上下级问题，不是不义，而是大义灭亲的革命行动。人民和一切爱国志士都是理解的。”

邓政委说：“他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重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很大。告诉他，时机很重要啊！”

刘司令员又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害。”他在屋里来回走几步，对王定南说，“关于高夫人留在徐州一事，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你起草一个电文，我来批发。”

王定南当即拟一电文，大意是：请中央转新四军陈毅同志，派人到徐州车站接出高树勋夫人刘秀珍等。

刘司令员看过电文，签了字，交一个参谋立刻发出（在高树勋起义时，新四军派工作人员进入徐州，把刘秀珍接出）。

王定南辞出时，邓政委再次对他说，“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出发，配合我军行动，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28日夜，王定南又回到马头镇，见到田树青，他把高树勋当前的顾虑及刘邓的指示详细对田树青讲，向田了解周围的情况。

田树青说：“我尽力掌握这个团，目前正在做我部下的工作。总部特务营营长孙元儒表现很好，他对高先生很忠诚，可以争取。”

王定南说：“刘邓首长要我们抓紧对一些军官作争取工作，促使高先生尽快起义，走向革命。”

10月29日，王定南又在特务营见到高树勋。他把刘邓的话转达给高，特别把安排从徐州接他夫人的事告诉高，高非常感谢。经过一番内心斗争后，高树勋对王定南讲：“我立即起义，走革命的道路。”

高树勋接着又谈到部队起义后一些具体问题。还要王定南对刘邓说，河北民军及与汤恩伯有关的部队不可靠，希望对他们加强围困，以免他们率部逃跑，他指的与汤恩伯有关的部队是新八军的新六师，师长范龙章是汤恩伯拨归高树勋的。

当天王定南又赶到刘邓指挥部，向刘邓二人汇报高树勋已决定起义以及高提出的问题。

刘司令员高兴地说：“很好，我们对高完全以兄弟相待。”

邓政委看了李达参谋长一眼，当机立断地说：

“我看李达同志马上亲自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下定决心，一方面看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商榷。”这个大胆的提议，得到刘伯承的支持。刘司令员接来说，“对，非常之对，这样作用大呀！”

李达参谋长换上便衣与靖任秋前去，到达马头镇后，由田树青派人带路，傍晚来到高树勋住处。他们三人共进晚餐，畅谈到天明。

李达参谋长原是老西北军的军官，是宁都起义投奔共产党的。当时高树勋是二十六路军的二十七师师长，他的部队全部参加起义走了，所以他和李达见面，谈得很投机。李参谋长对高谈了对四十军、三十军应抱的态度，又谈了1931年宁都起义的意义，还谈到西北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参加国民革命军，举行五原誓师的情景。高树勋听到西北军这些光荣历史时，非常激动。李参谋长最后对高树勋讲：

“如果高将军在当前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大搏斗的紧要关头，能高举义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它将比宁都起义、五原誓师的意义更为深远。”

靖任秋同志也对高分析当前的处境：

“蒋介石把你们三个军当作枪头，放在最前线，实际是叫你们先去试探一下，能不能打进华北解放区。如果成功了，蒋介石得到好处；失败了，被八路军消灭的是杂牌部队，对于蒋介石本身无损毫毛。这是蒋介石对付杂牌部队的手法。华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战八年中建立起来的，对来犯之敌岂肯轻易放过。前不久上党战役就是例证。当前你们前进的阵地正在潞阳河套的多沙地带，无险可守。平汉路两侧全是我们的军队和广大的民兵，你想沿平汉路到北平，肯定难以通过。”

高树勋向李达、靖任秋二人表示10月30日立即宣布起义，决定把他的指挥部移到马头镇向解放区方面靠拢。

第二天午前，李参谋长回峰峰指挥所向刘邓汇报，靖任秋留在高树勋处作联络工作，双方当天把电话架通。

10月30日王定南和申伯纯回到马头镇和高树勋

商议起义有关问题。下午高树勋召开总部军官会议，严肃地宣布他要率部起义。他说：“蒋介石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又打内战，我坚决反对。十年内战期间，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蒋介石调动百万大军，几次围剿都失败了。现在共产党的力量比那时大几十倍，还想用武力来解决，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退出内战，主张和平。”他一宣布，大部分军官感到惊讶，惶恐不安，不知所措。接着高树勋又激愤地说：

“我们新八军过去受蒋介石中央嫡系的歧视，大家都清楚。就供给而言，比人家差十几倍，还经常受他们监视、分化和并吞。我去西安时，还当面受到胡宗南的侮辱。（高树勋号“建候”，胡宗南摸摸高树勋的头，叫高树勋“猴”。意思是说高树勋狡猾得像个猴。胡宗南以下的军官也背后叫高树勋为“高猴”，高树勋受这侮辱非常气愤）。

总部军务处处长袁家洪，是复兴社分子，想站起来发言反对。高树勋知道他要反对，双眼一瞪，使劲一拍桌子，大喝一声：“袁家洪，你要干什么！”这一下把袁家洪镇住了，没有敢发言。其他要反对的人也就不敢讲话了。

新六师师长范龙章是汤恩伯介绍来的。他认为在新八军中是杂牌，受高树勋歧视，与高树勋不融洽，但是这人机警义气。他站起来表示：“我听高总司令的领导，跟随高总司令起义。”他一表态，其他的人不管心里愿意不愿意，也都表示同意。

会后，高树勋下令所属部队原地待命，又分别与各师、团长谈话。二十九师师长尹瀛洲请求辞职，高树勋照准，令田树青代理二十九师师长。当晚尹瀛洲拉一个团哗变南逃。

在高树勋宣布起义的时刻，刘邓大军指挥所焦急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不久马头镇负责联络的人员申伯纯打来电话向刘司令员报告，高部有小部分队伍哗变。刘司令员关心地问高树勋是否安全？申伯纯答说，高很安全，由于接连几个昼夜没有睡眠，现在正睡觉。刘司令员又问，马头镇的部队是否稳定？申回答马头镇现由高的主力暂编二十九师控制，可无问题。军中的特务分子已被监视，刘司令员这才放心。随即命令部队坚决向新八军与三十军中间敌后猛插。他要求部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胜利在此一举。”

10月31日清早，刘司令员和邓政委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偕同薄一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亲去马头镇同高树勋会面，以稳定高树勋的心并向他祝贺。

指挥部打电话通知高树勋，他听到这消息，非常兴奋，立刻找田树青和孙元儒等人叫他们布置迎接刘司

令员。

刘司令员偕同薄一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以及少数警卫员乘坐一辆卡车，从峰峰到马头镇四十里，行走一小时。卡车在马头镇外停下来，刘司令员一行向高树勋住处走去。高早已在门前等候，刘司令员与高树勋热情握手，高然后与其他人员一一握手后，陪同刘司令员等人进入他的房间。

刘司令员说：“高总司令，欢迎你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

高树勋说：“要感谢你的帮助。”

等刘司令员坐下，勤务员端上茶，他又对刘司令员说：“刘先生军务如此繁忙，还要远道来临，真不敢当。”

刘司令说：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刚才来电，对高先生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非常敬佩。我特地代表他们向你和全军官兵慰问。”

高树勋激动地说：“毛先生和朱总司令如此关注，我们不胜感激。”

刘司令员说：

“人民八年抗战，渴望过和平民主生活。现在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大打内战的危机十分严重。高先生能在此地举起和平的旗帜，与人民合作，共同进行和平民主斗争，是应该祝贺的。”

高树勋回答：“这是每个爱国军人应该做的。”

接着他请刘司令员等人共进早餐，宾主纷纷举杯，共庆胜利。

饭后，刘司令员问：“高先生现在有何需要我们帮助的？”

高树勋提出一个预先准备的问题：“考虑需要向全国发表一个通电，看以何名义出现为好？”

刘司令员胸有成竹地回答：

“发通电非常之必要，意义很大。对外名义最好用和平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名义。这是一个旗帜问题，看高先生意思如何？”

高想了一下说：“那么就民主建国军吧！”

刘司令员转问薄副政委：“我看可以，这正和蒋介石的独裁内战相对。”

李达参谋长说：“为了便于部队安全和休整，我建议高总司令的部队最好早日离开战区。”

经过大家商议之后，一致同意11月1日一早开赴武安。当高树勋率领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开往武安伯延、

邑城一带时，一路上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11月2日毛主席与朱总司令发来贺电，电文是：

“建候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特电驰贺，即颂戎绥。”11月10日，起义部队齐集在武安伯延开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党中央任命高树勋为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为第二军军长。乔明礼在起义前是河北民军司令。

1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高树勋起义的消息及通电。消息传到大后方，产生很大政治震动，影响深远。

中共中央12月15日发出指示，对国民党军队开展高树勋运动。

起义以后，高树勋提出了入党申请书，由邓小平、薄一波同志为介绍人，经党中央批准，成为共产党员。

1947年民主建国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十纵队，开往南阳地区参加解放战争，后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五十八军。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八军大部分转为人民解放军海军。

(责任编辑 林 跃)



高树勋起义后，受到热烈欢迎，图为高树勋（中）与群众交谈

# 北平沦陷前后我的一段难忘经历

●于光远



作者 1936 年 7 月大学毕业时的照片

## (一)“为保卫北平而流最后一滴血!”

1936 年 7 月,我在北平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去广州岭南大学教书,因在那里搞民先队活动,组织被破坏,国民党反动派要抓我,在广州呆不下去了,民先队总队长李昌要我回北平做民先队总部工作,负责和各地民先队组织进行联系。回北平不久就参加了共产党。

1936 年底 1937 年初,北平地下党办了一个党刊,为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捣乱,不断改换名称,先是叫《长城》,后来改成《新长城》、《国防杂志》;在抗战前不久改为《人民之友》。大约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四五天光景,党的北平市委就向革命青年发出号召:“为保卫北平而流最后一滴血!”尽管后来我们认识到,作为指导思想,这样的口号未必正确,但它的确代表当时广大革命群众的感情。我们是多么希望北平能够成为中国的马德里!我们期望自己能象保卫马德里的英雄那样,在北平浴血抗战,使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脱身不了,以便赢得更多的时间,在全国范围把广大人民动员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自从市委发出那样的号召之后,同志们都准备在城里和日本军队打仗。北平学联和民先总队部及其地方队部号召同学们修筑街垒、准备巷战,我也很想和同志们一起在城内参战。



## (二) 接受去保定的任务

没有想到,“七·七”过后没有几天,党组织找我谈话,说:“你在民先全国总队部负责与各地方队部联系的工作,这工作不能因为打仗而中断。现在总队部在北平城内已经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了,党决定你到保定去建立民先临时总队部,用总队部的名义继续与各地方民先队部联系,开展工作。你还要特别致力于发动河北游击战争。”

党决定调我到外地工作,我急忙开始做离城的准备:

一是北方局把保属特委的金杰同志召来北平,和我见面,当面讲清楚我去保定的使命,要保属特委支持我的工作,并且商量好我去保定后同他接头的方法。按照地下工作的规矩,金杰没有把他的姓名告诉我。我看他长得胖胖的,身体呈圆形,模样又很“土”,就开玩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土肥原(圆)”(土肥原是当时在华北日本帝国主义特务头子,对他起这样的外号实在不好,可是金杰一点也不生气)。尽管我和金杰已经见过面,但是党组织还是为我开了一封组织介绍信。那是一张很小很薄的纸,写有很少的几个字,叠得很小,也没有给我看里面写的是什麼,就缝在我衣服的夹层里。

还有一方面的工作,是把我平常联系的民先各队部和某些在外地的个别民先队员的通讯地点编成只有我自己才看得明白的单子,用很小很小的字抄在棉纸上,以便能够带出城去。至于为了河北省的游击战争,我不知道该做怎样的准备工作。最后想到一条:在北平从多方面调查河北省若干县民间枪支和武装力量的状况。结果问到大约二三十个县枪支和人员的数字,我把这些数字用拉丁化新文字记在燕京大学制作的一个小本本里。本来我打算多看几遍,记在心头后就把这个本子毁掉,我认为没有必要冒险把这样的东西带到保定去。可是后来忘了毁掉,放在西装裤兜里,为此后来险些出事。

在进行这些准备工作时,党组织又派了赵德尊同志和我一起工作。赵是我清华同学,学外国语。他比我低一个年级,是民先队员,可是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不做民先工作,而是在清华大学做党支部书记。他是东北人。

进行这几件工作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直到7月27日,我还在北平城内。

## (三) 日本坦克从我身上压过,但我并没有被碾死

7月28日凌晨,李哲人(天津南开大学学生,1936年秋民先全国总队部成立时,党组织把他调到北平做民先工作。他在民先队是仅次于李昌的负责人,是我的领导)到我居住的沙滩北京大学东斋的宿舍,使劲地推醒正在床上熟睡的我,说“小子,你们快走,日本兵就要进北京城了”。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连盥洗都来不及,带上事先准备好的包袱,找到赵德尊,立即往西直门跑。

到西直门已经快7点了。日本兵快要进城的消息,已经有一部分人知道了。有一些住在北平城里的也到了西直门,准备离开北平。也有一些住在西郊的清华和燕京的同学到了西直门正准备进城暂避。当我和赵德尊出西直门朝着门头沟方向前进时,就有不少人跟在我们后面。我认识的共产党员,我的党小组长袁也烈就是其中一个,不过我故意不向他打招呼。大多数人我虽不认识,但我敢判断不是党员就是民先队员。他们离开北平,一望便知也是为了到别的地方参加抗战的。

我们先是沿着西直门外的铁路线朝南走。走了不久,我决定离开铁路线,改道走公路。我手边带了一张这个地区五分之一军用地图,看清楚那一条是去西山八大处的大道。当我们一行(大约有二三十人)走近田村东头时,走在最前面的我,发现一辆日本坦克就停在村口。我向同志们喊了一声“日本坦克!”自己急忙钻进一片玉米地,可还是被日军发现了。我在玉米地先是听到坦克发动起来的声音,后是看到它向我伏在其中的那快玉米地开了过来,接着就是日本坦克向这片玉米地盲目扫射。我既听到机枪声,又见到子弹打在地上弹起的一排排的尘土。许多机枪子弹落地处就在我身旁。我看了一下玉米地,一片平地,没有沟坎,没有任何地形地物可以利用来防备子弹打到身上,只有无可奈何地呆在那里不动。

要打仗就不怕牺牲,这样的精神准备,可以说每个党员都是有的,何况不久前党又发出“为保卫北平而流最后一滴血”的号召。抗战爆发后我有一个想法:打仗当然要死许多人,共产党员站在斗争的前面,也就会先死,我想自己不会活到战争胜利这一天的。当敌人的机枪子弹在我身旁打起一排排尘土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这个“打仗要死许多人,共产党员先死”的看法。可是很奇怪:“怎么战争刚爆发没有几天,第一次遇到日本兵,自己就这么轻易地被打死了呢?”我这么想着,

觉得很有些滑稽。事后我又奇怪,当时自己怎么没有产生任何恐惧的情绪,而只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这一点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得可笑。

接着是日军坦克在我伏于其中的玉米地上来回压,想用压倒这块地里玉米杆子的办法把伏在其中的逼人逼出来。他们大概估计有不少人在这片玉米地里面,其实其中只有我一个人。当坦克压到我伏在其中的那一排时,我闭上眼迎接死亡的到来。只听到轰隆隆的巨响向我靠近,猛睁眼一看,我正在坦克的下面,身躯和坦克前进的方向平行,两边是坦克的履带。幸亏那时我不象现在这么胖,夏天穿得也很单薄,虽然这辆小型坦克两条履带之间的空间狭窄,底盘也不高,但还容得下我,我一点伤也没有受,只是臀部的裤子上破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

坦克上的日本兵见到了什么,在我上面停了一下,又向前开出大约四五十米,回头看清楚了,又向我打了一排机关枪,几个日本兵下了坦克走到我跟前,我也就站了起来,于是我被日本兵抓起来。

#### (四) 在田村的几个小时

那天在战地被日军抓到的只有我、赵德尊等走在前面的五个人,都是北大、清华的学生。我和赵任务在身在最前面。当我站起来的时候,看到赵没有钻进玉米地而是就地在公路上卧倒,日本兵正飞跑过去抓他。有两个日本兵带了另外三个人走过来了。日本军队以为还有什么人躲在什么地方没有出来,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学来的一句中国话,大叫“朋友!”“朋友!”吆喝人出来,也进行了一番搜索。后面的人跑得快,一个都没有被抓住。

日军把我们带进田村。街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所有住户的大门都紧紧关闭着。几个日本兵正用脚踢农户的大门,用中国话叫“开门!”“开门!”可是没有一家的门打开,没有一个人走到街上来。在田村的街上,我看到一个二十九军的战士,头颅被劈开,身子在台阶上,头下垂,脑浆正往下流,真不想多看一眼。在田村街中心放了一张桌子,我被带到桌子旁边。让我站好,然后要我蹲下,再站起,又蹲下,如此三次。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看我是否军人,而我恰好一天军训没有受过。后来我明白,那时日军实行的是对军人非常残酷的政策,因此第一件事要辨别我究竟是军人还是老百姓。不过在我蹲下站起三次,他们看出我不是军人之后,两个日本兵还是把我手臂捉住,由另一个兵用手掌猛打我的脸。我看他们的表情是恨我在玉米地里怎么也不

出来,又有点奇怪怎么枪打、坦克车压都没有把我置于死地。这时候,我考虑既不应该表现痛苦,不想显出自己软弱;也认为不宜表现愤怒,政治面目并没有暴露么。我决定来一个“无表情”。当他们猛打我的时候,我观察那个打我的日本兵,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以前看旧小说,书中描写凶狠的人“一脸横肉”,我一直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在这个日本兵的脸上看到了,他脸上的肉果真非常明显地是横的。

在搞了我们一通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走,带到靠近村西头一面土墙旁边后,作出要我们蹲下的手势。这时只有一个持枪的日本兵,看管着我们,来回地走动。猛然一声枪响,我不知道谁被打了一看大家都安好,原来是他用枪打鸟。这个兵只顾自己走来走去,不理我们。我和赵德尊在这个日本兵走远的时候相视一笑。后来两人谈起那一笑的意思,两人竟然是同一个想法:如果真的要枪毙我们,要喊两个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说来我们自己也不相信,来了个日本兵,衣服兜着许多从地里摘来的香瓜,用手势问我们是否愿意也吃一个。我当时正渴,心想过不了一会儿,也许会处决我,现在有吃的为什么不吃,旧社会杀头还“请”犯人喝酒和吃红烧肉呢?于是用自己的衣服把瓜上的泥土一擦就吃。

又耽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兵,要我们站起来跟他走。原来又把我们带回打我的那张桌子旁边。这时桌子上堆放的东西更多了。在离开那张桌子去土墙的时候,桌子上放着的只有从我们五个人身上搜走的东西:其中包括我带去的那个小包袱,那张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那个燕京大学制作的小本本(真该死,我忘了撕去其中记有河北几个县民间枪支数和人员数的那一页)。还有赵德尊的一个包袱和另外三个人的东西。现在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这是日本兵在“打扫战场”时拾到的、我们的同行者扔掉的东西:有望远镜、照相机、指南针、药物等等。在桌上还有好几本书,放在桌上的书有三种,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一种是我们民先总队部发给民先队员的《游击战争纲要》。它是袁也烈编的,每个民先队员参加那次在西山举行的游击战争演习的都发给一本。还有两种,一种是学生们在军训时政府发的《步兵操典》和《阵中要务领》。这些书是同军事有关的,但似乎没有引起日本兵的什么注意。

把我们带到桌边,第一个受“审讯”的还是我。在审讯前又检查了我身边的东西,把我的手表和自来水笔都打开了。检查不出什么东西,便对我开始“问话”。由于这支部队没有懂中国话的,没有翻译,便采用笔问

笔答方式。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三字“汝狐行”，下面加一个问号。我奇怪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认为是我狡猾得象狐狸？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不象，而且也不通。我想也许他们写了别字，把“旅行”写了“狐行”。我用笔回答“不是，我要回家”。答对了。接着就问我的职业，我写的是事实“北京汇文中学教员”。“教什么？”“高中物理。”他们接着问“家在何方？”我答“上海”。又问“去上海为何不经天津？”我向东指了一下，答“铁路已断”。问过我，就问赵德尊等四人。问完了示意“你们可以走了”。有一个人，不记得是谁，笔问“向何处走”，日本兵指着东方写了“危险”两字，要我们朝西走——这正是我们想去的方向。于是我就向他们提出要回其中藏有我百多个通讯处的包袱，被允许了。于是打开包袱又检查了一遍，看全是衣服。我制作的那张单子，是塞在一只袜子里，这只袜子和另一只袜子卷在一起。包袱里一共有三双袜子，都是每双卷成一卷，其它两双袜子里没有塞什么东西。他们对这些衣服鞋袜之类不注意，打开包袱看了一下之后就把手还给我了。

我们意想不到就这样轻易地获得了自由。走了不到50米，北大的两个同学又跑回到那张桌子旁边。我们清华的三个人站在远处看，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看见那两个同学用手势对日本兵“说”了什么，回来手上有一张纸。这两位同学说他们要来了我们再向前走的通行证明，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走到前面又会被抓起来的。看这张纸条，上面除了那些“假名”看不懂外，有“证据不充分”“赦免”“放行”几个汉字，后面写了小队长三个字，并打了一个很小的椭圆形的图章，上面是“香田”。

我们拿着这张通行证明，继续向西行进。路上遇到一小队日本兵和一辆坦克车，我们大摇大摆地走，日本兵仍然排着队行进，坦克车也没有停下来问我们什么。我们再向前走，走到黄庄，又遇到一队日本兵。一个军官把我们拦住，我们取出了那张“通行证”。看罢，他对我的包袱又作了一次检查，两只袜子卷成的那卷袜子被打开了，但是他只是从外面摸了一下，因为棉纸是软的，没有摸出什么东西。如果当时他手往袜子里一伸，我就没有命了。别人带的东西也检查了一下，没有看出什么，又放行了。他在那张纸上也打了一个图章，原来这个人是中队长，比小队长高一级。不过图章上他的名字记不得了。再往前走，便是中日军队控制区交界的地方，就在西山脚下。这时候天色也暗下来，又下起雨来，我们决定不走了。五个人又钻进一片玉米地——

很大很大的一片玉米地。我们就在炮声和雨声中过了7月28日这一夜。

对于我们被释放和给我们开了通行证这些事，在跟朋友们叙述这个过程时和向党组织交代那次本人被抓拘留又被释放这段历史时，我当然全都如实地讲了。但是在抗战期间向众多的青年人讲故事时，我不去讲这些情节，“从略”了。抗战期间，日本军不仅对我国军队、而且对我国老百姓也非常残暴。“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等都是惨痛的事实。我们当然应该充分揭露日军对我国军民的残暴。中国人民不能忘记这些。我们被日军队抓住是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十天，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不知道中国老百姓的厉害，因而对我们实行了宽大的政策。这才会发生上面讲的那些情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遇到了全民的抵抗，他们很快地懂得不但中国军队，而且中国的老百姓也坚决反对他们，并且有效地同他们斗争。他们的政策就不一样了。于是他们对老百姓同对军队就同样地凶狠。我们遇到的是在很短时间的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它虽然是事实，但是以前我还是不愿意讲这些细节，怕引起一些误会。

现在我把真实的情况写下来是经过一番斟酌的。我觉得让青年们知道这样的细节也有好处，让他们知道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知道在特殊的具体的条件下会发生具体的事情，并且事物的发展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他们应该学会分析和正确判断。

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十天，1937年7月28日我就是这么过的。

## (五) 7月29日晨——从西山到良乡

7月28日我在北平西郊遇到日本兵，在田村被抓住对我们进行审讯的时候，后来知道，正是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南苑激战，被日本打败，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英勇牺牲的时候。那时日军和我军的主力都在北平南郊，在西郊日军只是一支小部队。因此在田村黄庄听到的炮声很稀疏。7月28日我们在西山脚下那片玉米地里过夜时，听到的炮声可以判断是在离那儿比较远的地方打的，而且越来越稀，到天亮时几乎都听不到什么了。29日我们从玉米地里向外观察，不见人影，出来之后，不论日本或者我国的军队都一个也没有见到，就是老百姓也没有一个在户外活动。真是一个非常宁静的早晨。

当我们走进邻近的村庄，到一户农民的家里去时，全家的人用一种惊惧的眼光看着我们。当我们告诉

们自己是北平城里的学生，走了一夜才走到这里准备搭火车南下之后，他们的顾虑减少了一些。我们又拿出四个银元，作为他们把我们带到良乡火车站的代价。当时四块大洋对我们学生、尤其对农民来说都不是很少的钱，因此当我们把这钱交给这家的主妇时，她就同意自己的丈夫陪我们走一趟。不过走在路上时我们感觉到这个农民一直有想逃跑的想法。于是五个人把他围在中间，使他难离开我们。好在从他家到良乡火车站走小路很近，很快就到了。到了良乡车站，我们向他致谢，他就急急忙忙地回家去了。

## （六）从良乡到琉璃河

一到良乡车站，我们就完全明白二十九军在北平作战是被彻底打败了。在良乡车站上没有火车，可是在站台上站满了溃散下来的士兵。有的背着枪，有的背着大刀。在这儿看不到有什么军官，也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一群散兵游勇。这些战士——至少有千把人，都是在等火车南下。我同他们在车站上等了好一会，希望能够听到南方传来隆隆的火车声，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时候有些士兵喊“火车不会来了，我们走！”几个人一带头，大伙儿就沿车站路线迈开步子。我们也跟在他们之中，一时间那一条铁路线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大街。铁轨两旁的土路走着人，两条铁轨中间的地方，也走着人。尽管铁轨中间有许多石子，崎岖不平，但是为了早点赶到火车，也有不少人在一条一条的枕木上跳着走。

我们五个人走在这些战士之中。我想从这些战士那里了解一些昨天的战事。问他们，他们不愿细讲，也可能讲不清楚，只是讲“败了！败了！”有的骂日本兵，也有的骂长官，可是具体的情节没有问到什么。我们向他们做工作，希望他们继续跟日本鬼子打仗。对这一点，他们表现得倒很坚决。几个士兵都表示不相信打不过日本鬼子，都说到了前面找到队伍，整顿好后回头再同日本鬼子打，出这次被打败的这口气。我们一路走一路同这些士兵聊天，倒不觉得路长。

太阳越来越高。这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七月底的日子，在阳光直射下走路的确又热又渴。和我们走在一路的士兵，看到有西瓜田，要我们在路边暂时等候，自己跑过去用大刀把瓜割了两个下来拿到路边，还是用大刀把瓜切开，对我们只说“吃”一个字，我们就捧起来吃。这东西真好，既解渴，又可填肚子，除了那一个西瓜外，我们已有一天多没有吃一点东西了。一路上我们吃了好几次西瓜。

走了29里路，到了窦店，车站上仍然没有火车，大家又继续往前走。在从窦店到琉璃河的路上，有三架日本飞机编队从北到南沿铁路线飞行。它们可能见到了我们，可是没理睬我们，我们也没有去管它，照样走路。又走了40里，到了琉璃河车站，有一列客车停在那里。士兵们见了，就跑步上前，我们也加紧步伐。走近这列客车，看到许多车厢已经挤得满满的，而且有不少士兵已经爬到了火车顶上，不怕火车行进时摔下来。我们五个人也挤进了一个车厢，一下被挤进了又臭又小的厕所。我们五人在厕所里真是又热又闷又臭。后来想出了办法，一个人看着表，五个人轮流把鼻子伸到窗外呼吸“新鲜空气”，每人五分钟。

火车一路不停地一直开到保定车站。但是开得极慢，大概走了五六个钟头，到晚间九点左右才到保定，这时天完全暗了。到保定车站，我和赵德尊就下了火车，向城门走去。

## （七）进保定城

到保定站时见到的是一片刚刚被轰炸后的景象。被炸的火车还在燃烧，间或还有零星的爆炸声。车站上的人都在骂汉奸。原来上午从后方刚运来了一列火车的弹药到保定，汉奸就马上报告了日本军队，我们在窦店看见的三架飞机就是来炸这列火车的。走到城门，发现两门紧闭，我们就没有法子进城。又因为下雨不能不找一个避雨的地方，没有找多久，总算发现就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乞丐难民收容所。那是一间临街的房子，房间很小。我们到时已经有不少乞丐和乞丐模样的人在里面，不过还有狭窄的空间可以容得下我们两个人。我们挤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地上又湿又脏，坐不下去，就只好站着。也不想靠墙，墙也很潮湿，而且，也很脏。我和赵德尊背靠背，互相依靠着站了几个小时。好在夏天天亮得早，天亮了，雨也停了，保定城门也开了，我们就进了保定城。

由于事先讲好在保定找到“土肥原”的办法，进城后大清早没有什么困难就找到了他，他从北平回保定后早就为我们的工作作好了安排。我们一到，他立即把我们带到东大街撒珠胡同二号康琳家里，并且安排冯书春同志帮助我们工作，告诉我们保属特委决定冯、康两位负责协助民先临时总队部的工作，有什么困难都可找冯帮助我们解决。冯很年轻，当时还不到20岁，不过也已有二三年党龄了。康琳是他的未婚妻，比冯更小，也已被吸收入党，我们住在那儿既安全又方便。

## (八) 民先临时总队部在保定一天的工作

那时候我们艰苦的工作精神真没得说的。28日在田村折腾了一天,没吃没睡,29日白天又走了一路。除了西瓜外,什么也没吃没喝,晚上在火车里和那个收容乞丐的地方猫了几小时。30日进城,一点也没有休息就在撒珠胡同开始工作了。我和赵德尊商量了一下,由我执笔写一个《日军攻陷北平后的形势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战斗任务》,这是给各民先地方队部的一封信指示信。赵负责刻钢板。赵德尊有很好的刻钢板的手艺,刻出来的字又端正又清楚。我们两人采用流水作业,我一边写,赵德尊就一边刻钢板。刻完了冯、康等帮助印刷,当天就把信件装在不一样的若干个信封里,分投到保定城内的好几个信箱里,作为普通的信件发出了相当大一部分。金杰、冯书春等还为我们安排好保定设立的民先临时总队部的若干个通讯处。它们是若干所学校的地址,用的都是假名字,即便被反动派查到,也找不到具体负责的人,我们在信上也把这些通讯处告诉了各地民先。7月30日,我们紧张了一整天,7月31日继续发信。两天来我们做了民先总队部的第一件工作。

## (九) 见彭真同志

7月31日清早金杰来撒珠胡同,通知我北方局一位负责同志要找我谈话。民先全国总队部在北平时,它的党团(相当于今天的党组)就是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具体的就是由彭真同志领导的。不过那时他不用彭真这个名字,大家称呼他老魏。他在党刊上发表文章用的是“玮玉”这个笔名。我知道北方局书记是少奇同志,他的笔名是KV和胡服。华云这个笔名他也用过,而玮玉是北方局另一个负责同志。彭真直接同民先总队部党团联系,不过在北平我并没有见过他。这次金杰来通知,我猜到是彭真。见面后,果真是他。他是7月30日从天津来到保定(北方局设在天津)的,住在保定的一家旧式旅馆。这旅馆不算小,彭真住的那一间很宽敞。他的公开身份是商人,他穿上长袍,戴上礼帽,也的确很象一个商人。

见面后,彭真问我如何离开北平的。我就讲了7月28、29两日的经过。他听了很高兴。我还向他汇报了民先临时总队部已第一次发信与全国联系,并且给了他那个油印的《形势和任务》,他很高兴。他说了一

些青年干部的成长常常是一窝一窝的话,他的话鼓励了我们。这次见面只有我和他在场,金杰把我带到后就回避了。彭真同志指示保定不是建立民先全国临时总队部的好地方。他说从战争形势来看,保定很快也会被日军占领。他要我把民先临时总队部立即迁去太原,他还说,我们红军从来没有到过河北,高蠡暴动失败了。但是河北省党的地下组织的基础最强,将来党是会在河北建立起根据地的,但是象保定、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是保不住的,得先在农村扎下根去。他还讲了不少,最后和我约定8月2日上午9点在太原海子边公园碰头。

见过彭真同志后回到撒珠胡同,我们决定赵德尊留在保定继续开展河北的工作,我自己第二天早上就要坐火车去石家庄。

## (十) 会见全国学联前线慰问团

7月31日我还有一个活动,那就是与全国学联前线慰问团见面。全国学联与民先总队部是地位相当的革命青年组织,是姊妹团体。全国学联来了人,我作为民先总队部的负责人应该同这个团带队的同志见面。

我知道这个慰问团的工作很难进行。北平战事失利。7月29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后,准备大军南下。二十九军溃不成军,有待整理。我军前线究竟在何处,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保定军方态度暧昧,他们并不需要象全国学联那样的组织来慰问。这个慰问团一定不会受到欢迎。我想自己在保定同特委有联系,理应设法协助他们的工作。可是我想了一阵子,觉得真是无能为力。

没有想到在与那个慰问团见面时,带团的不是别人,而是韩天石,韩也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36年暑假他去成都,在成都四川大学学习。他在成都建立的民先地方队部,是民先许多地方队部中除了北平、天津地方队部外最好的一个。我和他一直有通信关系。见到他,我们讲了战争形势,也讲了民先工作。韩还告诉我,他从北平到四川后一直没有能接上党的关系。我说我能帮助他,设法让他去见彭真。他后来见到了彭真。

## (十一) 离开保定去石家庄

8月1日清早我就去石家庄。在石家庄我只去了一个地方“朱琏诊所”,只见到两个人:陶希晋、朱琏夫妇。陶是我们党在石家庄的负责人,朱也是党员,擅

于针灸，开设了一个诊所，这诊所事实上就是党的机关。陶希晋的弟弟陶鲁茄还是民先石家庄地方队部的队长。我找到了陶希晋，向他通报了民先总队部的情况，讨论了一下战争形势，提出对石家庄党组织的一些希望。我告诉他，平津一带的民先队员很有可能去太原，而石家庄是进太原必经之地，希望他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谈话的时间不长，谈罢就上火车站赶去太原。

## （十二）太原典膳所二号

我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可以按照我从北平带出未被日本搜出的那张单子找到那个地方的民先地方队部，找到一个落脚的处所。8月1日到太原我就直奔典膳所二号，因为在我带出来的单子里就有“太原典膳所二号朱青”这个地址。那时还没有来得及把密码改成可以直接看得懂的文字，不过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

朱青一定是个假名字，这是我估计到的。但到典膳所之前不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假名字。原来在典膳所二号住的是民先山西省民先队长马寅。1937年初马寅去租房的时候，他了解到房东是不敢把房子租给单身汉的，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女同志，谎称是他的妻子，一起去租房，这个女同志在租房时临时起了一个假名字“朱青”。但在房子租好搬进去时朱青没有去，马寅对房东说她到山西外县教书去了。可是这样典膳所二号就有“朱青”这样一个收信人的名字。马寅和北平民先队部和同山西外县的民先队部联系时也就用朱青这个名字。朱青这位女同志从来没有在这所房子里住过，可是她的信件却不少。

见到马寅，他出乎意料之外地年轻。那时我也只有二十二岁，而他只有十八岁，他是我的同乡，上海人。他是回族，父辈六房只有他一个男孩子。1936年在上海正风中学读书时加入了党。我不知道他怎么到了太原，怎么当上了山西省队长。8月1日下午到太原在接触中对他的印象很好，我决定把民先临时总队部就设在这典膳所二号，我也就同马寅睡一个炕。从7月28日清早到8月11日傍晚，过了五天的流浪生活，现在总算安顿下来了。这个地方不大，只有一大间平房，但是我所需要的空间弹性是很大的，十几个平方米，也就可对付一阵子了。

那天晚上和马寅谈到深夜。

## （十三）海子边公园彭真向我交代任务

太原人没有不知道城里有一个海子边公园的。彭真约我上午九点见面，我一清早起床吃了一碗醪糟煮鸡蛋，就按照马寅的指点去这个公园。

进公园八点刚过不久。那时不象现在这样有很多人到公园里去做晨操。这一天我记得是星期一，天气晴朗，公园里几乎没有游客，非常安静。为了彭真一进公园就在我的视线之内，我在靠近公园大门的地方找了一张椅子坐着。快到九点他来了，穿的还是我在保定时看到的那件大褂，戴的也是我看到过的那顶礼帽。我站起来慢慢地走，在他走近我并排时，看旁边没有人，就靠近一起散步。一边走一边我向他简单地汇报在石家庄朱琏诊所见到陶希晋的情况，也向他汇报我在典膳所住下来了，向他请示我准备让马寅兼临时总队部的组织部长，再通过牺盟会里的熟人，找一个宣传部长，把临时总队部正式成立起来，问他是否可以。对我汇报的事有些无须他发表什么意见，我请示的几点，他表示同意。在这之后，他就要我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告诉我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办一所“陕北公学”，吸引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入学，把他们培养成为我们的干部。他说现在延安已经有了一所抗大，它的全称是抗日军政大学，给人的印象是学武。现在办的这所陕北公学完全学文，它能吸收更多的人到那里去。他说现在在外面很需要有许多革命青年工作，需要发展民先队员、发展党员，这件事当然重要。但是让他们到延安去接受我们的教育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你们不要只顾开展外面工作的一头，民先应该把动员青年到延安进陕北公学作为任务之一。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第二件事是，他问我从北平带出的通讯地址中有没有在晋察冀三省接壤那个区域的。我说有，而且不算少。他说这些地址很有用。他告诉我八路军已从陕甘宁边区向山西开拔，要经过太原开到晋东北和河北北部那个地方去，那儿很快会变成前线。他说你们应该做两件事，一件是要动员群众对路过太原的八路军战干进行热情的慰问。这对鼓舞士气是有用的，也是对太原群众的一种教育。另外就是把你带来的那些通讯地址交给我，我可以把它们交给那个地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去和他们取得联系，便于部队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同时也为了开展那个地区的工作。说到这里，看到路边有一张长条椅子，我们两个人就坐了下来。他从



随身带的一个包袱里取出一本中国的分省地图，翻到山西省的那一面，用手指在晋东北、冀西北、察哈尔与晋冀两省靠近的地方画了一个圈。说八路军现在就要开到那里打仗，将来我们就要在那个地区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你带来的那些地址，都是与地下党有关的，那儿的民先有的就是地下党帮助建立起来的，有的是北平的学生回到家乡建立的，在建立后也都会与地下党建立起联系，它们可以成为在那儿建党的基础。

我听他这么说，真很兴奋，也为自己带出来的东西对党有用高兴，我答应回典膳所立即把这些地址抄下来给他，并约好给他的地点和时间。

我和彭真同志这样一个见面的场面，后来我常常想起，觉得特别有意义。记得谈话的时间是1937年的8月2日，当时晋察冀只是彭真用手指在地图上画的一个圈。没有隔多久，经过艰苦的战争和组织工作，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就建立起来了。这说明党中央的科学预见，说明一个理想实现的起点和结果，把观念的东西转化为现实的东西。

陕北公学后来办起来了，它是许许多多革命干部的摇篮。这也说明党中央作出的决定的英明。1993年10月的一天，延安大学校友会召开大会（这个校友会包括延安的许多学校），在大会上我发言，回忆了这个亲身经历。

## （十四）民先临时总队部和 太原平津流亡同学会

在海子边见过彭真同志回到典膳所，我正式决定让马寅兼任临时总队部组织部长。我又找到清华同学“一二·九”的积极分子纪毓秀，那时她是山西牺盟会五个常委之一，我要她介绍一位同志到临时总队部担任宣传部长，她介绍了薄怀奇同志。加上我这个临时总队长，临时总队部就有了一个集体领导。

我有一个好朋友，上海大同大学的同学程淡志。因为1917年我从北平寄给他一篇少奇同志用华云笔名写的文章，被上海的特务查到，找他麻烦，逼得他在上海搞了一个假自杀，制造了跳黄浦江的一个假现场，自己就跑到了太原，改名卢明德，在国民师范。我把他找到，要他到临时总队部来工作，并且也住到典膳所来。他就成了临时总队部的一个专职干部。这样一些工作，我只用了两天的时间都办好了。临时总队部就立即正式开始工作。

大约在8月3日或4日，有三位天津的进步同学从沦陷后的天津到了太原。他们是徐达本（天津北洋大

学的学生）、徐达本的爱人和刘邦彦（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他们到典膳所来报到，因为他们都是民先队员。那时从沦陷后的北平来到太原的还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和三个天津学生就成立一个太原平津流亡同学会。这个会的会址也设在典膳所二号，我估计平津学生过些时候总会有许多人来太原，这个平津流亡同学会就可以出面接待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帮助他们找工作，这时候我就想起应该多动员一些人去延安进陕北公学。

于是典膳所二号就更加热闹了起来。常住人口有马寅、我和卢明德，经常来的人就有薄怀奇和徐达本等。抗战爆发后，太原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房东也不害怕了，他见到来来往往的人心里总会明白不是一对夫妻的家，但也不再来了。

## （十五）第一次见周恩来

果真象彭真所说的那样，八路军从陕甘宁边区很快就到山西。每天太原东门外火车站上都有太原各团体组织的慰问团。民先临时总队部和省队部也每天都要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去火车站。这件事主要由马寅负责，薄怀奇也积极参加。我自己也去过两三次火车站。

大概早就安排好的，八路军的战士只是路过太原，不在太原逗留。在火车站只是下火车在站台上休息一阵子、吃点东西、接受群众的慰问之后就上火车继续前进，没有一个士兵进太原城。因此在城内根本看不到八路军战士。只有八路军的高级军官进太原城，他们在城内会有一些工作要做，要从事一些上层活动。

我从党内得到消息，我们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正在太原城内。太原城内的几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起来邀请周恩来和其他八路军的将领对太原城里的群众发表演说。我们民先临时总队部和山西省队部是好几个出面组织这个演讲会的成员之一。

这次演讲完全是几个民间团体组织的，没有山西官方的人参加。地点只能找到一所中学的礼堂，那个礼堂的舞台不是现在剧场通常的那种样子凹在里面的，而是凸在外面。观众只能站在舞台的两侧和台前。在台上的正前方和左右方都有不到一尺高的栏杆。整个礼堂很小，没有座位，站着也只能容几百人。太原的群众尤其是青年听说周恩来演讲，尽管我们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措施，那天到会的人仍有一千以上，礼堂挤得满满的，但是秩序很好。

演讲的时间是在晚上。那时日本飞机常去太原空袭，晚间实行灯火管制，不敢亮电灯。演讲的时候就在

舞台的栏杆上点起几十支蜡烛，总算还可以看出演讲者的容貌姿态和表情。三个人中周恩来第一个发表演说，那时他三十九岁。在长征时（或许在中央苏区时）蓄起的长胡须已经刮去了，显得非常英俊。他讲的主题是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在演讲中讲到在山西当局的合作下，八路军经过山西的许多地方开往前线，准备与山西当局和各界人士一起抵御日寇向山西的进攻。他声音宏亮，那时没有麦克风，但是他讲的话在礼堂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更不要说我就站在靠近舞台的最前面了。那次演说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刻最强烈，就是他讲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为了与日军作战，去年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界，可是山西当局不许我们抗日，进行阻拦，而阻拦红军东进抗战的不是别的军队，正是阎锡山统率下的军队。讲到这里周恩来提高了嗓门，讲“那时红军为了开到抗日前线，被迫同你们的阎司令长官决一死战。”然后他接着讲现在形势变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八路军已来到山西，开往前线与日军作战，希望得到山西各界人士广大青年的支持，也愿意取得

阎司令长官的合作，共同抗日。在我听他讲这样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就在阎司令长官统治下的太原，他这样尖锐鲜明地发表演讲，真有气魄，真能长我们的志气。他的演讲很神气，我们听的人也觉得自己神气了许多。

徐向前和彭雪枫的演讲也使听众很高兴。

这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周恩来去世时的年龄是七十八岁，我第一次见到他，听到他发表演讲那时，正是七十八岁的一半。

## （十六）小结

周恩来、徐向前、彭雪枫同志在太原演讲的时间，算起来应该在8月7日或8日，也就是离开卢沟桥打响抗日战争第一炮正好一个月。上面我就写了这一个月——尤其是7月28日到8月7日这十天的经历。这一个月，我并没有日记，而是一天一天推算出来。我写的抗战初爆发的回忆就写到这里。

（责任编辑 方实）

## 欢迎订阅《老人天地》月刊

《老人天地》是民政部主办的全国性老年杂志。1983年创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可读、可亲、可信，为老年人所喜爱。

《老人天地》宣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老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宣传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信息和经验。

《老人天地》竭诚为老年人服务，报道老年人关心的各种问题，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发挥老年人的聪明才智牵线搭桥。是老年人的知心朋友，中青年人了解老年人的窗口。

辟有“天地论坛”、“领袖风范”、“人物专访”、“益寿之道”、“心理保健”、“晚晴异彩”、“医药咨询”、“敬老尊贤”、“婚姻家庭”、“政策问答”、“关心下代”、“当代名医”、“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老年工作”等栏目。每月定价：2.50元，每月17日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11-1147/C，邮发代号 2-290，国外代号 M736。

除在全国各地邮局订购外，亦可直接向本社订阅。

地址：北京沙滩后街34号、邮编：100009 电话：

4032528

## 《传记文学》

邮发代号 82-370

荟萃名人传记 披露历史珍闻

展现古今人物 广采国土风情

《传记文学》以史料的真实性和文学的生动性相结合，注重第一手资料和独家珍闻，强调高品位和高格调，以真实、严谨、客观、独到的风格在同类刊物中独树一帜。由于极富影响力和颇具权威性而深受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

《传记文学》为16开本，每期15万字左右，每月4日出版，定价每月4.80元、半年28.80元、全年57.60元。

国外总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读者可在当地邮局订阅，亦可直接与京前海西街17号《传记文学》杂志社高淑敏联系邮购。

邮政编码100009。电话：(010) 403.5024

# 李汝泰



· 解放后李汝泰在山西煤矿检查工作时留影

## 三进虞城的传奇故事

● 杨步胜

抗日战争时期，在苏鲁豫皖四省的结合部、微山湖以西十几个县广大地区，是著名的冀鲁豫边区湖西抗日根据地。

中共湖西地委和驻湖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四旅在山东省单县西南设立一个敌工站，主要任务是做邻县——河南省虞城县的敌伪工作。当时的站长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四旅十团敌工股长（后是中共湖西地委和湖西军分区的敌工科长）李汝泰。

李汝泰 1921 年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农民家庭，1935 年参加我党的地下交通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敌工干事，由山西转战鲁西，参加过著名的郛城和梁山战役。1940 年，任八路军黄河支队一团（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四旅十团）敌工股长，随军挺进湖西，继续做敌伪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率领湖西第一武工队，深入敌后，侦察敌情，打击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1947 年以后，他先后任中共单县县委书记、湖西地委武装部第一副部长，湖西军分区参谋长。建国以后，他先后任平

原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华北装甲兵军务处长、六十六军一九八师参谋长。以后转业到开滦煤矿基建局任副局长、煤炭部基地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顾问。1983 年离休，现居北京。

这里记述的是李汝泰当年多次化装成商人，孤身出入敌人巢穴，进行特殊战斗的经历。

### 一进虞城：

#### 宣传政策，筹集弹药

1941 年，乌云翻腾，战火弥漫。侵华日军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频繁进行“扫荡”、“蚕食”和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各个抗日根据地。盘踞在湖西各县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加紧进行反共活动，结合日伪军对根据地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再加上 1941 年至 1943 年连续 3 年大旱，使湖西抗日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驻湖西的八路

军一一五师教导四旅根据中央提出的“巩固根据地，缩小敌占区，把敌占区变成游击区”的要求，派十团跨过黄河故道，进入河南省虞城县境，先后拔掉董砦、袁砦和耿楼三个敌伪据点，缴获机枪一挺，步枪70多支，俘虏近百人。

八路军曾在1939年第一次解放虞城，俘敌100多人，人们记忆犹新。这次拔掉3个伪据点，又震撼了虞城。人民欢欣鼓舞，许多伪军吓破了胆，纷纷逃亡；有的托人同我拉关系，寻找退路。有的伪政权表示，愿作两面政权为八路军效力。这种形势非常有利于我开展敌伪工作。

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四旅和十团首长邓克明、张国华、戴润生等研究从哪里着手开展虞城县的敌伪工作？他们一致认为首先要抓住虞城县伪商会会长董谦修。董谦修是虞城县有钱有势的头号人物，在伪军和伪政权中都有他的势力；他干的是商务，不同于军界和政界那些汉奸，有争取的可能；他父亲董老五在我军这次拔掉3个伪据点时被我军抓来，可以通过其父亲做些工作。根据以上分析，决定释放他父亲回家，并通过董谦修做敌伪工作，建立地下工作关系。根据我军弹药供应不足的现状，本着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精神，要求董谦修为八路军捐献三万发子弹。对敌伪工作方针确定后，决定交十团敌工股长李汝泰具体执行。

李汝泰接到旅团首长布置的任务后，亲自同董老五谈话，宣传八路军政策，并告诉他，等董谦修来人就放他一同回虞城。董老五非常高兴，表示回去让他儿子多为八路军办事。

正当李汝泰准备派人去虞城的时候，单县胡楼的开明士绅胡鸿慈带领董谦修的儿子董青山突然于11月25日来到十团驻地找李刚（李汝泰的化名）股长。李汝泰心想来得正好，就给胡鸿慈讲了八路军对董谦修的政策，并邀董谦修来根据地会谈。同时又安排董青山去看望他爷爷董老五。董青山见到董老五放声大哭，说爷爷在这里受罪了，董老五大骂孙子不懂事。他说：“八路军对我很好，顿顿吃白面馍，还有肉有菜，这算什么苦？八路军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没有油，菜也很少。我活了60多岁，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队伍。回去告诉你爹，把地卖一部分捐献给八路军。”

董老五的一番话使他孙子很受感动。第二天，胡鸿慈、董青山带着董老五回虞城了。

虞城伪商会会长董谦修知道了我军对他实行宽大政策，不把他当做汉奸对待，甚为感动，但他不敢到根据地来。尤其是让他捐献几万发子弹，感到难办。于是他就写了个邀请信，请八路军派代表来虞城商谈，保证

代表人身安全。经旅、团首长慎重考虑，决定派李汝泰前去。

1941年12月23日，李汝泰头戴灰色礼帽，身穿黑士林布棉袍和一条西式棉裤，腰里藏着一把手枪，在胡鸿慈的陪同下，顺着黄河故道北岸的太行堤西行。

黄河故道，已有700余年的历史，是鲁、豫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宽阔的河床，起伏的沙滩，点点的水洼，杂生的荆棘。入冬以后，苇絮飘飘，朔风萧萧，路断人稀。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也是日伪特务和国民党地方部队窥探和扰乱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李汝泰走到这里，两眼窥视着远方，加倍提高警惕。他们来到了黄河故道北岸的蒋堤口，突然走过来一队国民党地方部队。机警的李汝泰一把拉着胡鸿慈躲在墙角里，顺手掏出手枪，作战斗准备。不一会，国民党地方部队走过去了，他们又上了路。

这时，夜幕低垂，弦月高挂。他们穿过黄河故道，来到南岸大堤口老田庙，离董寨就不多远了。谁料在这里又遇上四个持枪的日本特务，拦住了李汝泰、胡鸿慈。大声问道：“干什么的？”胡鸿慈忙答：“是给董寨董会长送信的”。特务说：“什么屁要紧的事，还得半夜三更送信？”胡鸿慈说：“董会长的父亲被八路抓走了，听说一半天就要枪毙，所以，赶快给董会长送个信，让他快想办法。”特务中有个姓王的，是董谦修的干儿子。听说是为董谦修办事的，就放李汝泰二人过去了。来到董谦修家时天还未明，佣人安排他们就寝。

次日九点，董谦修来到客厅，同李汝泰寒暄过后，第一句话就说：“我董谦修为日本办事，成了罪人，今天向李股长请罪来了”。李汝泰请他坐下慢慢说。董谦修说：“我先给李股长介绍三个人”。他一摆手，虞城一区伪区长张文灿、二区伪区长赵青山、四区伪区长牛永山陆续进来了。董谦修说：“这三个都是自己人，赵青山、牛永山还是我的干儿子。全县共有四个区，仅有三区区长耿世臣，不是我们的人，所以没让他来。”

董谦修原来打算，八路军要几万发子弹，要这三个伪区长分担。因此，他借故出去，让李汝泰同三个伪区长先谈。

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开始了。李汝泰耐心地讲解我军对伪政权的政策，指出他们的错误。三个伪区长以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李汝泰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给日本人干事总是错的！日本侵略中国，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八路军对待一般汉奸的政策是：首恶必办，立功受奖。希望你们立功赎罪，要捐献些子弹，支援八路军抗战。”

李汝泰的话音刚落，出身贫苦的牛永山马上表示

要捐 5000 发子弹。接着，张文灿、赵青山也愿捐 5000 发。胡鸿慈说，八路军天天打仗，需要很多子弹，各位捐献的子弹是少了点。李汝泰随即点名问张文灿、赵青山再多拿多少？他二人低头不语，迟迟不表态。又是牛永山再次带头多拿 1000 发。张文灿、赵青山仍不肯增加。李汝泰觉得太勉强不好，就说，张赵二人把第一批子弹交齐后再增加些。赵青山你的能量大，再拿出 20 条匣子枪子弹能做到吧！赵青山满口答应。李汝泰说：“就这样定了，算你们自己对抗战的贡献，如果及时交子弹，就给你们记上一功。”

与三个伪区长的谈话刚告一段落，董谦修走进客厅，坐在李汝泰的对面，表示愿听李股长的训话。李汝泰把旅团首长研究的对董谦修的政策和要求又当面谈了一遍。董谦修对八路军的宽大政策表示感谢，但对捐献子弹的事避而不谈。还是心直口快的牛永山先发言，他说：“干爸，刚才我们三个已捐献 16000 发，你也说个数吧！”

董谦修听后十分后悔，不该让这三个区长先同李汝泰接触。结果，他们各自表现自己，没有人再帮他了。他抬头看了看三个伪区长，他们都低头不语；再看看李汝泰，目光中显示出一种坚定而期待的神情。董谦修心中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只是大口大口地吸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厅里静悄悄，不时传来厨房里的切菜声……

胡鸿慈打破了沉寂局面，提议休息一下。他拉着董谦修走出了客厅，小声对董谦修说：“看李股长态度这样坚决，他不拿 3 万发子弹是不好收场的。”董谦修想来想去，最后下了决心，回到客厅对李汝泰说：“为了感谢八路军对我的宽大，就捐献 3 万发子弹，分两批交齐，时间不超过明年第一季度。”李汝泰暗暗计算了一下，原计划搞到 3 万发，现在已有 46000 发子弹，再加上邓窑的一家士绅捐献的一万发子弹，可以圆满地完成任务了。于是当即表示，就这样定了。董会长已对抗日有了认识，我们以后更好打交道了。

协议已成，大家的心情顿时放松了。董谦修让摆酒庆贺。

酒过三巡，李汝泰举杯感谢大家对八路军的支持，同时又说，我还带来一份抗日公约，主要内容是：一、协助八路军做敌伪人员工作，让他们为自己留个后路；二、给八路军提供日伪军调动情报；三、掩护八路军在敌占区的活动；四、继续给八路军购置些军用物资等。李汝泰讲完后，征求大家意见。董谦修连声说：“好，好，我们一定照办。”三个伪区长都表示赞成。李汝泰说：“大家就在这个公约上签字吧！”于是董谦修、张文灿、

赵青山、牛永山都一一签名。

12 月 25 日，李汝泰在牛永山、赵青山陪同下，骑着自行车奔赴虞城城里，了解了城里的情况，并通过董谦修结识了虞城县敌伪宪兵队一分队分队长、朝鲜人方亚南，和虞城县新民会课长谷芳洲。谷芳洲说：“我们都是亡国奴，为日本人做事，真没脸见李股长，请李股长训示。”方亚南说：“我们从内心里钦佩八路军，想为八路军做些事情。”李汝泰说：“你们打死几个日本鬼子，投诚八路军好吗？”方亚南说：“现在不行，我们的家属被日本人控制着，但可以暗地里为八路军做些事，将功赎罪”。李汝泰趁机宣传八路军对敌伪的政策，并要求他们向八路军提供些情报，搞到一张日本的军用地图和一些内部文件。方谷二人表示尽量做到。

下午二点，李汝泰在虞城转了一圈，了解到一些情况，然后由赵青山、牛永山、方亚南陪同出城。经过董寨，穿过黄河故道，胜利返回部队，受到团首长表扬。参谋长说，我们现在正缺子弹，李汝泰走这一趟，解决了部队的一大困难，可以打几次大仗了。

## 二进虞城：

### 深入虎穴，侦察敌情

1942 年春夏两季，日伪军连续向我湖西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湖西周围的国民党地方顽军也频频向我进犯，湖西根据地一时呈现紧张局面。

驻湖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四旅分析研究后发现，敌人“扫荡”湖西的集结点大都在虞城。日寇每次对湖西抗日根据地“扫荡”，一般是头一天下午把兵力集结在虞城县，第二天清晨出发，跨过黄河故道，进入湖西根据地。所以，虞城就变成了日军扫荡湖西的一个跳板。旅首长计划在条件允许时攻克这座城镇。为此，决定派十团敌工股长李汝泰利用关系，进城侦察，摸清敌人的军事设施和兵力部署，供攻城时使用。

1942 年 7 月 15 日，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李汝泰头戴白色洋草帽，身穿绸裤绸褂，脚穿一双礼服呢面的皮底圆口鞋，胳膊上搭着一件浅兰色的绸大褂，潇潇洒洒地来到了单县城南张菜园，等着党的地下工作者陶德青同志。

共产党员陶德青是本地人。他利用社会关系，广交朋友，同土匪头子、伪虞城剿共大队队长曹永年等结为拜把兄弟，并在“剿共大队”内建立地下武装，名为“虞城剿共大队第六中队”，而中队的正副队长和文书都是共产党员。

李汝泰、陶德青二人会合后，星夜赶路，午夜到了虞城县西北赵集，住在陶德泰作掩护的酱油杂货店里。天明后，李汝泰二人直奔曹永年驻地马寨。陶德青把李汝泰介绍给曹永年，让曹给虞城县伪商会会长董谦修打个电话，说李刚（李汝泰的化名）明天要进城，住在他家里，请他保证李刚的安全。董谦修接到电话后心中一惊，但又不敢不同意李刚前去，要求曹永年陪李刚一起进城。于是李汝泰、曹永年告别了陶德青，各骑一辆自行车直奔虞城。

在过黄河故道时，碰到十几个穿伪军服装的人拦着去路，叫嚷要“留下买路钱”。曹永年一看，原来是虞城县警备队的。他大声骂道，“瞎了你们的狗眼，连曹老爷都不认识了”。伪军被他骂怔了，认识曹永年的说他是“剿共大队”的队长，赶快陪礼道歉，请他们过去。

李汝泰和曹永年来到虞城西关，看见日本兵在盘查行人。曹永年掏出自己的身份证，并指着李汝泰说：“他是我的文书。”日本兵看了看李汝泰的“良民证”才将他们二人放行。

李汝泰、曹永年来到董谦修家，刚刚坐下，日本宪兵队长竹田带着三个人进了大门。佣人急中生智，大声禀报：“竹田队长来了，里面请。”董谦修一听，赶快让李汝泰躲进里间，躺在床上，放下蚊帐，告诉他千万别吭声，然后出来迎接竹田。这个竹田，会说中国话，落坐后就问董谦修：“听说有一批洋火（火柴）运到河北八路手里，有没有这事？”董谦修立刻回答：“绝不会有。前几天有一批洋火配给四区，四区的部分村庄就在黄河岸，可能是误会”。竹田又说：“近来查出八路军人员化装成商人，来这里买日用品，你们可要注意呢！”董谦修连声说：“是、是，如发现情况，及时报告竹田队长。”竹田还说：“八路军的特工人员李刚常进城来，你听说了没有？”董谦修说：“这里有皇军防卫，李刚怎敢进来？”竹田说：“不，李刚神出鬼没，可不能大意。”董谦修忙说：“队长高见，不能大意。”

董谦修和竹田的对话，李汝泰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想，我这次进城是否走露了风声，不然，我刚进董家，竹田怎么就马上跟来了？在竹田走后，李汝泰就从里间出来，向董谦修提出这个问题。董谦修也说不清楚，十分担心害怕。过一会，虞城宪兵队一分队分队长方亚南、新民会课长方芳洲进来。董谦修说：“你们来得正好”。就把竹田来这里的问话及李汝泰提的问题，向他说了一遍。方亚南说：“我去宪兵队打听一下”。不到半小时，方亚南回来说：“这是一个巧合，竹田根本不知道李刚进城。”

一场虚惊过去了。李汝泰告诉董谦修等人，他这次

进城的任务是：一是亲自看看城楼和城墙上的军事设施；二是看看日军司令部门口的碉堡和大门里边的军事设备，警备大队、警察局和宪兵队的驻地情况；三是察看护城河的宽度和水的深度；四是绘出一幅虞城县的城防图。另外，我还带来一些对日军的宣传品，请帮助散发。董谦修要求大家帮助完成这个任务。方亚南说：“日军司令部不易进去，其他几项任务可以完成。”曹永年说：“如果李股长进不去日军司令部，方亚南可以进去看看，回来给李股长说说。”商议已定，李汝泰把宣传品交给谷芳洲，让他在李汝泰出城后第二天散发出去。不料，谷芳洲把时间记错了，不是在李汝泰出城后第二天，而是在李汝泰进城后第二天就把宣传品散发在大街小巷。

这一下子可把日本人惊动了，四门紧闭，全城戒严，大街小巷增设岗哨，盘查过往行人。他们怀疑李刚在城里，在城门上贴着李刚的照片，并悬赏联合币（伪币）一万元，捉拿李刚。

董谦修可慌了手脚，马上打电话叫来方亚南，大骂谷芳洲把事情办糟了，让方亚南想个办法，保证李汝泰的安全。曹永年说：“不要怕。我看城门上贴的李刚的照片，根本不象李股长”。李汝泰听说日本人悬赏一万元捉拿他，笑着说：“我这个头还值这么多钱呀？”董谦修说：“这是什么时候，李股长还开玩笑。大家快想个办法吧。”曹永生提议，让李汝泰化装到董谦修杂货店当小伙计，可以躲一躲。大家都说可行。于是，李汝泰换上了店员服装，随曹永年来到董谦修的杂货店。曹永年小声给掌柜交待一下，李汝泰就到后院搬酱油去了。

这次大搜查，方亚南也带着宪兵队参加了。当查到董谦修的杂货店时，方亚南说：“这是我干爹的商店，不用查了。”这样，宪兵队、警察局的人都没进店。

7月18日，是虞城大搜查的第二天。这天下午，日军司令部的厨师王贤到董谦修杂货店买酱油醋，还买了一些蔬菜。掌柜的知道李汝泰的意图，就说：“王师傅，这些东西太重，你一人拿不动，让我的伙计送你去吧。”王师傅说：“好。”于是李汝泰就找了一条扁担，挑着王师傅买的东西，跟着王师傅走进了日军司令部。

李汝泰头戴大斗笠，遮住大半个脸，便于他进行观察，日军司令部门口的碉堡、院内的设施尽收眼底。到了厨房，王师傅指着附近的一座房子说：“那就是司令部办公室，日本人都去搜查了，办公室和院内都没人。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厕所，一会就来。”李汝泰心想，这可是个好机会。在王师傅出去后，他迅速溜到司令部办公室。看见墙上贴着“武运长久”四个大字，还挂着一张军用地图，在办公桌上放着准备“扫荡”鲁西南和湖



西根据地的路线图。这可是无价之宝，赶快拿起装在自己裤裆里，飞快跑回厨房。

李汝泰搞到这份路线图万分高兴，但心中又十分担心和害怕。怕的是万一被敌人搜查出来，不仅个人的生命有危险，更重要的是我军不知道敌人的“扫荡”路线，会受到重大损失。因此，当王师傅回来后，李汝泰请求王师傅快送他出去。

李汝泰走出日军司令部以后，加快步伐，回到了商店。趁商店无人，李汝泰忙把路线图藏到货架后面。不多久，曹永年来了，带来一卷纸和一张城防图，交给李汝泰。并说，随后他的表弟、警察局的王林警官送来一身警服，让李汝泰穿上，一起察看县政府和警备大队门前的工事。下午四点左右，李汝泰跟着王林去了那两个地方。虽未停步，但那里的工事都已侦察清楚了。

晚上，曹永年又陪着李汝泰到了董家。董谦修一见面就说：“李股长受惊了”。李汝泰说：“没有什么，干革命就是冒些风险”。董谦修告诉他，日本人丢失一张“扫荡”路线图以后，咆哮如雷，凡是在院里工作人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进行审问。王厨师受审时，一口咬定不知道，连李刚进司令部送菜的事也没说。现在又传说，是八路军李刚把路线图偷走的，全城搜查肯定会更紧。李股长是否赶快出城？曹永年说：“大家都为李股长担心。”

李汝泰考虑到任务完成保差不多了，城里形势又那么紧张，还是早出城为宜，他说：“大家研究一下出城的办法。”曹永年说“王林明天奉命出城到王集搜查，李股长可跟他一起出城。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

7月19日，李汝泰又穿上伪警服，把日军的“扫荡”路线图、城防图以及有关材料藏在衣服里面，随王林一起出城。出了西关，李汝泰换上了来时的服装，由曹永年护送到黄河故道北岸，胜利返回营地。

当李汝泰向团首长汇报在虞城活动情况后，参谋长说：“你李汝泰真有豹子胆，敢混进日军司令部搞情报。”团长、政委都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要给李汝泰记一功。

### 三进虞城： 争取蒋嘉宾率部起义

时间到了解放战争的1946年，仍在湖西根据地战斗的李汝泰，又接受了第三次进虞城的任务。

1946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冒雨向陇海铁路沿线插进。8月10日夜，第七纵

队攻克杨山，第六纵队攻克兰封。随后，我军在这300华里陇海线上全面出击，歼敌5000余人，控制与破坏了这段铁路。

为了配合陇海战役，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豫军区决定争取驻扎在虞城、夏邑、永城一带的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第十八纵队司令蒋嘉宾率其5000名官兵起义。

蒋嘉宾，杨山人，曾于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杨山县委书记，1930年被捕。出狱后到西北军杨虎城部任上尉书记，1934年再次被捕，自首变节。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嘉宾在杨山四区组织起100多人的抗日武装。经我党的劝说，蒋嘉宾率部参加我党领导的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任七大队队长。在一次对日作战中，第七大队被打散。蒋嘉宾经第二总队政委王文彬批准，回杨山收拢队伍。后因湖西发生“肃清托派”事件，蒋嘉宾不敢回来。到了1939年冬，蒋嘉宾的队伍已扩展到四五百人。

蒋嘉宾一直坚持抗日，他的部队直接与日伪军战斗多次，不断破坏陇海铁路，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他曾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先后被任命为独立游击第三十支队支队长、苏鲁豫皖边区十八纵队司令。同时，蒋嘉宾又长期同我党我军建立联系，给我军送弹药，营救被俘干部，向我提供日伪军活动情报。他还应邀到湖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观光，中共湖西地委书记潘复生、湖西专署专员郭影秋、湖西军分区司令员王秉璋会见了，希望他长期埋伏，积累力量，等待时机，打起红旗。以后，潘复生也曾到过蒋嘉宾司令部驻地——虞城康楼，商谈两军协同抗日的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蒋嘉宾接管了虞城全境。

从蒋嘉宾的经历说明，争取他率部起义，不仅是形势的需要，也是有可能的。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长兼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幼平于1946年8月丰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争取蒋嘉宾率部起义的有利条件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说：蒋嘉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现在同我们的关系较好；他是地方武装，不是国民党嫡系部队；他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他本人是脱党分子，对党无仇无怨，自首后也没有做危害党的事；他在其部队中有一定的威信。因此，争取他率部起义是完全有可能的。

会后，王幼平给蒋嘉宾写了一封信，要他同我方代表谈判起义之事。中共湖西地委书记潘复生也给蒋嘉宾写了信。王幼平把这两封信交给中共湖西地委和湖西军分区敌工科李汝泰，要他具体执行争取蒋嘉宾率部起义的任务。

8月12日,李汝泰跨上战马,再一次奔驰在黄河故道的大堤上。到了杨黑楼,让村干部李连山把王幼平、潘复生的信送到虞城康楼——蒋嘉宾司令部的驻地。

这时,蒋嘉宾刚从商丘回到虞城,不在康楼。在商丘,他被国民党五十五师师长曹福林训斥一顿,要他回来同南下的解放军作战。蒋嘉宾有两个副司令,一是刘耕来,是蒋嘉宾一手培养起来的,在蒋嘉宾面前百依百顺,但他已被国民党特务所掌握,坚决反共。另一个副司令是高一侠,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监视蒋嘉宾和控制刘耕来。当王幼平、潘复生的信送到康楼时,被刘耕来、高一侠截获,立即密报给曹福林。但他们不敢扣压蒋嘉宾的信,拖了一天才转到蒋嘉宾手里。

王幼平等不到回信,非常着急。因为陇海战役已经打响,早日争取蒋嘉宾起义,对整个战役有利。指示李汝泰再去解放军豫东纵队,看看他们联系上了没有?

第二天,李汝泰来到了豫东纵队,见到了司令员魏凤楼和砀山县县长史晓召。史晓召是蒋嘉宾的同乡,又是世交,有着比较密切的往来。当时,史晓召正忙着配合野战军打砀山。第二野战军七纵司令员杨勇把他找去,要他马上传话给蒋嘉宾,现在是他立功的时候了。杨勇提出几个方案让蒋嘉宾选择:一、现在就起义,蒋嘉宾控制的地区由解放军接管;二、如现在不起义,允许我部队从他这个地区通过,不要干扰解放军的行动,解放军也不打他;三、如上述两条都做不到,解放军就坚决把他打掉。

史晓召接受了与蒋嘉宾谈判的任务,马上传话给蒋嘉宾,并等他的回音。不久,蒋嘉宾回话,表示欢迎解放军派代表来康楼司令部谈判。这时,李汝泰已来到豫东纵队,派一个骑兵班护送史晓召和李汝泰去谈判。

蒋嘉宾虽然同意谈判,但他原来只打算为解放军让路,向解放军提供一些情报。谈判前他把这个底牌告诉了他的好友郭永照。

郭永照是西北军军官,原是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做兵运工作,是蒋嘉宾的同乡,又是小学同学。1946年2月,他在菏泽接受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的命令返回蒋管区,在开封同蒋嘉宾相遇,常有联系。8月11日,郭永照来到了虞城,蒋嘉宾告诉他,即将同解放军的代表进行谈判,要郭作为他的代表参加。

谈判中,史晓召向蒋嘉宾转达杨勇司令员对他的第一条意见,即现在就起义,所控制地区由我们接管。蒋嘉宾说:“我没什么问题,还得给下面的人商量一下”。李汝泰还单独向蒋嘉宾谈话,对他讲,起义后部队不整编,官兵不动,建制不变,接受共产党领导,番

号在起义后再定。

经过史晓召、李汝泰分别转达了杨勇、王幼平的意见和他们做工作后,蒋嘉宾心中有了数,愿意起义,而他的副司令刘耕来坚持不起义,不愿接受共产党领导。副司令高一侠态度更恶劣,他是军统特务,更不同意起义。会上的斗争非常激烈,蒋嘉宾左右为难,迟迟下不了决心。谈判持续到午夜之后,郭永照小声对蒋嘉宾说:“东边砀山解放了,西边兰封也解放了,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前途,你过去被他们扣押过,还没吃够苦头?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几个副司令不同意起义,关键在你,你定下来,他们敢不服从。”于是,蒋嘉宾说:“不要争论了,我决定明天起义”。史晓召很快起草了起义的通电,要他签名,几个副司令不同意公开发通电,也不同意签名。蒋嘉宾激动地说:“起义就是起义,不公开怎么叫起义呢?你们不签字,我一个人签字,不牵连你们”。几个副司令见蒋嘉宾动火了,也都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

蒋嘉宾率部起义通电发出后,把其部队集中到虞城的康楼、大乔集、小乔集等地,虞城、马牧、杨集等地由解放军接收,虞城全境获得解放。

蒋嘉宾率部起义,为我军打下陇海线上的杨集、黄口等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在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非嫡系部队中产生较大影响。但是,蒋介石对蒋嘉宾率部起义大为恼火,马上派新五军向陇海路反扑,很快占领了砀山等地。我军采取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火速撤到定陶、巨野地区。

形势的骤然变化,蒋嘉宾部队中的反动分子蠢蠢欲动,秘密与新五军联系,准备叛变。杨勇司令员察觉了他们的阴谋,派人请副司令刘耕来、高一侠到七纵开会,准备当场扣押,刘、高二人不来。杨勇又急派骑兵告诉李汝泰,让他和史晓召赶快离队脱险。他们正研究李汝泰、史晓召如何脱险问题,蒋部的特务团长葛洪章打来电话,要求见蒋嘉宾。蒋一听葛要来,知道大事不好,要李汝泰快走。李汝泰催马加鞭下了黄河大堤,回到了豫东纵队。

这时,刘耕东、高一侠等人来到蒋嘉宾跟前,要把队伍拉回到国民党新五军去。蒋嘉宾不干,几个人就把他架走。他们还捆打了史晓召,把史严重刺伤。蒋嘉宾发现后,以离开部队并把部队交给刘耕来为条件,史晓召才被放走。蒋嘉宾从此离开部队回家了。

全国解放后,蒋嘉宾在河南省政协工作,党籍问题也解决了。

(作者杨步胜、原任《瞭望》周刊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林 跃)

# 团成砥柱 止申流

——朱德在临汾  
抗敌前线

● 张文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自卫与尊严的枪声，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

大敌当前，十年内战之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共御外侮。有“红军之父”之称的朱德，受命担任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9月6日，率八路军总部自陕北东进抗战前线——第二战区山西，配合友军，在平型关和忻口阻击日军。

忻口战役结束后，11月8日，太原失守，第二战区和各党政军机构云集晋南重镇临汾。从情报看，日军在紧张的调动兵力，进攻临汾已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形势不好应付，该怎么办？国共两军共谋作战方略。

有的国民党军官认为晋南的仗不好打，不如退到黄河以南去把守潼关，较多的人基于日军进犯之路线分析，提出在其所经之地——灵石县境内太岳山脉的韩信岭天险处，伏歼日军。卫立煌亦持此种主张。

朱德发表意见说：我们必须坚守华北，誓死也不能退过黄河。韩信岭可守还是要守，但是不能光靠韩信岭，应当改变战略战术。八路军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主要的是在敌侧翼和后方作战，这种战略与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全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除了和大家一起讨论，朱德还数次与卫立煌个别长谈，了解其有些什么思想问题，也好尽力帮助他解决，巩固他坚持华北抗战、不退过黄河的决心。例如，国民党军队从来没有打过没有后方的战斗，卫立煌在盘算：他的军队若留在山西，供给不上怎么办？朱德就说，我们从前也没有打过没有后方的仗，最初看来，没有后方的仗是不好打的，但是我们从战争中学会战争，密切了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改变了自己的军队，我们就会打没有后方的仗了。山西到处都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民，他们都拥护抗日的军队，到处都是我们的后方，到处都能通行，我们怕什么呢？

对于阎锡山，朱德也坚持鼓其斗志，振作其精神。太原失守以后，阎锡山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因为他自己的山西旧军已溃散了70%，地方官吏纷纷逃跑，多年经营的那个山西“家天下”已经崩溃，发出了“不能抬着棺材抗日”的哀叹，虽时有“反攻太原”之语，也不免流之于不切实际。朱德知其消颓之中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心理，就鼓励他说：

你不要以为你的军队垮了，不得了，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是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是让开点和线，退到敌后打游击，让敌人去占领一些点和线，分散他们的兵力；它越多占领一些地方，补给线越长，那样我们就越有机动的余地，可以越打越强。不要

以为你那旧军垮了怎么样,旧军还有底子,同时要赶快组织新军。希望你阎长官和我们一起坚持在敌后。

阎锡山不能否认朱德的话很有道理,但要让他坚持敌后,与其说他不能,不如说他不敢更准确。不过,这次会商的结果,决定由阎、卫拨出7个半师(主要是滞留在晋东的军队)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并要朱德出任东路军总指挥。鉴于晋东南局势已经很危急——侵占太原的日军在完成补充、调整后,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朱德感到“不能在此危难之际不受命”,乃致电毛泽东表示,决心同彭德怀一起组织野战司令部在晋东南前线指挥作战。

2月17日,阎锡山、卫立煌和朱德会商御敌之策后,阎锡山即进入吕梁山区,向着吉县一带转移,把阻止日军南进的任务交由卫立煌担当。卫立煌即把他所率领的主力部队摆在太岳山区的韩信岭一带,构筑工事,采取阵地战的方法,准备进行忻口战役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

朱德受命于危难之际,2月20日亦率八路军总部离开洪洞县马牧村驻地,奔赴太行前线。随行的除十来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200人。

同一天,进攻晋南之东路日军攻占长治并沿临屯公路西进,23日凌晨,其先头部队苦米地旅团又进入屯留、安泽两县交界的良马镇,直逼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安泽县城岳阳镇。

敌人离得这么近,怎么办?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还是很容易的。但是,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若任其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临汾,不仅损失巨大,而且对整个晋南战局将极为不利。因此,朱德不退反进,没有向山地转移,而是毅然率领身边的200余人,开到临屯公路上的方县镇(今旧县镇)进行阻击。此举正如他致电毛泽东所说的,虽“手中无兵,阻敌不易”,但为大局计,必须不可为而为之,尽量迟滞敌军。当时在八路军总部经历这场战斗的陆定一在1939年撰文回顾说:

“我亲身看见,当苦米地旅团由长治进攻临汾的时候,朱副司令长官(朱德于1939年3月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只带了两个连,在良马、府城一带与敌不期遭遇。那时,他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会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亲率了仅有的两个连与敌人打了三天之久。”

3月2日,朱德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24日

至28日,在沁县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到会的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二九师的负责干部外,还有山西行政专员公署专员薄一波以及国民党军队将领曾万钟、朱怀冰等共30多人。朱德在会上讲话,分析敌我形势,一条一条的介绍八路军粉碎日军进攻和坚持敌后战争的战略战术,鼓励国民党军队将领为抗日作出贡献。对于这些军官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一一帮助解决。这次会议,稳定了东路军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情绪,鼓励了他们的抗日信心。

在朱德、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东路军中的国民党军队也学习八路军的作战方法,利用山形地势,向着日本军队的后方空隙钻过去,全部安全摆脱了日军的包围,打破了日军打算将中国军队逼到黄河边上加以歼灭的企图。朱德曾生动地描述这段往事:

“他(指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将我们压到黄河转弯的地方,那个小角角里面去,你还往哪儿跑?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这个办法倒很聪明,但是我们也聪明。那时候我们八路军已经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指挥着一部分国军。我们就全部向东北打出来,让你去打向黄河边上。结果他打到了黄河边上,朝四处望望,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已经失败了。”“同时他也不能过河,是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们整个的队伍在敌人的后方,他不敢过河,他只有退回来。”

东路军如此这般,卫立煌所指挥的其它在韩信岭的军队,也学习这种方法,居然学得不错,十几个师分成数路,一一从日军的大包围圈里拉出来,没有被消灭,没有溃散,这种情况,也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所没有过的、很了不起的事情。至此,日本军队企图消灭这些军队于晋南的一个包围歼灭计划完全落空。

自此以后,阎锡山在吕梁山区,卫立煌进入中条山。朱德则坚持在太行山脉,领导八路军开辟和建立敌后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自始至终从战略上、战役上配合着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

8年时间里,国民党虽几经摩擦、三番反共高潮,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局为重,始终如一,国共合作终于维系到这场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朱德亦不免感慨系之,军中赋诗曰:

朋辈志同意自投,  
团成砥柱止中流。  
肃清日寇吾侪事,  
鹬蚌相争笑列侯。

# 太行《新华日报》社长何云殉国记

○戈基

## 铅字和子弹共鸣， 笔杆与枪杆齐飞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年出身在浙江省上虞县朱巷乡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1918年高小毕业后，只有14岁的何云，为了帮助父母维持家庭生活，到一个小村里去教书。1919年，他考进了绍兴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23年秋，绍师毕业后，到春晖中学附小任教。1926年，共产党员叶天底领导农民革命，何云积极投入这一运动，写了许多唤起民众、打倒土豪劣绅、揭露黑暗社会的文章。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不少同志被捕，白色恐怖笼罩上虞城，何云弃教逃到上海。

何云到上海后，经朋友帮助，在复旦大学学习了半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来中国招生，何云考上了这个大学的经济系，踏上了去日本的旅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何云和一些爱国青年，怀着对侵害者的仇恨，毅然停学回国，一到上海，就投入抗日救国的战斗行列。他以泉漳中学教师的名义作掩护，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并担任“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宣传部长。1932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当了《中国论坛》的编辑，协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领导的“民族解放大同盟”开展工作。白天，上街演讲，晚上深入工人中宣传抗日救国。1933年6月，何云不幸被捕，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

南京宪兵司令部是杀人如麻的魔窟。敌人用各种刑罚，对何云进行威胁、利诱、逼供，何云坚贞不屈，向敌人作顽强的斗争，被判处无期徒刑，送进了监狱。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何云在党的营救下出狱了。他蹲了四年监狱，身体很瘦弱。他看到日寇侵略中国的恶行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潮，心情异常激动，一出狱，就到《金陵日报》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在日寇大举进攻、烧杀抢掠、国破家亡的时刻，中

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及国民党爱国志士的压力下，同意合作抗日，并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设立一个办事处，办一张报纸。党中央决定周恩来、董必武出任办事处正、副主任，在南京筹备出版《新华日报》。何云被调到《新华日报》任国际新闻栏主编。

1938年10月，何云奉党的指示，带领一部分职工到西安创办《新华日报》西北版。出版工作筹备就绪，正要出报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从中阻挠，不同意在他们统治区出报。这时，周恩来和彭德怀先后路过西安去延安，得知此事，彭总说：“他们不让出西北版，人员和机器都给我，到太行去出报。”不久，中央决定：何云去太行负责筹办《新华日报》（华北版）。

到敌后出版中央一级的党报，没有先例。记者董谦不无忧虑地问何云：“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能办好报纸呢？”

何云满怀信心地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什么事，要靠人去开拓，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战胜它。”开拓这条路，何云可说是花尽了心血。

1938年10月初，何云到达晋东南后，立即赶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接受指示，商定办报方针。何云大抓新闻干部的培训工作，办起了一百多人的记者训练班，延安抗大、鲁艺等学校派来一批文字和美术工作者，组成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基本队伍。何云率领这支队伍和设备，于10月底从沁县到后沟，经过紧张的工作，不到一个月，工厂初具规模，于12月20日即出版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1939年元旦正式出报。

何云经常告诉报社同志：“一个铅字等于一颗子弹，在敌后办报就是无形的战斗。”他的这几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火线办报的情况。在激烈的反“扫荡”中，报社没有固定的地址，经常转移。在何云的周密安排下，组织北师大毕业、精通理工的

王显周,偕同印刷厂厂长周永生和工人韩晋升、张建功等,把铅字改小,制造了小型轻便的活动铅字架和小型脚踏机、轧墨机、浇版机,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只需三匹骡子即可驮走。何云把它称作“背起报馆打游击”。他将工人和编辑人员组成连队,荷枪实弹,一面跟鬼子周旋,一面设法出报。因此,尽管环境恶劣,炮火连天,每天一期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从未中断,及时把国内外重大新闻刊印出来,提供党政军领导参阅,供根据地人民阅读,指导对敌斗争。报社电务科在何云精心培育和电台同志不断努力下,发展成为华北敌后唯一强大的新闻台,能收到延安新华社、重庆中央社和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的垄断和封锁,报上的国际新闻比中央社特发的还快。报社编印《每日电讯》,提供给领导和兄弟报刊。遇到战斗紧张时,何云便在吃饭休息间隙,命令报务员架起电台,收听延安新华社总社的新闻,不能铅印,就出油印战报。1939年敌人“扫荡”时,他将报社人员化整为零,出版了东线版、西线版、南线版、北线版。“百团大战”时他带领部分记者携带油印机,跟着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和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日夜战斗在火线上,写完报导,立即送审,油印发行。《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敌后的影响、作用,日益增大了,不仅受到国内抗日军民的信赖、珍愛和支持,还得到国外的关注。美国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都长期订阅,它成为坚持敌后抗战最有力的新闻媒介。朱德总司令曾这样评论:“一张华北版《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天天和日寇作战。”《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办一周年时,杨尚昆在讲话中说:“《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敌后诞生的一年,是艰苦奋斗的一年。在极度困难和敌寇大举‘扫荡’的情况下,也不断努力安排与读者见面,替我们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开辟了敌后新闻事业的新纪录。”

由于《新华日报》华北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日寇千方百计要消灭它,每次“扫荡”,都把摧毁《新华日报》华北版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日寇还利用东京的《朝日新闻》、天津的《庸报》、山西《新民报》等敌伪报刊,大肆吹嘘“华北《新华日报》已被我扫荡中彻底摧毁。”可是,何云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在残暴的日寇面前,迎着烽烟战火挺进,常以战斗员兼指挥员的姿态办报。报社开创后第一年的“七·七”纪念日,何云正在中共北方局驻地襄垣开会,敌人突然从子洪口南下占据沁县。回报社的路被切断了,他惦记着报社人馬和财物的转移,不顾个人安危,跃上战马立即往回赶,在襄垣与沁县交界处与敌遭遇,赤手空拳的何云连忙调转马头



何云(左一)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太行合影

奔上山岭,在突围中被我军所救。返回北方局和领导研究后,他又连夜闯过封锁线赶回报社,指挥全体同志带着机器、铅字,冒着敌机轰炸和扫射,趟过齐胸的漳河水,将报社搬迁到路东武乡县八路军总部驻地,恢复报纸出版工作。

报社邻近敌军驻地,有时三十里,有时不到二十里,敌我双方接触的枪声有时也声声入耳。有一次何云与来访的重庆《新华日报》记者陆诒饮酒谈天,何云称这种场面为“杯酒论英豪”,他很自豪地告诉陆诒:“你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只是笔杆抗战而已,可是在此地,则是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与枪杆齐飞。”

## 五月狂风折栋梁 报人碧血染清漳

日寇为了摆脱太行军民抗日斗争的威胁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困境,1942年5月19日,从同浦、石太、平汉等铁路线据点,纠集了两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及大批伪军共三万多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篦梳式”的疯狂大“扫荡”,妄图摧毁八路军总部。这次



“扫荡”之周密，手段之毒辣，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太行山区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灭绝人性。

何云看到形势险恶，一面利用报纸及时将敌动态、暴行告诉人民，大声疾呼：“提高警惕！紧急战备！”“太行敌军续增，扫荡企图愈明”，将报纸改出战时小报；一面组织报社的同志备战，轻装，将不便携带的物资以及女同志、病号、小孩隐蔽到离山庄二十多里的庄子岭。庄子岭地形险要，自然山洞多，山上有树木，是八路军总部的后方隐蔽基地。

5月24日，日寇开始向辽县、武安、偏城袭击、合围，来势凶猛。25日，日寇以六千多兵力从西、北、南三面组织一个以艾铺为中心的合围圈，配合飞机多架，轮番轰炸。为了抗击敌人的疯狂“扫荡”，适应打游击和出报，何云将报社临时编成两个连队，由报社秘书长史纪言、印刷厂厂长周永生分别担任连长，对外总称是八路军教导队，他亲自担任队长，并任命上过抗大的林火任指导员。25日凌晨，八路军总部从麻田、大林口出发，何云奉命带领二百多人的报社队伍，在一个警卫排的掩护下，从山庄出发，与总部一起向游击根据地附近的庄子岭、寺子沟转移。队伍撤离山庄时，已听到枪声，经过南艾铺时，被敌人发现，便加紧合围，我军在十字岭方向跟敌交战的枪炮声不绝于耳。

十字岭是太行山主脉，也是河北、山西两省的自然分界线，西边一侧是辽县，东边一侧为偏城县。去庄子岭、寺子沟，必须经过十字岭。何云带着教导大队爬上十字岭，经过一路急行军，上午十时左右，顺利到达寺子沟。这是一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座落在庄子岭沟底。这时，总部的队伍还没有过来，何云让报社同志休息，待命行动。

吃了中饭，又吃了晚饭，等到黄昏，仍不见总部的人来。何云眼望西山，火光冲天，枪声不断，他心急火燎，给总部领导写了一封信，派人专程去找总部联系。

“大家不要着急，抓紧时间休息，养足精神，准备战斗。”何云鼓励报社的同志，并和史纪言、周永生安排大家宿营，组织警卫排站岗放哨，干部轮流值班守夜。自己则和编辑部的同志研究出报。

一直盼到次日拂晓，盼到红日东升，盼到中午，不见送信的人归来。枪声越来越响，何云焦急万分。

过了中午，几架敌机隆隆而来，左盘右旋，越飞越低，向下俯冲，投弹，扫射，响起震天动地的轰炸声。何云急忙把人马分散到沟谷、山洞和树丛中隐蔽。三头驮铅字、印刷器材的骡子被炸死，翻倒在山沟里，铅字撒满了山坡。战时出铅印报的计划无法实现了，何云和

陈克寒、林火，忧心如焚，向西山仰望，切盼送信人的消息。

等到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突然发现西山山梁的路上，隐隐约约有人影伫立，仔细观察，象是哨兵在那里站岗。林火喜出望外地对何云说：

“可能是我们部队的岗哨，我去侦察侦察。”

何云紧握林火的手，反复叮嘱：“多加小心，多加小心。”

林火跨上了一匹骡子，带了个马夫，在徐徐降临的夜色中，沿着傍山小道，小心翼翼地到了山上。一看，停立在那里的果然是我们的哨兵。哨兵听林火说是报社的，就急忙告诉他：“罗主任就在前边。”

林火走不多远，看到身材高大的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正坐在草地上休息，一见林火，不等他开口，就急问：“何云呢？”

“我们队伍在右边的沟里等待命令。”

罗瑞卿没有多问情况，就下命令：“叫他赶快把队伍带过来，跟我们一块走。”

林火立即转身，飞奔下山，向何云转告罗主任的命令。何云象遇到救星一样兴奋，急忙集合队伍，连走带跑地带上山岭和总部汇合。

何云一到山上，就和陈克寒、林火等去见罗瑞卿。罗向他们介绍了总部几天来的情况。

何云等得知：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部队作战中，不幸牺牲。

第二天拂晓，罗瑞卿率政治部和大队人马沿着高山狭路，向东南方向转移，走了三个多小时，发现前面山下有许多敌人。罗当机立断，命令全体人马兵分几路，分段行动，分头向西转移。何云指挥教导队，沿着山坡向西疾进。到了武安县馆陶川，爬上西边高山，突然南山头传来枪声，青年木刻家赵青被机枪打中，摔下山沟，壮烈牺牲。何云怀着悲痛，带着队伍来到坡底深谷旁边，又与政治部大队人马汇合在一起。罗瑞卿等各分队汇合后，立即集合队伍，宣布：我们已陷入敌人包围圈，决定化整为零，分散突围。要求各单位火速召开小型会议，讨论如何行军突围，人人献计献策。报社经过讨论，决定分成三路：一路由何云率领少数编辑、电务、印刷工人组成轻装小分队，随罗主任突围转移，继续出油印报；另一路包括采编部、参考室由陈克寒和林火带队，随某团突围，到太南采访；余下人员由史纪言带领就地分散隐蔽，和老乡们一起打游击。何云将此计划向罗瑞卿作了汇报，得到允准后，立即分头行动，沿前山路向南疾进。

何云带着准备出油印报的小分队突围，由于敌人



封锁很严，突了几次都遇到困难，只好退回到庄子岭西山沟里树下隐蔽。天黑时，敌机投掷燃烧弹，山坡上的干草都燃烧起来，部队一边灭火，一边继续突围，到次日天亮前，大部分同志突出了包围圈，何云与部分同志还是没有冲出去。

天亮后，敌人以密集的队形，以所谓“篦梳战术”开始搜山。何云和十几个同志寸步难行，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上级。何云果断作出两项决定：一是一部分转移到庄子岭上去隐蔽，跟上级取得联系后再出油印报；二是由电务科副科长文绶带着电务科五、六个人从另一方向去庄子岭，约定太阳落山后在庄子岭集合。为了减少目标，让文绶带着电务科的同志先走。何云命令身边的几个同志：“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决不能当俘虏。”

何云带着四、五个人在敌人搜山之际，突围到辽县东南大小羊角村附近时，被山上的敌人发现。敌人向他们疯狂射击。何云的腿行动本来就很难，加上连日来水米未进，疲惫不堪，走不快，跑不动，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负了重伤昏倒在地。敌人退后，医生上来抢救，何云睁开无力的眼睛对他说：“我的伤不重，快去抢救倒在前面的同志。”

医生检视完其他伤病员返回看望何云时，他已流尽最后一滴血，心脏停止了跳动。

文绶带着电务科的几个同志边走边侦察，几次绕过敌人，于下午到达庄子岭各自隐蔽起来。等到太阳下山，敌人停止搜山，不见何云他们到达，心里很着急。这时，听到文书科长刘川峙叫他，他应声下山。刘告诉他：“何云在离庄子岭七里路的地方牺牲了，那里还有很多伤员，没有人照应，你们赶快去。”

夜幕降临，文绶带着电务科的几个人跑到现场，一看何云倒在地上，子弹从背后臀部打进，从睾丸处穿出，鲜血淌了一地。离他不远，王默磐、相复兴、何云的警卫员王保林，都负了重伤，不能行动。这时，敌人在山头烧起了篝火，鬼子叽叽喳喳地喊叫，近在咫尺。电务科同志不顾个人危险，含着眼泪，把何云的尸体抬到半山坡的一颗大树下，因无工具，没法掩埋，大家搬了很多石头，把它垒起来，让敌人以为是一堆石头。接着架着几个负伤的同志回到庄子岭隐蔽，一直忙到半夜。

第二天，敌人又展开队形，向山洞、树林搜索，山上、山下到处是鬼子、伪军，很多同志阵亡。医生阎兆文不顾个人安危，白天冒险救治伤员，猝遇一股佯退之敌，惨遭杀害。报社调研科长王友堂隐蔽在树林里，被

一九四二年五月華北新華日報  
社，長何雲等四十餘位同志壯烈  
犧牲烈士們永垂不朽

一九四五年一月  
陸定一敬書

陆定一同志题词

敌发现，把他打伤后，又冲上来，捅了他三刀，后来幸免于死。史纪言与敌遭遇，弹伤大腿，被伪军踢落田坎。电务科长王默磐负伤后，咬破舌头，喷血满面，敌以为弹从口出，踢了他两脚走开。很多同志用手挖土，埋上自身，避过搜山敌人。有几个同志在暮色苍茫中，与敌狭路相逢，急中生智，脱下一只布鞋，向敌扔去，敌误认为是手榴弹，慌忙卧倒，他们抓住这一刹那，转身跑入林中。庄子岭只有一户人家，在敌人的扫荡中，郭二嫂冒着生命危险，组织丈夫和两个儿子给山洞里的同志送饭、送水和抢救伤员。郭二嫂的小儿子郭熹常到山庄做工，认识何云和报社的很多同志，他躲在山洞里，目睹何云和一些同志在敌人的追击下中弹倒地。郭二嫂目睹乔秋远被敌抓住后，鬼子用刀砍下他的头颅；目睹阎医生在与敌搏斗中，惨遭杀害。郭二嫂的大儿子隐蔽在道士帽山的石洞里，看到报馆经理部秘书兼主任黄君珏、十六岁的译电员王健和医生韩岩等三个女同志，躲在对面一个峭壁的山洞里，被敌人发现，当敌人逼近洞口时，黄君珏突然跃出，打死了几个敌人，敌人便窜到洞顶上，放上柴草，引火烧洞，喊话劝降。黄君珏誓死不当俘虏，飞身出洞，纵身跳下百丈深渊，以身殉国。王健和韩医生宁死不屈，被烟火薰死在山洞里。

三位女同志的英勇献身，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最感悲愤、痛苦的是黄君珏的丈夫王默磐，三位女同志英勇牺牲时，他正负伤隐蔽在他们对面的山洞中，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敌围困，跳崖殉国，眼睁睁看着王健和韩岩葬身火窟。

由于敌人反复连续搜山，隐蔽在庄子岭一带的同志到了无法生存的困境。有的饿得不能动弹，有的想用自己的尿解渴。由于几天没有喝水，无尿可排，口干得像要冒烟。敌人的疯狂搜山进行了半个多月，直到6月5日，彭德怀副总司令从十字岭突围后，到外线指挥部打了长治的日寇飞机场，烧了汽油库，敌人才仓皇撤离。华北《新华日报》社在五月反“扫荡”的斗争中。牺牲、被俘，失踪共计47人。国际新闻特派员、二十二岁的青年诗人高咏，背着即将完成的长篇叙事诗《漳河牧歌传》投入战斗，身陷重围，被敌刺死，鲜血浸湿了黑漆提包里的诗稿；《胜利报》记者、二十二岁的陈宗平和华北《新华日报》记者一块到敌占区采访，不幸在野草湾的集市上被俘，敌人强迫他到城里去，陈宗平大声回答，“砍头也不去！”敌人用粗绳将他捆住，拖了半里路，最后，把他的头垫在石头上，用乱刀将他砍死，很久很久，那块白石头还沾着他鲜红的血迹。《新华日报》出版科长肖炳煌、总务科长韩秩吾、国际编辑缪乙平、编辑黄中坚、管理股长孙克温、十九岁的女会计郝

青芳、记者陈述、印刷队长董自托、报务员万兆莲、发行员张芳万、印刷工人胡义晋、郭汉文等，在突围中牺牲。报社管委会秘书长杨叙九、印刷厂指导员梁振山、编辑李晖被俘后，英勇不屈，惨遭杀害。史纪言等很多同志负了重伤……他们的鲜血洒遍了太行庄子岭的山洞、隘谷、深沟，这是我党新闻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也是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反“扫荡”结束，华北《新华日报》社于7月8日在涉县熟峪村西山腰的一座石庙里，为何云等烈士开追悼会。同志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用松柏、树枝搭起牌楼、灵棚，院内挂满了挽联、悼文和花圈。古庙宽敞，僻静，气氛悲壮肃穆。林火致悼词，新任社长陈克寒讲了何云生前为党、为人民的功绩，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为烈士报仇。

9月1日，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举行追悼何云及全体新闻界殉国烈士纪念会。杨尚昆到会报告何云生前的英雄事迹，博古讲话。参加追悼会的还有王若飞、王鹤寿、乔木、罗迈、陶铸等。当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杨尚昆《悼何云》、陶铸《沉痛的哀悼》等文章。华北《新华日报》发表了邓拓《哭何云同志》的挽诗：

文章浩荡卫神州，血溅太行志亦酬。

党报事艰来日永，同侪心痛老成休。

云山遥祭挥无泪，笔阵横开雷大仇。

后死吾曹犹健在，不教胡语乱啾啾。

1986年5月，由太行新闻史学会、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起，经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在华北《新华日报》社驻地及何云和等烈士的牺牲地——山庄、岭南、十字岭、一个风景幽美清漳河环绕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纪念碑正面镌刻着杨尚昆的题词：

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本刊更正

第八期刊登的《从“京九”到京九：迥然不同的历史画面》一文中，第一部分中说：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13年的时间里，一共才筑成铁路348公里，平均每年筑路不足3公里”，应改为“不足30公里”；又，第五部分小标题中说：“看来京广、京汉铁路之间”，“京汉”应为“京沪”。持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 梁 文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数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 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

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正是中国在全世界面临法西斯侵

略的淫威时，在远东坚持抗击着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其中从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中是处于独立无援的处境中的；正是中国坚持抗战牵制了日军的主力、消耗了日军的精锐，才使得盟军能够实现先欧后亚的战略，率先集中力量击败德国，才使得盟军在对日反攻时有如神助般地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订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

对于日本，以英美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

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 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

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镳。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宥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 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辩,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间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

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拢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1952年2月2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

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除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

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

“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



“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中日间战争赔偿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二十年以后的事。

####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 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 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电视转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戒。

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

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

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责任编辑 萧 徐）

## 对《新中国建立时的国号之争》之补充

贵刊第7期刊登的《新中国建立时的国号之争》一文，讲述了1949年9月下旬那次关于新中国国号的争论。其实，在此之前，就曾有过多次讨论。

早在1948年，新中国的曙光露出地平线时，新中国将采用什么名称就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起初，各界人士大部分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也有少数人赞成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在电复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与李济深等12位民主人士的电函中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高岗、李富春与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朱学范等8人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中，也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

一个月后，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发表时，就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到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宣告正式成立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阐述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时，又提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选举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此次会议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方案”是新政协筹备会的中心任务

之一。可见，在1949年7月以前新中国的“候选名”已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

恰在这时，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倡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他的主张得到了1949年7月8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4小组第2次全体会议与会人员的认可。大家认为：“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对此，周恩来也表示支持。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做报告时，就国名问题作了相似的阐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

这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响亮的名称便迅速为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延用至今。

张 蕊

# 轰动天京的 “杖责天王” 事件

● 魏文华



“洪秀全，你有过错，你知道吗？”

“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教育。”

“你知道有过错，即杖四十！”

对话人是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和天王洪秀全。时间是太平天国癸丑三年（1853年）冬。这一轰动天京的事件，史称“杖责天王”事件。

事件发生前九个月，太平军建都天京，在上下一片喜悦声中，自言“此正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忙于开府设官，安享天福，逐渐忘记了过去行军作战期间的患难生活和患难与共的兄弟姊妹情谊。

天王洪秀全对待女官态度粗暴，与杨秀清和石达开等有关的四女官要求调离天府，而女官受委屈是在天府大兴土木中发生的，同时牵涉到众多服劳役的女工。杨秀清围绕“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个题目，对洪秀全在处理内宫事务和国事上的作风问题，提出一系列尖锐的直接了当的批评意见，并威胁要对天王杖责，至洪秀全承认错误才罢。所以这是一场直接冒犯帝王尊严的挑战，既紧张又具戏剧性。

## 一、建都天京初期的种种 失误与内部矛盾的发生

历史几乎有一常规，在农民革命运动中，领袖们共患难，共安乐，这一规律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前后的大胜形势下，迅速表现出来。天王洪秀全进城后的一些重大政策失误和大兴土木关门当王的表现，与臣民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攻破南京前五日，统率全军的东王杨秀清在城外发布安民告示，要士农工商“尔等务宜各安居故土，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无庸震惧……”。据后来李秀成在“自述”中说到杨秀清的安民：“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

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法律严，故癸丑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

可是，杨秀清的安民令，很快就被破坏。在杨秀清领兵东征镇江、扬州并随即生重病期间，天京突然实行了消灭家庭强令男女分居归馆入营的社会政策，又发生役使妇女及老人当兴建天府的劳动、踢打以致处死女官等极其严重的错误作法，引致天京居民逃亡、自杀、反抗。

杨秀清从“将就死”的重病中全愈过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制止天京的混乱。当关系天京交通命脉的水营被北王韦昌辉部下抢夺船只而逼反的时候，杨秀清果断地将肇事的为首者韦昌辉及其部下张子朋杖责，抚慰并奖赏了水营官兵，才把水营叛乱事件平息，除了几百只驶出港口散走的船只以外，使大部分船只留了下来。这件事，连曾国藩的谋士们也叹服为“其权诈笼络人心类如此”。

在处刑了类似北王韦昌辉这样的当权派以后，杨秀清又于这年五月初一日，重新颁发了进南京前颁布过的那份“士农工商各力其业”的安民布告，但收效甚微。而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已急转直下，日益恶化。

由于全城男女都各强行分居，男归营，女入馆，商业手工业全部收归国有，生产和流通都陷入停顿状态；物资按口定量分配，只消费不生产，坐吃山空，圣库里的存粮存银急剧下降，圣库存银初入城时最高达1800万两，半年后只剩下800万两，至年底所有金银首饰不过390万两，粮食短缺，次年全城“下吃粥之令”。

军事上，清军在南京城东北筑营24座，建起了江南大营；在长江北岸，从浦口至扬州一线建起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隔江呼应，形成对天京的大包围，严重威胁着天京的安全。

与此同时，太平军北伐与西征，也都遇到了困难。

到年底,北伐军在天津附近苦战以后,已经从主动变为被动,开始节节败退;西征军攻围南昌不克,而攻武昌城两三个月久围不下,而敌军则有曾国藩练成的一支新军兴起,潜伏着次年春夏湖南、湖北即将连续大吃败仗的根苗。

在如此危急的政治、经济、军事逆转形势下,天王洪秀全仍在加紧建周周围十里的天王府。由于南京城的人口或出征、或逃亡,已由破城前的二百六七十万人锐减至三四十万人,壮劳力严重不足,天王下令征召的安徽、湖北民工寥寥无几,乃从女馆和老人馆征用妇女、老人作工。用他们拆除两江总督署周围十几条街道的上万户民房,从明故宫和庙宇拆取搬动砖、石、木料。进入雨雪霏霏的秋冬季节,仍然凿城挖池不止。而洪秀全亲自监督,时有骂人、打人以至杀人的事发生。

杨秀清看出来,天京混乱的根源在最高层,中心的问题是君臣上下关系。要想挽救危急形势,调整并改变不合民心的错误政策,首先要谏劝天王洪秀转变作风,正确地对待臣民。其方式是采取权威性的“天父下凡”。

## 二、何谓“天父下凡”?

封建社会制度下,农民革命多半运用宗教形式宣传和组织群众,太平天国也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洪秀全最早在广州接触了基督教经书。他在科举考场失意中患瘵病时,自言由天使接上天,奉天父上主皇上帝命“同众天使逐妖魔”,与冯云山创立拜上帝教。洪秀全自称是天父次子和耶稣基督之弟,故人称其“二兄”,冯云山为三,杨秀清为四,开展宣传活动。

洪秀全、冯云山率领会众除了独尊天父、天兄之外,到处捣毁庙宇偶像。冯云山因此被逮捕下狱桂平,洪秀全远走广东。

在拜上帝会群龙无首陷于瓦解的危急关头,当地的烧炭佬杨秀清,利用当地流行的“降僮”即神鬼附在人身上说话的迷信风俗,首先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三日,宣称“天父下凡”降在他的身上;半年后的九月九日,杨秀清的好友萧朝贵又作“天兄下凡”。杨、萧二人利用天父和天兄的名义,号召群众坚韧待时,不但使惶乱的人心安定住,保住拜上帝会团结不散;而且由烧炭的伙伴们炭炭得钱数百串,帮助冯云山打赢了官司得以获释出狱,这件事后来成为太平天国著名的“科炭”功勋。

因为杨秀清的“天父”和萧朝贵的“天兄”,都对团结会众保住拜上帝会起到了重大作用,后来受到从广东回到紫荆山的教主洪秀全的承认,因而“天父下凡”和“天兄下凡”就成为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的

最高权威。“下凡”的言语称为“圣旨”,所有的人包括洪秀全在内,都要无条件地遵守,但事后仍尊洪秀全为君。曾国藩的一本情报集编书中,对此感到奇怪说:杨秀清“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造言既毕,其为君臣如初。夫古之叛逆,末路受制于臣下,篡夺者有之,缚献者有之,袭杀者有之,未闻跪而受杖仍尊为王者,荒唐儿戏,真蜂衙议队之不若。”这是他们不懂拜上帝教体制所致。

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杨秀清因为处理公务不当,他也“天父下凡”,对自己训责后又传令对自己杖责。

在萧朝贵长沙战死后,杨秀清成为唯一的天神代言人。他利用“天父下凡”,对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因而能对高高在上、无人敢犯尊严的天王洪秀全提出批评意见。

## 三、“杖责事件”的过程

自从五月初重颁了安民布告但收效甚微以后,杨秀清在七月和十一月两次“天父下凡”都直接对着天王洪秀全进行批评。

杨秀清“天父下凡”的言论,在现今留下的《天父下凡诏第二部》中有系统地记录。

十一月二十日礼拜日,杨秀清与王侯丞相众官议过国政事务,众官散去以后,杨秀清到内殿,闷闷不乐半晌,“下凡”发言道:“主宰天下,凡事皆要从宽。譬如女官在天朝佐理是天事者,多是不明天情,每有不合事宜之处,务要悠扬教导,海量宽容,使其心悦诚服,天事方可国理。若是严性过甚,未免其方寸多乱,不知如何样作法方能称旨,以此心无定见,身无安居,一事既错,万事皆非,不若从容指示训诲,使其习炼,自可圆成。即令幼主,我六父降生,虽性本善,然亦要及时教导,方不至性相近习相远也。”

在东王府女官面前“下凡”说话以后,杨秀清怒气仍未平息,又坐轿直接到天王府金龙殿前,怒声直呼天王的名字:“秀全,你有过错,尔知道吗?”

天王洪秀全只得跪下,和朝官们一起回答:“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容。”

杨秀清用“天父”的口吻大声说:“尔知有错,即杖四十!”但当洪秀全俯伏受杖时说:“小子遵旨。”杨秀清忽然改口:“尔已遵旨,我便不杖尔。”随后,杨秀清以臣子的身份,向洪秀全进行批评谏诤,第一天没有谈透,过了一天,再次登朝谏诤。

在金龙殿上的两天辩论中,杨秀清把洪秀全在家事国事上所发生的作风问题无保留地一齐抖落出来,真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因为是针对天王洪秀全的问题，所以主要是杨秀清提出批评意见，洪秀全表态承认。值得注意的是，三次辩论交锋，都是韦昌辉首先挑起来，而经杨秀清予以驳斥的：

一次是在金龙殿前，当杨秀清的“天父”刚对洪秀全宣布：“尔知有错，即杖四十！”的时候，北王韦昌辉忽然当起好人，俯伏地下，哭求：“天父开恩，赦容天王应有之责，小子等愿代天王受杖。”此时天王洪秀全倒有自知之明，对韦昌辉等说：“诸弟不得逆天父之旨。天父开恩教导，尔哥子自当受责。”

杨秀清当然看出来韦昌辉巴结天王挑拨离间的用心，忽然道：“洪秀全自作应当自受，不许别人代为受杖！”但当洪秀全说着“小子遵旨”而俯伏受杖时，他却机敏地改口说道：“尔已遵旨，我便不杖尔”，颇有节制地既驳斥韦昌辉又顾全了洪秀全的体面。

另外一次交锋，是谈到天王有无过错的时候，这时杨秀清的“天父”已离身，改用臣下身份奏对说话。杨秀清说到因为天王洪秀全的过错，“天父下凡”是“欲教二兄以为天下弟妹法则也。”天王洪秀全则改口不承认有过错，只承认“尔二兄果然有差处，始操劳天父下凡教导也；”而韦昌辉更进一步连“差”也不承认，说：“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

洪秀全的“有差”和韦昌辉说天王“无差”，都立即遭到杨秀清的驳斥：“二兄亦有此错，……至二兄行为有些未合，固是二兄有过。”可以想见当时气氛的紧张。只因为杨秀清下面解释天王过错的原因，“就是天下人民未能尽合天心，致累二兄有些小之过；然不独天下人民累二兄有些小之过，即弟亦累二兄成此些小之过。”听了杨秀清说到彼此都有过也，洪秀全才保住面子，说道：“清胞，尔所奏者，件件皆合天情，真真得天父天兄及尔二兄之心也。”得以搪塞过去。

第三次当殿激辩，是关于君主主要不要节约的问题。大概在杖责天王事件前，可能杨秀清就向天王奏陈过天京绸帛不足，应当减少宫中王后们缝制新龙袍；所以，在这次金龙殿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天王洪秀全主动提出：“前日胞等具本启奏，言现下天父赐得绸帛不甚过多，不知胞等袍服足用否？如不足用，尔二兄宫中袍服既是，发出些与胞等共穿也。”杨秀清回答天王的好意说：“小弟等既蒙天父及二兄鸿恩赐得亦有，请二兄不用发出了。”

天王洪秀全说：“现今绸帛不多，而尔二兄的袍服已足，暂时不用缝制新袍了。”可是韦昌辉又插话阿谀道：“二兄为天下万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也要时时缝来。”

“求二兄赦小弟之罪，容小弟直言启奏明陈，”杨秀清忍耐不住胸中的忿恚，直接驳斥韦昌辉的谬论道：“袍是不足方要多，现在二兄袍服既已充足，缓些再缝，方见二兄节用爱民之德。韦正弟为什么还要启奏时时缝来呢？”洪秀全赞道：“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鲠之臣。正胞，尔虽是爱兄之心切，终不若清胞直言无隐更为可嘉也。”

这里洪秀全虽然赞扬杨秀清的“直言”，但都把韦昌辉的险恶用心视为爱他“心切”，这就隐伏了三年后天京事变韦昌辉大挥杀刀的祸患。这一点，洪秀全反而不如曾国藩，曾国藩在天京事变前二年编成的一本内部书籍（《贼情汇纂》）“伪又副军师北王韦昌辉”条中，即明确地指出：“昌辉位下杨贼一等，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可惜洪秀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致为韦昌辉所乘。

#### 四、“杖责天王”事件留下的思考

发生在143年前农民领袖间的这一喜剧，不但形式上令人新奇。内容上也发人深思。

1. 首先是君王有没有错误？三巨头有三种说法。杨秀清说天王有“过错”，天王自己先说“有错”但后来改口仅承认“有差”，而韦昌辉则说天王没有任何“差”，最后杨秀清用大家都“错”才解决了这个争论，避免了当时决裂。

2. 关于君与臣和上与下的关系，是这次争论的主题。杨秀清反对君对臣和上对下无礼，反复阐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反对君王自以为是，提出“至若为君者有不明之处，君则诏臣参议议定，诏准始行；臣有不明之处，臣则启奏请训于君，君则降旨施行。如北方合君臣之道。”

杨秀清同时又为天朝官员中出现的傲慢风气，而告诫那些不许下级说话的高官说：“尔等为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禀，或是或非，且随他直禀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见他有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致他心无定见、常多惊恐；即有错处，亦须待他言毕，悠然教导。”

他又对下面的小官说：“尔等为官，凡尊者不合，尔为卑者要直禀不妨，即使本军师有错，尔等亦要直禀奏也。”

这些话都反映君与臣和上与下关系的极不正常。

3. 杨秀清指责天王在宫中任意踢打、处死人的行为。

先对踢打怀孕后妃的行为，批评说：“二兄务必从宽教导，不可用靴头击踢，若用靴头击踢，恐娘娘身有喜事者，致误天父好生；且娘娘或身有喜事者，须开恩

免其服事，另择一宫闱，准其休息，但使早晚朝见亦可。如此处待，方为合体。倘此娘娘仍有小过，触怒我主，亦当免其杖责，严加教导，使勿再犯使得。即使忤旨大罪，亦必待其分娩生后乃可治罪也。”

对天王任意杀人提出批评说：“其犯人固属死有余辜，但恐其中有些不明不白之冤，若遽杀之，未免有误。小弟大胆，凡属男官女官有犯死罪之人，恳求二兄格外开恩，交付弟等细心严查，究其所以得罪之原由。若遇情有可恕者，即恳二兄开恩赦；若实犯死罪至极，无可宽容者，启奏二兄御照处决。如此庶无不白之冤。”他还要求：“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她无惊恐之心。”

4. 关于大兴土木用妇女和老人加紧修造宫殿的问题

当时太平天国“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杨秀清等“前奉二兄诏旨，命招木工泥工起盖天朝宫殿，迄今多日，未能奉行，弟等罪实有余。今蒙天父开恩，殿右四检虽张朝爵，由安徽解回各项匠作兄弟……”

由于要求紧迫，洪秀全亲自“御日常注，督其操作”，而且“女官操作其事”，下雨下雪天也不停止，引起杖责事件的杨、石、朱等四女官要求调出天王府概是与此事有关。

因此，杨秀清在金龙殿上并非单为四女官说情，而是为更多的“修整宫殿，挖地筑城，或打禁苑”的千百妇女说话，直接了当地提出：“譬如凿池筑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毋用紧挖。”按：杨秀清说这话的时间，已是初冬十一月下旬，任何有心人看到妇女们在这寒冷的雨雪泥泞中辛苦劳作，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5. 关于节约问题，也是在杖责事件中杨秀清所关注的问题，两次提到“物力维艰”、“节用而爱民”，要求将节约作为“可至万万世，慈父教其子、忠臣谏其君之法也。”还为了君主要不要节约问题，在金龙殿上与韦昌辉发生激烈争论。

6. 关于培养接班人“幼主”，也是这次杖责事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先后四处提及：“使其炼得正正，为天下万国楷模，使天下万国皆为法则。”“使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总要合乎准则，不可任其心意所向。”“务要其体念物力维艰，为天下法则。”“今后幼主，也要效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才是尽到为君之道。”“惟愿万世之主，自幼主始，皆如我二兄纳谏如流之英主，则千万世受天之佑矣。”

虽然洪秀全开始时只承认“有差”但不承认有“过错”；而且开始时虽然表示愿意受杖，但又含蓄地说气话：“从前尔二兄封天之时，妖魔侵上天庭，天父还容得过他，命我暂且容他，他眼便罢。”这里明显有把杨秀清暗指妖魔之意。但很快他就冷静并醒悟过来，他离不开杨秀清和杨秀清的“天父”权威。

细看洪秀全在事件中的情绪变化，是在他听杨秀清讲到对幼主教育：“使我二兄教导幼主，幼主以至万万世……”，使洪秀全看出杨秀清的杖责谏诤是为了他洪家的天下，并无恶意，洪秀全才欣然说：“兄今日之听清胞所奏，真是言言金玉，字字珠玑，诚为启朕心沃朕心之良弟良臣也。”此时天王“极为欣慰欢喜”，当即传旨金龙殿设御宴“恩赐东王”，这是入城九个月唯一的一次君臣同饮，可见洪秀全的喜悦之情。

轰动一时的杖责天王事件，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新的团结的喜剧形式结束。

从思想作风的转变，引出了政策上的顺利调整。在“杖责事件”以后的九个月中，先后由杨秀清提出（有的借用“天父下凡”），天王洪秀全批准，政策作出几项重大改变：废除了“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的禁令，停止印发西洋基督《圣经》的《旧约》和《新约》，停止执行“物物归上主”的空想《天朝田亩制度》并改行“交粮纳税法”，发行货币并恢复关了门的工商业，最后宣布废除最不得人心的男女分居制，允许臣民成家立业。

军事上恢复了北伐军全军覆没以后的颓势，在西线击溃了已经攻到天京门户九江的曾国藩军，收复湖北省会武汉，稳定住天京上游岌岌可危的形势；在杖责事件发生后两年半的丙辰六年五月，又在天京取得大破敌军江南大营和天京解围的胜利，再一次把革命推向高潮。

可是由于历史局限性，腐化这一痼疾，尤其是农民运动的腐化，并不是什么“天父下凡”可以制止的住的，天朝大兴土木之风并未彻底制止住，铺张浪费的风气继续蔓延，仍在腐蚀着太平天国的根基。

天京事变和杨秀清死亡以后，天朝腐化之风变本加厉，单是“王”即封了二千七百多个，遂有“王爷遍地走，百姓泪常流”的民谣。腐化盛行，促使瓦解的速度加快，天王在天京坐享天福的十一个年头即因目睹大势已去而自尽“升天”，他一手经营的辉煌宫殿，随着他死后一个半月天京沦陷的大火，而“十年壮丽天府，化作荒蒿野鸽飞”了。

（责任编辑 徐 鲁）

# 感慨的余音

——读孙犁同志的一则随笔以后

● 李冰封

1995年5月22日《天津日报》的《文艺评论》专刊，刊有著名作家孙犁同志《理书续记》一文，其中有一节，对近年的文化、教育、出版状况，颇多感慨，录之如下：

《爱晚庐随笔》近人张舜徽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湖南出版局李冰封君赠，余为之书一条幅，以此为报也。此书印数七百五十，而仍有余书，可为赠品，可叹也。

余放置案头，已有半年，时常翻阅，认为很有价值。书分：学林胜录，艺苑丛话两部分，均为笔记性质，内容广泛，经史文艺，无所不包，尤于近代史料详。所记充实有据，为晚清以来，笔记所少有，而书之命运，竟不入时如此。非著作之过，乃社会、文化风气之过也。

旧称士、农、工、商，当然社会有分工，不能人人都去读书，那样将无衣无食，没法生活。然社会也总得有人读书，而读书也总得有个实际要求。现在讲发展教育，讲尊师重教，讲尊重人材。而课堂，出版，已成买空卖空之势，纸张都用来印了无用有害之书，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书，竟卖不出去，这里面的道理，实在难以说清了。

余孤陋，不知张氏学历、生平，询之在大学教书之姚大业君，得知为历史学家。从其自序中，知有著作多种，然姚君亦不能告知其详也。

(1995年4月4日上午)

可以看出，这则随笔针砭时弊，入木三分，感时伤世，忧心如焚。但孙犁同志毕竟不是出版圈中人士，对于某些出版内情，还不甚明瞭，看法不免失之于忠厚。我作为《爱晚庐随笔》一书出版过程的知情者，愿补充我所知道的情况如下：

一本只印了七百五十册“很有价值”的著作，能赶在张舜徽教授生前出版（张老歿于1992年），使张老能亲见自己数十年辛勤耕耘的学术成果，公之于世，这自然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做成这好事的最主要原因还

在于：在著作出版过程中，遇到了两位爱书、懂书、忠于职守，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出版事业的编辑人员。否则，很可能原稿现在都还压在什么地方，与蠹虫衣鱼为伴，而不见天日。大约早在1987年，张舜徽教授即托岳麓书社编审杨坚兄为此书找个合适的出版单位。杨坚兄对工作极端负责。他与张老由于工作上的往来，相知甚深，并极钦佩张老淡泊名利，数十年来孜孜不倦钻研学术的精神，且钦佩他学风严谨、功力深厚。1988年，他找到了湖南教育出版社副编审彭润琪兄，彭当时又是主管编务的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工作也极端负责。两人说得投合，当年即报选题，通过后，彭并决定自任责任编辑。此书错字甚少，与彭自任责任编辑有关。1990年，开始在全国征订。当时，这类学术书籍，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征订，一般征订数均只有一两百册（现在则更少了。有时，征订数为零）。那时，彭手中还有点权力，遂决定加印一些由出版社发行部门自行出售，于是，乃有七百五十本的印数。假如出版社不能加印，这书即使编好了，也还是印不出来的。此其一。

其二，那时，在某些出版单位，还没有普遍弄什么编辑人员的“个人经济承包”，也还没有把全社利润指标，普遍分解、落实到出版社的每个人员（即，规定每人每年要上交若干利润，否则，你的书编得再好，出得再好，也不算完成任务）。出版社本来是一个整体，是用企业方法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整个出版社当然是要赚钱的，有钱才有力量去出好书，也才能使全社工作人员生活安定，安心工作，一心一意去钻研业务，出好书。缺乏经济力量，出版社工作是弄不好的，其理至明。在目前情况下，出较有价值的严肃的学术著作，一般都要赔钱。赔钱只能由整个出版社去赔，即过去多年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以盈补亏”。不能指望出版社的每一本书都要赚钱，更不能指望每本书出第一版就要赚钱。把全社经济效益分解到每个编辑人员后，即使有的编辑人员想出好书，也就出不了。比如，出《爱晚庐随笔》这样有四十万字、近六百页、二十个印张的厚书，



只印七百五十本，按当时书价，即须赔三万元左右（现在，则远不只此数），当时若实行了“利润落实到人”或“个人经济承包”，彭润琪兄即使极想出此书，要他自己从腰包中掏出三万元，去赔去贴，最后还要因个人无力出畅销书，落个“不能完成任务”的不大光彩的名声，那他当然也只好“心有余而力不足”，敬谢不敏了。现在出好书其所以越来越难，甚至可以说钻进了死胡同，其原因颇多（如，发行体制的改革没有弄好；某些出版官员志在当官而不在出书，对出书问题心中无数，甚至“一团漆黑”，且有权在手，又要摆摆威风，遇事瞎指挥；出书的大环境不顺畅，在某些方面卡得奇紧，在某些方面又放得奇松；若干编辑发行人员只志在弄钱，而不求出好书；……等等），而在这众多原因中，“个人经济承包”，又实乃罪魁祸首之一。

写到这里，想插一段与本文貌似无关而实有密切关联的题外话：

几天前，看到香港出版的1995年5月份《镜报月刊》，其中刊载了叶至善（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版协顾问、老出版家）、郭正谊（民进中央常委、研究员）联合署名的文章：《宣扬迷信图书泛滥成灾》。两位作者为作此文，自掏腰包，花了两千元，收集了两百余本“坏书”作为参考。仅今年二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仅在北京的书店和书摊上，就搜集到宣扬封建迷信、看相、算命、看风水等类图书222种，大多数为1994年的正式出版物，其中省人民出版社16家出版36种，大学及科技出版社22家出版49种，文化及其他出版社46家出版137种，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宣扬封建迷信的书籍中有些书印数竟达八至十万册（以某种书印十万册计，那就是张舜徽教授那本“晚清以来少有”的“很有价值”的学术笔记印数的135倍左右），这些书中，还包括了什么《性感相术》、《从面相看女人》、《推背图》、《万法归宗》（讲画符念咒、召神役鬼、隐身害人、拐骗诱奸妇女之法……等）之类超级的文化垃圾和文化毒品。而这些宣扬愚昧和宣传封建迷信的超级垃圾的毒品，还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我国堂堂的最高学府的学术出版机构！孙犁同志说：“……课堂，出版已成买空卖空之势，纸张都用来印了无用有害之书，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书，竟卖不出去……”旨哉斯言！痛哉斯言！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出版队伍（其中当然包括某些大小出版官员）的素质不高固是原因之一，而主要原因还在于前面说到的，弄了什么“编辑个人经济承包”，一承包，承包的出版者，一心只顾个人捞钱，财

迷心窍，什么科学，文化，道德，提高人民素质，提高出版物品位，出版者的自尊、自爱……这一股脑儿的“劳什子”，统统都让它抛到“爪哇国”去了！

文章到这里算是写完了。不过，还要补充两句在某些人听后会感到不舒服的话。那就是：这问题从现在起，如果不下大力气去解决，瞧着吧，等历史老人自己跑出来，对此加以狠狠惩罚的时候，那事情就不那么轻松、好玩了。

但，我总不相信，一个伟大而智慧民族的子孙，能眼睁睁地看着历史对这个民族的无情惩罚。

（1995年6月2日，长沙）

**作者附言：**本文提到的“编辑个人经济承包制”，是指出版社每年给编辑个人若干书号，编辑每年要向出版社交多少钱，其余赚的钱归他自己。这里指的是这一种形式的承包，并不泛指出版部门中的一切承包，比如，出版社向国家财政部门实行经济承包等。这一点，作者认为，特别需要讲清楚，以免有人故意把水搅浑。

## 《新华每日电讯》

### 帮助您认识中国，了解世界！

由新华通讯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报，以新闻报道为主体，信息量大，每日出对开8版，刊登新华社每天播发的国内、国际新闻和图片，堪称“消息总汇”。在现代紧张的生活节奏中，它是您认识中国、了解世界最有效的工具。

《新华每日电讯》，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反映时代面貌，宣传改革开放，追求迅速、准确、翔实和生动，向读者提供丰富的国内外信息。

《新华每日电讯》胶版印刷，精心编排，图文并茂。

《新华每日电讯》国内统一刊号：CN11-0209，邮发代号：1-19；国外代号：D1312；每份定价：0.55元；每月定价：15.50元；全年定价：186.00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随时订阅。地址：中国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

电话：3072032 邮编：100803

# 唐浩明撰写《曾国藩》为曾国藩正名

● 潘 荻

## 《曾国藩》一鸣惊人

近年来,117万字的长篇小说《曾国藩》悄悄进入了我国千家万户。读过这部小说的人士,几乎都向自己的亲友们推荐:“《曾国藩》值得一读”。据国内外报刊报道: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视察长沙时,湖南省委书记也向他赠书、推荐《曾国藩》;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的书店里,《曾国藩》一书被来自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学员抢购一空;中共中央某部一次购买了300套《曾国藩》,分发给参加部办“第三梯队培训班”的学员,作为辅导材料。这部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台湾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的历史小说,在海内外的发行总数已达40万部。台湾当局也史无前例地要求各级官员必须通读《曾国藩》。海峡两岸不仅政界重视此书,文史界也给予较高的评价。有人认为它是“半世纪来一部难得不带阶级偏见、基本上忠于史实、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的真正的历史小说”。香港一家公司决定投资二千万,将《曾国藩》拍摄成40集电视连续剧。作者唐浩明应邀来北京商谈电视剧拍摄计划期间,被几位老乡请去“湖南大酒楼”聚餐。没想到,这家大酒楼的女老板也正在读《曾国藩》,听说书的作者来她的大酒楼吃饭,高兴得连声说:“这是我们酒楼的光荣”。她特地设计制作了一个锦鸡拼盘,用红西红柿条在拼盘上拼写了一句贺词:“《曾国藩》一鸣惊人”,并亲自端着拼盘送到作者席前,表示她的敬意。

## “一代伟人”和“千古罪人”

根据友人推荐,笔者跑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了一套三卷本《曾国藩》。我以最快速度浏览了一遍,果真值得一读,便再次仔细研读一番。我发现这部书,名为“历史小说”,实际上是在真实人物、事件和真实史料基础上,采用传统章回小说形式,运用文学手段进行某些合情合理的情节构思,并以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为特色的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历史人物传记。

几十年来,国内人民只从教科书或权威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得知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汉奸、刽子手”,很少有人认真地去查阅过、研究过、怀疑过前人或今人所加于曾国藩的历史罪名是否公正、

准确。更很少有人敢去思索这个“历史罪人”是否也作过一些有利国家、民族、社会进步的好事。因此这部客观记述这个“历史罪人”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和一生功过的小说《曾国藩》一问世,就象一粒石子投入平粼的湖水中,激起一圈圈涟漪,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这部历史小说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有理性也有感情、有私心也有公德、有原则也有妥协、有理想也很现实的有血有肉、既非圣人也非凡人的曾国藩跃然纸上。

他从湖南湘乡县边远山村荷叶塘的一个耕读之家走出来,三次进京会试,两次失败,28岁中进士、点翰林,踏上仕途,十年七迁,37岁便成为二品内阁大臣。他读圣贤之书、讲经世之学,崇尚孔孟之道,慎独养心,严于律己,志在行仁义于天下。他通过家书谆谆教导子弟要慎独、习劳、勤俭、笃敬、仁民、爱物,保持农家淳朴家风。他在回原籍奔母丧、丁忧期间,奉命出山,以文弱书生统帅湘军十万,追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两次因战事失败而愧疚投江自尽被救。他网罗各方人才,引进西方技术,在安庆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生产子弹火药的军工厂;又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机器制造工厂(即今江南造船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经过武装湘军,十年苦战,终于攻下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建都称帝的“天京”(即今南京城),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以文官而建军功、获殊荣,升官进爵,封侯拜相,位极人臣,却仍不忘初衷,始终坚持廉洁洁身。他经手饷银千千万,分毫不沾。他自杀(未遂)前写给父亲的遗书中特别请父亲放心:他留下给父亲养老、给儿子娶亲的800两银子,全部是他积攒的俸银,无一两贪污公款。他一生生活俭朴,节衣缩食,粗茶淡饭,封侯拜相之后,他的床上仍是那打着补丁的农村机织布蚊帐、被褥;一日三餐(即使是留客吃饭)仍然是几碟普通小菜,要喝酒还得临时上街去零沽。他奉命前往天津处理“教案”(市民听信有关教堂的谣言,火烧法国领事馆,打死领事、教堂修女和来华旅游的无辜洋人20人),经调查事因,惩办杀人凶手,向法国赔款道歉,妥善平息了事态,避免了一场当时无力应付的战争,被朝野一些不满人士咒骂为“汉奸”、“卖国贼”。他恨洋人,却看重洋人

的技术，决心“师西夷富强之术”以自强；如大力倡导西学，除办工厂、建翻译馆、大量翻译印发西方科技书籍之外，还第一个提出并派遣少年幼童留学生赴美国学先进科技知识，被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业”。

62岁那年，曾国藩为清王朝鞠躬尽瘁，病逝于总督府。他带着他的殊荣、也带着他的许多遗憾被送回湖南安葬。无论生前死后，世人对曾国藩一生是非功过的评价：誉之者褒为“一代伟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毁之者贬为“千古罪人”、“汉奸、卖国贼、刽子手”。

## 作者身世之谜

读完《曾国藩》三卷的最后一页，我掩卷而不愿释手。是谁有幸掌握如此丰富的史料？是谁有如此高妙的驾驭文字史料的才能？是谁有如此胆识直闯禁区？我不禁翻到扉页，想看看作者的简历。可是只有一张穿西服的中年人的半身照片，下面签名是“唐浩明”。唐浩明是何许人？大陆的还是台湾的？为什么不向读者作一个简介？给读者留下了一个谜？

笔者认为：能写出《曾国藩》这样一部兼有历史知识、社会知识、文学知识、又有独到见解和较高思想境界，而且笔墨厚重的传记文学者，定非一般作家。因此我很想认识这位作者，了解他的创作过程。从北京文艺界朋友中打听不到唐浩明，我便根据该书扉页所印作者手稿上的“岳麓书社”这个线索，请长沙的朋友代为寻觅。果然很快就有了消息：唐浩明是长沙岳麓书社的一位编审。我当即与他通了话，祝贺他的创作成功，并约定他来北京时去访问他。今年五月，唐浩明应某公司邀请来京商谈拍摄电视连续剧事宜。趁此机会，我在他下榻的饭店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采访。

唐浩明是湖南衡阳人，已过不惑之年，中等身材，精干、开朗。他的名片上印有两个名字：“邓云生、唐浩明”。前者是他上学以来个人历史档案中和身份证上的名字，后者则是《曾国藩》出版后才为人知的他的原名。这两个名字概括了一段历史悲剧，也说明了作者不同一般的身世。

1949年5月，蒋介石秘书唐振楚和妻子匆匆追随蒋氏撤退去台湾时，来不及将他们临时寄养在衡阳乡下家中的三个小儿女带走，从此骨肉离散。当时孩子们都很小，伯父便担负起七岁男孩和五岁女孩的抚养责任，而将刚刚两岁半、还嗷嗷待哺的最小男孩唐浩明送给了衡阳城里一个无子女的理发师抚养，改名邓云生。从此，唐浩明作为普通劳动人民的儿子，避免了“黑五

类”子女的恶运，一帆风顺地读完了小学、中学、还考上了华东水利学院，毕业后成为水利技术员。但他从小喜欢文学，一直梦想当作家。1979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他便又考取了华中师大古典文学研究生，三年后毕业，分配到长沙为整理古籍而成立的岳麓书社，负责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

1978年，组织上忽然找唐浩明谈话，正式通知他：“你的亲生父母还健在台湾。父亲唐振楚现在是蒋经国的内阁成员”。这使唐浩明大吃一惊。一个理发师的儿子，怎么一下变成了国民党的“高干子弟”？他谨慎地没有流露自己复杂的感情，一如既往地赡养孝敬自己的养父母，仍然继续努力实现自己对学业和事业的追求。后来他进一步了解到他的生父唐振楚的情况：他是湖南衡阳县一农家子弟，从小苦读求学，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以德才兼备而受到蒋介石的器重，步步高升，当过县长、蒋介石的秘书、总统府第一局局长兼典玺官（掌管国玺）、总统府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1978年进入蒋经国的内阁，任考选部长。退休后，仍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唐振楚夫妇在台湾无比思念留在大陆的子女，经过多年来的多方努力，终于打听到了三个子女的情况：除女儿幼年病逝外，两个儿子在不同生活环境中健康成长，而且都成家立业，学有所成。特别是1979年中国新闻社播发了“国民党阁员唐振楚的两位公子唐翼明、唐浩明双双被录取武汉大学和华中师大研究生”的消息，更令他们感到欣慰。他们多年来渴望骨肉重逢，却又怕影响儿子的安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海峡两岸关系解冻并日渐改善，大儿子唐翼明因没有离开唐家，所以早就通过关系与父母见面了。唐浩明则直到1985年才被批准去香港与离散36年的母亲和父亲先后见面。1993年台湾故宫博物院邀请唐浩明去台讲学，他才得以与父母兄妹在台团聚，这一家庭的历史悲剧终于幸运地有了喜剧的结局。

## 圆了多年作家梦

唐浩明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文学，曾经立志要做一个文学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高中毕业后报考了理工科，学了五年水利专业，又干了九年水利技术员，但他心中仍一直做着作家梦。1979年他报考华中师大古典文学研究生，就是受到这个“梦”的驱使。长期来，他崇拜作家，认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历代的伟大作家总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塑造人类真善美的典型，使读者受到教育、启迪、产生美好的感情和追求真善美

的愿望。同时，他们的正义之笔深刻揭露、抨击所处时代、社会中的偏见、自私、丑恶和庸俗，向世人敲响警钟：抵制罪恶，防止堕落。因此，唐浩明认为：创作是神圣的职业，必须具有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思想文化修养，才能诞生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决不是会编故事、能写文章、会神侃的人就可以当作家的。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实现自己的作家梦进行思想文化修养的准备。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他更是如饥似渴地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要求自己把握住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专业到理论都能打下扎实的基础。后来，他又驰骋于上千万字的曾国藩文稿史料之中，看到了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代，听到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心声，心灵受到了震动，终于写出了《曾国藩》这部被认为是“历史小说创作上的一大突破”的处女作。

唐浩明作为《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花费了十年功夫埋头于那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耐心地啃读着那些远离现实、枯燥乏味的文稿史料、包括曾国藩的日记、家书、公文、奏折和诗文等，成为掌握曾国藩第一手原始资料最丰富最全面的学者。他发现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不应该简单地全盘否定。在这种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他萌生了要用小说形式客观介绍这位一代历史名臣不平凡一生的创作冲动。他认为，如果只是根据真实史料编写一部介绍曾国藩生平功过、得失的人物评传，虽然比较省力，但其人物和历史背景都是平面的，没有生命，必然平淡无奇，缺少感染力和震撼力。因此他决定采用文学手段，尝试以真实史料记载为框架，通过某些情节、细节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升华，使其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趋于立体化。经过充分的思想酝酿和精心构思，唐浩明一旦动笔，便全身心投入创作。他充分发挥自己驾驭史料、文字的才能和各种优势，力求形象生动地展现风云激荡的历史面貌，刻画置身于复杂、多维历史生活中的人物性格和命运。经过五年的努力，这部从崭新角度描写曾国藩宦海生涯，受到海峡两岸政界、学界推重和好评的历史小说诞生了。唐浩明刚过不惑之年，便以较高的起点圆了自己的作家梦，而且啼声初试，一鸣惊人。

## 着眼于历史的广角度

在《曾国藩》这部历史小说中，唐浩明不是从既定观念出发，而是以历史的广角镜来代替狭隘的阶级偏见，对曾国藩这个早已被定性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汉奸刽子手”、至今还受到舆论谴责的“历史罪人”，敢于进行客观、公正的深刻描述，既写了他作为湘军统帅为镇压农民起义不惜滥杀无辜、为正军纪而

蓄意借头祭刀，为避嫌疑而无辜屠杀降将的残酷和狠毒；也写了他作为治国贤臣的励精图治、廉洁洁身、知人善用和远见卓识，这不仅表现了作者的勇气和魄力，更显示了一个正直作家的理性、良知、是非观和责任感。

唐浩明曾经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一篇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一些理论刊物上，如石破天惊，引起文史界的震动。其《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一文指出：“汉奸、卖国贼必是投降外族和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而从唐代就列入了中国版图的满族，从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过去为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而偏狭地认为凡是为满清王朝出谋献策、奔走效力者都属汉奸之列的论调，显然是幼稚、片面、偏激的。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如同历史上岳飞镇压杨么起义、卢象升镇压李自成起义一样，只能从他们朝廷命官的职责和他们忠君敬上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去找原因。说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是刽子手则可，说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是汉奸卖国贼则不可”。如此观点鲜明地公开地为曾国藩罪名辩解，唐浩明可能是建国以来第一人。此外，唐浩明还在其他论文（如《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因》、《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和知人善用》等）中，详细阐述了饱学士曾国藩包纳百川、融汇贯通的治学态度和学以致用、修身养性的精神；高度评价了曾国藩的人才观和知人善用、礼遇贤士，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政治家胸怀。

唐浩明正是通过深入研究，把握了曾国藩最本质的东西——学识、人格、灵魂，得以为其小说构思立定了基调。因此，他写《曾国藩》不是简单地为曾国藩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历史谴责辩护，而是要写出这个复杂人物最本质的生命活动——包括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但由于他的所有政治言行都受其道德观念的影响，因此，一方面他刻意追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志，一方面他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又不断扼杀着他的种种抱负。那么，曾国藩的本质是善还是恶呢？他对近代中国的文明进步是有功还是有功过呢？小说提出了问题，却并不急于寻求某种结论。

历史小说《曾国藩》使读者了解了一个历史人物，也了解了一段历史。有读者认为它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是“从政必读的教科书”，是“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反省”；也有读者认为：《曾国藩》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文学敢于突破狭隘的阶级偏见，自觉走向理性、良知和责任的新里程碑。”

# 热心引入西方文化的清末巡抚徐继畲

● 任复兴

## 西半球最引人注目的汉字古碑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心地带，以国会大厦、林肯纪念馆、杰弗逊纪念馆和白宫4个重要建筑物为中心，构成了一个东西长约4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的十字。在这个十字的交叉点上，耸立着一座全用纯白大理石建筑的高555英尺有余、犹如利剑的四棱尖塔，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纪念碑。

华盛顿纪念碑从1848年奠基，费时36年，至1884年才完工，成了美国首都的独特标志。美国人把它列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纪念碑内壁砌的是当年世界各国及本国各州赠送的190方铁铸文及石刻。在塔的第十层的西壁上，嵌着一方十分奇特的花岗岩石碑。此碑周边刻有僧侣、龙、斗士及精致花纹，碑文用东方特有的方块汉字写成，全文是：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兢兢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竿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合众国传教士识”

咸丰三年是公元1853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唐人街上，汉字招牌之类比比皆是，但是年代这么久远、占据这么显著位置、具有这么重大意义的汉字载体，大概再没有超过此碑的了。

碑文中提到的徐继畲（1795—1873），号松龛，山西五台人，徐向前元帅之族高祖，历任御使、道员、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等职。廉洁奉公，直言敢谏，坚决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入侵，道光帝倚为长城，奉派开放厦门、福州两口。他向来华的美国传教士

雅裨理、英国领事李太郭、阿礼国等请教，五阅寒暑，数十易稿，于1848年出版10卷本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他突破根深蒂固的以中国为天朝上国和天下唯一文明中心的华夷观念，介绍了多元文化的世界及欧美先进政治经济文化。此书以图为纲领，先叙地球概貌，后叙四大洲各国。每洲又先有总叙，后有分叙，对各国的疆域形势、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典章制度、兵力强弱、兼并征战、海外扩展以及与中国的交往等，叙述有详有略，常有按语表示自己独特见解。前引碑文两段按语的第一段，在1844年初稿中已写就，在孙中山出生之前22年已提出西方共和制符合中国“天下为公”的古道。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龙夫威对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深入研究，结论是《瀛环志略》“在探索西方强国的本质以及剖析中国在上世界上悲惨的沉沦方面，均超出了客观的地理学范畴”。“徐继畲揭示出，地球上的文化和文明是多元的。”“一部分中国之外的国家，通过历史的和附庸的关系，接受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成分；而另一部分国家则是植根于非中国的（即印度的、穆斯林的、欧美的）文明。”徐书还提出了以近代化为主旋律的经世主张：“自强；官商合作；务实的外交；参考令人羡慕的彼得大帝计划，引进有用知识。除介绍地理学基本知识外，徐书提供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实情。”“当中国开始从西方得到灵感的近代化时，文化交流则是主要源泉。徐继畲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充当了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

## 东方的伽利略

道光末咸丰初，接连发生广州反入城、福州神光寺事件，清朝君臣企图改变鸦片战争后形成的中外关系格局，恢复其“天朝上国”的威仪，这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曲。

清代最昏庸的咸丰帝继位后，起用道光朝后期失宠的林则徐作为一张硬牌。在福州养病的林氏闻讯即抓住英国两名传教士租赁神光寺屋之事向徐发难。1850

年10月徐写家信诉说苦衷说：“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细微，系侯官县兴令一时疏忽，误与用印，从容劝谕，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既出绅士致夷人公启，又写生童告白，遍城张贴，声势汹汹，几致酿成大事……林少翁又欲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办理防堵。弟与玉坡制军以为英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和其说。愈得罪林少翁，寄信京中，奏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初参弟为抚谕无方，后又参弟为袒护属员，徇庇奸奸……不意群小于言路宏开之际，吠影吠声，轰然交作。”

玉坡制军即闽浙总督刘韵珂。当年林则徐革职后，刘氏曾冒险奏请准予林“戴罪自赎”。此次刘氏坚决站在徐氏一边，愤而乞疾，旋被开缺。言者还对《瀛环志略》断章取义，“摘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隐西方二字劾先生，欲中以奇祸。”徐氏后来的尺牍中也说《瀛环志略》“甫经付梓，即腾谤议。”

不久，林氏死于赴广西镇压太平军途中，徐氏依例向朝廷报告了林的死讯，旋被内贬为太仆寺少卿，即副弼马温一类的闲官。咸丰帝召见他时，“询及林则徐为人，先生对以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文宗以足顿地，叹息者再。”不过，倒车已隆隆后退，强硬派已盘根错节。不久徐氏再被弹劾，罢职归里，过着授徒糊口的清贫生活。《瀛环志略》随之不复流传。而日本则一再翻刻此书，大有助于其维新。徐继畲企图跨越东西文化的鸿沟，向国人阐明西方文明的现状，系统提出处理中国与新的、突然出现的世界秩序的关系的相当务实的、可行的观点，而受到守旧派的迫害。当时的外国报纸即把他称为东方的伽利略。

1865年，年过七旬的徐继畲被召回北京，深得奕訢等倚重，成为同治中兴即自强运动重要政策的总部署。奏准重印《瀛环志略》，作为同文馆教科书。徐氏目睹日本大胆借鉴西方文明以自强，在奕訢等支持下，决心抓住中外关系的相对平静期，通过提高同文馆招生的档次数量，在短短三四年内培养出一大批学兼中西的三四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以应时艰。此项重大决策立遭大学士倭仁等反对。倭仁从夷夏大防立论挑起同文馆事件，奏阻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慈禧出于巩固个人权力的考虑，偏袒了倭仁，徐氏等雄心勃勃的



华盛顿纪念碑

同文馆计划以凄惨的失败而告终。中国的近代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徐氏自悼衰老，回天无力，于1869年乞骸骨归里，4年后郁郁而死。

中国不自振作，连遭惨败。改良、革命呼声大倡。康有为、梁启超都记述自己是从《瀛环志略》受到最初的西学启蒙。清末10多年《瀛环志略》一版再版，读书人“家置一编”，就连慈禧太后辛丑回京后，也手持此书，“展诵不辍，意谓可窥外人情事”。革命派则从西方的共和制及华盛顿的事迹受到极大鼓舞。民初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写道：“余年十六岁时，得五台徐松龛先生《瀛环志略》，读至华盛顿故事，辄为心醉，自付民主政体安得及吾身而亲见之。”

但是，此后数十年，徐继畲并未受到应有尊重，相反，因与被推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意见相左等原因，长期戴着“投降派”等帽子。已故山西大学郝树侯教授在徐继畲研究会1990年成立会上说：“第一，徐松龛是直臣，直言敢谏；第二，他是时代的先觉；第三，他和





纪念塔内的汉字碑文

林则徐的矛盾，两个争执的问题很扯淡，现在看是徐松龛对。60年代初，侯外庐在山西大学开座谈会。学校中国史教研组提出徐松龛与林则徐的关系，意见左，定不了，请教侯外庐。侯说：“他两个差不多吧？我们那时候连这个结论都不敢做。你要说徐松龛好，等于你附和了汉奸。这种气氛已有多年历史。从民国十三年起，就搞六三销烟纪念，说是爱国的，这才衬得把松龛先生没人敢提了。”

1848年7月4日，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开始向各国及美国内各州征集纪念物。有关宁波府赠碑详情的历史资料尚待发掘，但在华美国传教士至迟在1851年已知建塔的计划。从1843年起美国至宁波传教的先后有浸礼会医生玛高温、长老会医生麦加缔及宣教士丁韪良等。此时的宁波知府是毕永绍。徐继畲早已被罢职回归五台故里。如果没有美国传教士们的积极活动，宁波府不可能主动馈赠此碑。因此可以说是这是借花献佛，这也充分说明西方文化在当时中国沿海口岸的影响。

徐继畲同治朝复出后，诸国元首、使节甚礼遇之。林肯遇刺后接任的约翰逊总统，向其赠送华盛顿像，并在1867年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了赠送仪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致辞中说：“在将近20年前，你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国界之外各国历史地理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倾注了你大量的劳动，正确的判断，以及你们

国家了不起的学问……你通过考察你记载的各个国家的伟大人物，从而把华盛顿置于其他一切伟人之首……这些话，已经被充满感激之情的华盛顿的国民们所翻译和引用。为了表达他们的谢忱，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的艺术师，制作了这幅画像……今天，我以美利坚合众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带着一切美好的祝愿，赠送这幅画像。殷切地希望，今后你和你的同胞，在看到这件有价值的纪念品的时候，永远能够回忆起美国人民对你们国家的永久的友谊，以及对你的热爱和尊敬。”

在赠像仪式上担任译员的是丁韪良，其时他是徐继畲领导的同文馆的外籍教员。纽约时报1868年3月29日第4版以《美国在中国之影响》为题突出报道了此事，第10版全文登载了蒲安臣的致词和徐继畲的答辞。徐氏答辞的中文原稿已佚，从英文回译的大意是：“在向我赠送贵国创始人华盛顿画像的场合，你对我的高度赞扬，使我深感其实难副。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这件精美的赠品的时候，华盛顿仿佛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一时难以言表。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 东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人物

从美国的排斥华工法令为开端，后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许多不幸。帝国主义，也决不是中国史学家的虚构。但是在现代交通信息工具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时代，如何理性地处理好东西方国家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这是对人类创造力的检验。如同当年徐继畲出于对其民族及文化的高度忠诚大胆地如实陈述外部世界而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一样，100多年后，许多有爱国热忱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也成了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尽管如此，费正清仍指导着研究生对中国近代史包括中美关系进行严肃研究。他向学生们指出，一些值得注意和能引起兴趣的问题，与徐继畲的轶事密切相关。美国人感到，如同与当时和后世的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中国人一样，和徐继畲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的高足龙夫威，经过长期潜心研究，于1975年出版了关于徐在中西方之间进行理性对话的生平与贡献的英文专著《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在他研究徐的时候，美国的越南政策，招致了20世纪降临在美国人民头上的最大灾难。过时的思想，有缺陷的政策，造成



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这好似鸦片战争后中国经验教训的折射。“现在，已经是美国转而面对它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局限性的时候了。”而徐为了中国在这个复合的、多民族的世界上的生存，促进和解、妥协、了解，以及彼此融洽，所采用的中庸之道，很值得研究保留和弘扬。

在龙快要完成其课题之前，中美和解的进程开始了。其时中国大陆仍处在“文革”的浩劫中，学术研究无从谈起。1969年3月21日台湾中央日报刊载宁波陈如一《华盛顿纪念塔中文碑》一文。去台著名人士、徐继畲同里后学方闻收集徐继畲资料长达半个多世纪，1982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

1978年以后，在中国大陆首先把徐继畲列为课题并指导其研究生进行研究的是已故华东师大陈旭麓教授。美国及台湾省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引起大陆学者重视。在徐向前、薄一波等革命老前辈鼎力支持下，徐继畲学术研究会山西忻州成立，后来成为炎黄文化研究会团体会员。1989年，肺部患病的徐向前元帅，得知北京图书馆有美国龙夫威博士著的英文版《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后，曾派秘书借出阅读。同年11月他听取了北方交大徐士瑚教授关于徐继畲研究的汇报，十分高兴地拿着有关出版物与之合影。徐帅照像时笑得十分亲切自然。1990年9月1日徐帅去世后，跟随他多年的秘书郭春福少将深情地追忆说，这张照片，是徐帅最后几年里最为理想的一张照片。

## 聚讼纷纭说碑文

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时代之间人的沟通，有时甚至比人与动物之间还困难。

早期对徐继畲关于华盛顿的文字进行评论的，有前述1863年3月29日纽约时报评论《美国在中国之影响》。该文对“因称颂我们伟大的首任总统而遭到放逐”、“重蹈伽利略的覆辙”的徐继畲，表示了许多同情和赞扬。同时指出：“对于华盛顿来说，无论是把他置于多年以前的杰出人物曹刘之上，还是如蒲安臣引述的，‘他复活了放射光明达4000年的三代的清澈德行’，都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人对此碑的评论，就笔者所知最早见于梁启超1903年的《新大陆游记》。他这时已逐渐放弃了破坏与革命的排满主义，到北美目的是为组织保皇会在华侨中奔波。匆忙之中，连碑文的由来及文义都未明了，就率尔述评：“当华盛顿纪功华表构造时，徵石于万国，五洲土物，鸠集备矣。各国赠石，皆系以铭，用其国文

泐之，以颂美国国父之功德。吾中国亦有一石焉，当时使馆所饬，道员某为题词。其文乃用《瀛环志略》所论载，谓华盛顿视陈胜吴广，有过之无不及云。呜呼！此石终不可磨，此耻终不可湔，见之气结！”（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十册第483页）

西北师范大学吴廷桢教授认为，徐继畲“常常立足于原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应用传统的价值标准去观察、认识和评论外部世界。他说‘华盛顿，异人也（中略）三代之遗意’。这种比喻，可称为不伦不类。”

湖北大学冯天瑜教授则认为：“徐继畲在19世纪40年代就称赏华盛顿及其所实行的民主共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称赏之词恰恰是将近代西方比拟为中国三代，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比拟为中华元典（如《礼记》）所早已阐发的‘禅让’、‘天下为公’等古道。徐继畲开辟了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附会中国‘三代之治’的先河。继徐氏之后，改良派思想家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类似的运思方式。”

去台湾著名人士张其成认为，“松龛先生当清朝专制之时代，独能远识美国开国政治，符于孔子天下为公之遗意，创为推举之法，公器付之公论，实为中国首先倡导民主政治的人物。其后，孙中山先生革命，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而溯其渊源，当以松龛先生之议论为称首，此则《瀛环志略》一书最早亦最大之贡献也。”

去台湾的原平赵正楷、南安陈存恭两先生，节衣缩食，分别资助数万元支持徐继畲研究。1991年，遵照两先生嘱托，笔者雇人重修在徐帅故里五台永安村的徐继畲墓。此墓文革中被掘，墓室石头、棺木等均取出修了水渠之类。后人只好将夫妇俩完整的骸骨分别用棺中故衣包好就地掩埋。笔者以沉重心情整理这位先哲的骸骨、发辫及清代二品官补服时，浓烈的气味扑面而来，好象在提示人们逝去的年代并不久远。然而，中华大地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旧有的典章文物，多数只能到图书馆和博物馆去寻找。假如古人有知，他们将认不出这就是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种变革，无不以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为起点。但是，如何写出一部与冷战结束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相衔接的东西文化交流史，如何写出一部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活生生现实相衔接的中国近代史，依然是有待完成的重大课题。如何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推进改革开放，维护民族的独立与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进步，是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作者任复兴，山西省忻州日报主任记者，徐继畲学术研究会秘书长。）

# 辜鸿铭：清末民初一怪才

● 李宝奇

清末民初，有个学者辜鸿铭，聪明绝顶，才学惊世，贯通中西文化，行为语言怪诞，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并称自己是“旧中国最后一个代表”。因此，被人称为“奇才”、“怪杰”。他的一生闹出许多趣事，又有人送他一个绰号：“辜疯子”！

## 才惊洋人名震西方

辜鸿铭是福建人，生于马来亚槟榔岛，10岁就随义父英国人布朗赴欧洲留学，他攻读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道德哲学、修辞等科目，1877年，以优异成绩考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荣誉学位。尔后，又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学位。20岁以前，他遍游德、法、意、奥诸国，通晓欧洲文化，英文、德文、法文、希腊文、日文、马来语都很好。他的第一个妻子是日本人，因此，他说要刻一个闲章，与康有为的“曾游三十六国”印章比一比，看看谁的棒！

由于他的才学惊世，一些见过辜鸿铭的西方学者说：“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他那小脑袋里，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还多几册呢！”

无论在车站还是在饭店里，只要他一听见洋人用外语批评中国时，他就立即用该国语言尖锐反击，使洋人大吃一惊。有一次，他乘火车，半路上来了几个外国人。他们对辜鸿铭拖着辮子，穿长袍马褂的装束，评头品足，极为不恭。辜鸿铭倒不在意，从怀中掏出一份英文报纸来看，外国人一见，不禁哈哈大笑，并说：“看这白痴，把报纸也拿倒了！”

等外国人笑够了，辜鸿铭平静地用纯正的英语说道：“英文这玩艺实在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看，还真没有意思！”

洋人一听，大惊失色，唯有面面相觑。

入民国后，一位英国汉学家汉姆来访问辜鸿铭。汉姆说，中国有许多政治、哲学的精华，可惜没有好的译者将它译成外国文字。辜鸿铭听了，立即说道：“你哪里知道，早在两百多年前，中国已有四书、五经的英、德、俄、拉丁文的译本了。”汉姆认为是天方夜谭。辜鸿铭说：“你不信吗，我家便藏有好几种手抄的珍贵译本，三天后给你看。辜鸿铭回家后，三日三夜伏案不止，译出了好几种“珍本”。汉姆一见，信以为真。

## 遗老形象的翻译家

1916年，辜鸿铭被聘到北京大学讲授外国文学。

据当时也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回忆：“北大顶古怪的人，恐怕众口一词的推举辜鸿铭了。”他那条又长又细的小辮子，就是遗老象征。外表上不伦不类，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加上头上一撮黄头发编的一条小辮子，冬天穿纹袖马褂，头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即使是清朝，他这一身华装教士式的打扮，也足以在街市上招来许多好奇的眼光了。他的车夫，也不知是他从哪里找来的清朝遗民，和他一样也是扎着小辮子。一主一仆在民国的大街上，两条辮子晃动，或许给了他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在北大讲欧洲文学，却是当时北大旧派人物中的代表，是个矛盾集于一身的人物。

辜鸿铭虽然通晓欧洲文化，还出版了20本书。但他对孔孟儒学、王道政治似乎无缘。可是，当他回国后，30岁时投到张之洞门下做幕僚，一做就是20年，从这时起，他就不自主地在塑造自己这个“怪”形像了。他穷四书五经之义，在故纸堆中找到了他的理想，从此“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使人类涂炭”。于是他向西方传起孔孟之道来。他自号“汉滨读易者”，用英文写了《春秋大义》，把中国的《论语》、《中庸》翻译成外文。他的博学和聪明，使他在西方人那里获得了声誉。当时的德国人曾将他的有关作品译为《怒吼之声》，还组织“辜鸿铭俱乐部”与研究会，以示尊崇。

他的翻译，与同时代的翻译家严复、林纾却不同道。严复、林纾是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推动西学东渐，对中国有一种启蒙作用。辜鸿铭则相反，他将汉文译成外文，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以致辜鸿铭在西方的声誉和影响，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比如在德国，辜鸿铭的著作在书店里随处可见，而且是由德国文化界名流作序介绍给读者的。他在《中国对于欧洲思想的反抗》一书中说，他在上海与外国人评论华人和西人道德标准时，一位英人说，这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衡量。辜鸿铭说，这种“立场哲学”完全是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每个英国人对宗教和道德问题，不但有自己的小小见解和立场，而且不承认世间有正确和错误立场的区别。因此，英国人在中国永远无法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战争的出路》一书中，对中国儒家的礼教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文化较西方高。在欧战期间，他把中国的孔子之道推荐给西方人，认为这是“贤人的宗教”，可以把欧洲从战争困境中拯救出来。他还预言德国必败。事后，果然如其所料。以致大家都佩服他有先见之明。后来，德国教授讲课中，提到中国时总是说：“中国有它自己的文化，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眼光来误解它。”还说：“欧洲人对中国欠下种种血债。当中国人已经掌握高度文化的时代，欧洲还是一些野蛮民族过着聚居生活。”

· 广告 ·

## 内外交往高雅礼品 民间收藏珍稀藏品

### “东方伽利略”东西文化交流的拓荒者 徐继畲诞辰 200 周年金银纪念章

为纪念东方伽利略、东西思想文化交流的拓荒者徐继畲（其业绩详见本期有关文章）诞辰二百周年，徐继畲学术研究会洽请国家造币厂推出三种金银纪念章。一是直径 32 毫米金章，含纯金 1 盎司，成色 0.999，限量 100 枚，序号 00-99；二是直径 60 毫米的银章，含纯银 3.5 盎司，成色同上，限量 1000 枚，序号 000-999；三是直径 32 毫米银章，含纯银 0.5 盎司，成色同上，限量 5000 枚。三种正面均雕徐继畲胸像，背面均刻当地黄河小岛出土的构图美妙的汉瓦当图案内嵌徐继畲 1844 年手书“天下为公”四字。第一、三种章名“徐继畲”均刻徐向前元帅手书，第二种章名“徐继畲先生诞辰二百周年纪念”刻九十二高龄的书画大

## 出口成章的辩才

辜鸿铭虽拥护清王朝，但有时也有微词。当朝重臣、顶头上司，甚至慈禧太后都被他奚落过。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正值慈禧太后万寿节（68 岁生日），官府大肆铺张开宴庆贺，并奉旨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大不以为然，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怎可没有爱民歌？”

梁星海要他编写一首。他略加思索，脱口说道：

天子万年，百姓化钱。

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这反映了他对朝廷的不满。他念毕，满座皆惊。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辜鸿铭送给他一本自己翻译的英文《论语》。伊藤博文取笑说，既然你对西洋学术很有研究，就应该知道在现在的科学时代，能在两千年前通行的孔子的教条，却不能在今天继续有用。辜鸿铭严肃地说：“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像数学家的加减乘除一样。两千年前的数学是三三得九，到了今天也还是三三得九，并没有说三三得八。”

他的这个机械类比还真有用，竟使伊藤博文一时无言以对。

（责任编辑：赵友慈）

师董寿平手书。均刻英文章名。工艺精湛，包装考究，是沟通国际国内情谊的高雅礼品和品位高、数量少的珍稀藏品。今年 12 月 4 日当众毁模发售。起售价待定，早付款者优先理想号码。欢迎中外人士尤其是收藏家、企业家、出国人员踊跃预定。

监制发行单位：徐继畲学术研究会

联系人：任复兴

地址：山西省忻州日报社 邮编：034000

电话：0350-321854（办） 339899（宅）

传真：0350-339371

开户行：山西忻州市工行忻办

帐号：4402641560200

# 长眠异国的中国女外交官

● 宗道一

20年前的一个风和日丽、天朗气清的春日，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郊万国公墓里，破天荒地竖起了一方中国人的墓碑。

3年后的一个天高云淡、凉风习习的初秋，墓主的部分骨灰撒在了人间天堂杭州的西子湖里……

这位中国人就是科伦坡中国大使馆的女外交官，她的名字叫陈依弥。

——作者题记

说到外交官，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他们西装、革履、珠光宝气；或者觥筹交错，举杯欢饮；或者迎来送往、交游四方……。但是，你可曾知道他们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长眠在异国大地上的陈依弥的名字，也许不为人们所熟悉，但在外交部，在驻斯里兰卡中国使馆，很多人至今仍记得这位英年早逝的女外交官。

1. 前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二等秘书陈依弥祖籍广东中山县，1928年5月30日出生在上海静安区一个并不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为人正直的父亲是一个铁路桥梁工程师。美丽端庄、温良贤淑的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陈依弥靠着父母的省吃俭用，靠着自己的刻苦勤奋，她在中西女中毕业后考上了著名的圣约翰大学。1950年毕业后，陈依弥跨进了北京外交部街33号那幢德国式建筑的大门，被分配到外交部办公厅的秘书处从事英文口、笔译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陈依弥被派到冰天雪地的朝鲜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代表团，担任英语译员工作。几个月后，她又回到外交部。陈依弥一口流利的无可挑剔的英语，使她成了外交部译事口最具资历的译员。她先后参加了1954年、1962年两次日内瓦会议，表现不俗。

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不久，陈依弥奉命第二次入朝。此时朝鲜已完全实现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在开城设立联络处。陈依弥被派到志愿军代表团驻开城联络处，担任翻译工作。

陈依弥第二次朝鲜之行，对其一生是至关重要的。

在北京站的钟声催动了待发的列车之际，陈依弥在开往平壤的火车上与后来成为自己夫君的王嵎生不期而遇。

2. 在开往平壤的列车上，王嵎生第一次见到了温和热情的陈依弥，俩人一见钟情。爱情的种子在板门店“三八线”上发芽……

王嵎生出生在安徽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年轻寡母坚韧不拔的性格在王嵎生幼小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人格力量一直鼓励着王嵎生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王嵎生高中毕业后便来到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进入浙江大学中文系学习。未几，朝鲜战争爆发，党和政府号召青年踊跃参加志愿军，保家卫国。当时，王嵎生正是迷恋于诗歌的文学青年，但他毕竟是系团总支的干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王嵎生毅然投笔从戎。他在校刊上还发表了思想转变的文章，不少同学受到了启发。只是体检不及格，功亏一篑，王嵎生未能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而是跨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的校园。

当陈依弥在日内瓦美丽的莱蒙湖畔大显身手之际，王嵎生完成学业分配到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几个月后，奉调前往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驻开城联络处。

王嵎生一行三男一女，这女性不是别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令王嵎生至今仍怀念不已的陈依弥。北京站的钟声像往常一样催动了待发的列车。王嵎生登上北去的列车时，他第一眼就看见了热情善良、像大姐一样的陈依弥，以及她那张虽不美丽但却文静可爱的脸庞。陈依弥那甜甜的一笑，那深情的一瞥，令王嵎生终身难以忘怀。

当列车缓缓驶出古老的北京站，王嵎生与陈依弥已经毫不生分。身材高大的王嵎生也拨动了陈依弥的少女情怀里最隐秘的那根琴弦。

幼年丧父的王嵎生本来就有恋母情结，他从陈依弥身上找到了那企望已久的爱，年轻的心好像在被悄

悄地叩击着。王嵎生忆及往事这样写道：“她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英语很好，同时又会英文速记。而我是刚从外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英文水平很低，连英文打字都不会。她耐心帮助我，几乎成了我的老师。她长得并不十分美丽，但却很甜，脸上经常带有一丝阳光般的微笑。人们同她相处，总感到一种体贴、温暖和愉快。”

王嵎生和陈依弥一对意深情长的儿女，在异国他乡的板门店“三八线”上奏出了浪漫的爱情曲。他们爱得那样深情，那样和谐，那样投入，那样炽热！像山涧淙淙的清流，像小夜曲，像交响乐……

热恋中的年轻男女充满激情，充满幻想。王嵎生、陈依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常常肩并着肩、手挽着手，或依偎着漫步在开城郊外的乡间小路上，竞相拥着在群山怀抱的地方追逐夕阳的余晖……。有时不知不觉，他们竟接近了警戒线，直到志愿军岗哨大声吆喝，方才止步……。时间长了，可爱的哨兵常常与热恋中的王嵎生、陈依弥开玩笑：“你们是要爱不要命！”是啊，超越了生死的爱才是永恒的。

1956年对陈依弥的一生来说都是很难忘记的。就在这一年，她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并和真心相爱的王嵎生喜结良缘。那一年，这对热恋中的有情人双双离朝返国。

爱情的果实终于在金色的秋天成熟了。王嵎生、陈依弥精心挑选了志愿军入朝的日子——10月25日，举行了热烈而简朴的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了纪念“三八线”上这段生死恋，当他们的爱情结晶——第一个孩子在科伦坡呱呱落地以后，夫妇俩便给他取名“朝华”。既是象征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也是对他们真挚相爱相知而结合的一个纪念（朝华即朝花，爱情的花朵是在朝鲜大地上盛开的）。

3. 1957年2月，中国与锡兰（即斯里兰卡）正式建交。未几，王嵎生、陈依弥夫妇经香港前往科伦坡参加建馆工作。工作很繁忙，儿子、女儿亦相继出世。王嵎生、陈依弥夫妇过得很充实，幸福恩爱，充满情趣。夫妇俩几乎跑遍了整个锡兰岛，他在南方城市亚拉国家野生动物园乘坐吉普车，从近处观赏绿色斑纹的母豹；亦曾在落日余晖里遥望公象、母象在湖畔亲吻戏嬉，像情侣一样耳鬓厮磨，如胶如漆。他们还来到世界闻名的军港亨可马里，遥望那矗立在海边的“情人石”，倾听当地老百姓讲述那动人的故事。

1961年，王嵎生、陈依弥夫妇双双离任。陈依弥回国后不久，忍痛抛下初生的女儿，匆匆前往瑞士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她永远忘不了记忆超人、体恤下属

的周恩来的那种人情味。早在50年代初期，陈依弥就在日内瓦一仰周恩来充满魅力的风采。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有关方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盛大联欢晚会。在共舞一曲时，周恩来亲切地询问陈依弥：“你爱人来了没有”？陈依弥笑笑说：“没有”。周恩来一听不平地说：“这太不平等了，为什么男同志可以带妻子参加活动，女同志就不可以带丈夫呢？”陈依弥心头不由得热乎乎的。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陈依弥与夫君王嵎生第二次前往科伦坡中国使馆赴任，分别为二、三秘。王嵎生担任使馆调研室主任；陈依弥在使馆办公室，负责交际、礼宾和文书工作。由于大使馆尚未设武官处，陈依弥还负责与军方联络，处理有关军援问题，因而被戏称为“女武官”。同时，大使遇到重要活动，还得请陈依弥担任译员。

由于工作出色，陈依弥和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建立了极为友好融洽的关系。中国医疗组到科伦坡为班达拉奈克夫人治病，整个过程的联系工作都是陈依弥负责并担任英文翻译。她不辞辛劳，工作细致入微，得到了斯方工作人员乃至高级官员们的一致好评和赞许。班达拉奈克夫人对陈依弥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她甚至明确交代总理府的门卫，只要中国大使馆的陈女士来访，可以不经通报，直接到她的住处来。陈依弥的辛勤工作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在科伦坡很多政府官员都知道陈依弥是“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贵宾”。

在使馆内，陈依弥对同志随和谦虚，体贴细心。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的领导、同志、部属都异口同声说，她人好、工作好。可是老天偏偏不公。

1974年底回国休假结束准备返回科伦坡前夕，陈依弥忽然得了重感冒，伴有发烧。王嵎生考虑到使馆年终总结即将开始，而且机票已经买好，所以主张按期返馆。一向柔顺迁就的妻子听从了丈夫的安排。数年后，陈依弥唯一的女儿王兰清在怀念妈妈时这样写道：“出国的日期又到了，可妈妈却卧床不起，得了重病，高烧达39度。姥姥劝她把出国日期推迟两天，家里人以及来看妈妈的同事也都这么说。我给妈妈倒了杯水，说：‘妈！有病就过两天再走吧！就两天。’妈妈从床上坐起来，接过开水，只是摇头说：‘不行呀，任务紧迫。’这声音尽管微弱，却使人感到她的决定已是不可更改了。”“那天下午，妈妈真的要带病出国了。我和弟弟想去机场送妈妈，可她却说：‘你们还是上学去吧！’她用滚烫的手拉着我说：‘要好好学习！’我背起书包，又回头仔仔细细地看了妈妈一眼；她的脸上尽管带着病

容，可神态还是那样和蔼，那样坚毅。然而谁能意料到这竟是我亲爱的妈妈的最后告别呢！万万没有想到，妈妈到斯里兰卡不久，就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飞机降落在卡拉奇机场已是半夜两点。陈依弥的病情加重，呼吸急促，后来才明白感冒已转为病毒性肝炎，迸发心肌炎！异国他邦，举目无亲！望着陷入昏睡的妻子那苍白的脸庞，心如火焚的王嵎生急得流下了眼泪。间或睁开眼睛的陈依弥总是微笑着断断续续劝慰丈夫：“没关系……我挺得住，……到……到科伦坡就好了……”她依然那样温存安详，好像没有一丝痛苦。

清晨5点，飞往科伦坡的巴航班机自卡拉奇机场起飞。中午11时，当飞机徐徐降落在科伦坡机场时，陈依弥差不多已经不省人事。王嵎生先找机场医生看了一下，使馆接车便以最快速度将陈依弥直接送到医院抢救。

遗憾的是这天刚好是星期天，主治医生不在医院。呼吸急促、浑身发烫的陈依弥紧闭双眼，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她顽强地与一步一步逼近的死神搏斗着。她放不下自己热爱的外交工作，放不下自己挚爱的丈夫，放不下钟爱异常的女儿和两个可爱的儿子。但是陈依弥再也没有醒来。半夜里，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医生也赶到了。但为时已晚，纵然扁鹊、华陀再世，也难妙手回天。当第一缕阳光照进静静的病房时，陈依弥已是气若游丝。清晨5时，陈依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从飞机抵达科伦坡才过去18个小时，短短的18个小时！陈依弥宝贵的生命就这样在她工作、奋斗了8年之久的斯里兰卡永远结束了！她走得是那样匆忙！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望着她那紧紧阖着的、往日充满爱意的大眼睛，所有在场的人都流了泪！

王嵎生的眼前天昏地暗，他的脑袋里一片空白。这真是晴天霹雳。18年恩爱夫妻，朝朝暮暮，卿卿我我，难道就这样一朝永诀，不说一声再见？好几天过去了，王嵎生总以为自己置身于梦中，但是残酷的现实是，他与陈依弥从此永远分隔在两个世界里。

伤心至极的王嵎生无法承受这生离死别、天人永隔的无情事实，他茫然若痴若呆，卧床整整一个星期！

4. 斯里兰卡高伯拉瓦总统夫妇、班达拉奈克夫人沉痛悼念中国女外交官陈依弥。她的部分骨灰永远留在了斯里兰卡炽热的土地上。

陈依弥突然逝世，在斯里兰卡各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部长以及海陆空三军司令、参谋长纷纷前来吊唁致哀，络绎不绝。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特地让女儿送来花圈，她在致中国大使的唁函

里极为真挚地写道：“惊悉陈依弥女士突然逝世，深感悲痛。她在去华渡假后到斯里兰卡才十几个小时就去世，使我尤为难过。我曾多次和已故陈依弥女士见面，她的纯朴和友谊一直使我感动。……”

中国大使馆笼罩着一片悲哀。好几个月过去了，那种悠悠深长的哀伤、缅怀之情依然没有褪去。当时的使馆工作人员张成礼写道：“陈依弥同志去世三个多月了，使馆的同志们还常常谈起她，怀念她在世时对大家的关心，怀念她的革命热情和认真的工作作风，对她的去世深感惋惜。她活着时亲手栽种、培育的幼竹已经长大。每当大家散步、从旁经过时，很自然地想起依弥同志。同志们对她的赞语，她若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20年弹指过去，如今已成为中国第10任驻斯里兰卡大使的张成礼同志重回旧地，对故人的怀念依然如初。他和驻斯里兰卡的所有大使一样，年年岁岁在清明时节，率领使馆人员前往万国公墓祭扫长眠于地下的陈依弥……

1974年12月的最后一天，王嵎生捧着亡妻的部分骨灰回到了冷冷清清的家中。13日离家夫妻双双；31日归来，孤身一人，这短短的18天，就好像隔了一个世纪！一路风尘，满腔悲戚，王嵎生睹物思人，可人去楼空！一家人抱成一团，儿呼妈妈，父思妻子，泣不成声！

18天以前，正是自己不顾妻子有病在身，坚持如期返馆，才使她病情迅速恶化，抢救无效，英年早逝！大错铸成的王嵎生真是追悔莫及！他一遍遍地自悔自责，终日以泪洗面……。王嵎生整整吃了半年的安眠药，但是他终于挺了过来。

“我只有把依弥留下的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并且在外交上加倍工作，才能告慰她在天之灵！”王嵎生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对自己说。20年过去了，所幸这两条都做到了。

1974年9月，陈依弥最后一次回国休假，王嵎生曾陪她一路下江南，饱览了黄山、西湖胜景。多少年过去了，王嵎生一想起这永别前的度假，心里就一阵难过。“就让依弥与西湖朝夕相处吧！”1978年深秋，王嵎生陪同访华的铁托总统访问杭州。在苏堤望山桥堍，王嵎生轻轻地打开骨灰盒，“依弥，你就和西子湖的碧水常相伴吧！”禁不住又是清泪涟涟。在略有凉意的秋风中，依弥芳魂的灰埃纷纷扬扬洒落在微波荡漾的西子湖里，仿佛她也在向心爱的夫君诉说着别后衷肠……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盛世天子李隆基与“救时之相”姚崇

●艾子

(1) 公元713年，被后世誉为“盛世天子”、“风流三郎”的李隆基，在践登大唐皇帝宝座一年多后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但是，以当时的情势而言，定年号为“开元”是否就意味着是“政道惟新”的开端，还很难预料。

李唐王朝在隋炀帝留下的烂摊子上创业后，励精图治，尤其是有一代明主之称的唐太宗，更是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使大唐处于国势强盛、社会安定的蒸蒸日上时代。685年，李隆基降生时，即躬逢盛世。但是，盛世王子却不能拥有逍遥一生的盛世环境。

隆基出生的前两年，他的祖父高宗李治在久病之后撒手人寰，早已插手政事的武则天已掌握了唐廷实权。此后，她废中宗立睿宗（隆基之父），690年，又废睿宗而革唐命，自立为“大周圣神皇帝”。在这一过程当中，李唐宗室布满了血腥杀戮的恐怖气氛。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的皇子，除武则天自己生的李哲（中宗）、李旦（睿宗）之外，其余在世的全部被杀。“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

李旦一家虽然免遭杀戮的命运，但在宫中也过着被软禁的生活。到了692年，武则天因为齿落更生，心情愉快而改元长寿，才容许隆基兄弟有一些独立活动的权利。但是，这年7岁的隆基，却不知深浅地挑起了武则天称帝后李、武两姓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

隆基开府置官属后，将自己的车骑仪仗整训得庄重威严，遭到了武则天的伯父的孙子武懿宗的嫉妒，便用金吾将军纠察风纪的权力，折一折隆基的威风。不料，隆基对这个正趾高气扬的武周新贵并不买账。他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责问：“吾家朝堂，干尔何事？”

当时的朝堂已属武姓，隆基的这番话自然召来了武姓人的群起攻击。事情捅到武则天那里后，她不但没有对隆基兴师问罪，反而对他的这种敢作敢为的气质大为赞赏，“特加宠异之”。尽管如此，武则天对任何敢觊觎武家朝堂的行为却不能容忍。一个月后，她借故杀掉了隆基的生母窦氏，隆基兄弟也受到株连而被降爵，并再一次被软禁宫中。

705年，武则天在被迫退位后的郁闷中，悄然离开了人世。复辟的中宗虽然重举李姓大旗，但却无法摆脱武则天统治时的阴影。他的妻子韦后，以婆婆武则天为

榜样，也在做着登上皇帝宝座的美梦，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集团的势力又借此东山再起。武三思身居相位，掌握朝中大权，武、李纷争使朝中的矛盾又一次激化。隆基兄弟还没有来得及分享重为王子的喜悦，就被赶出了长安。

隆基以别驾的职务来到潞州（今山西长治），其郁闷的心情是难以排解的。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消沉，迭次的逆境和厄运使他的性格更加勇敢倔强。他在恣情于山水之间的同时，也在耐心地等待着为李唐王朝建功立业的时机。

709年，隆基以参加中宗祭南郊太典为借口，返回长安，投身到宫中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了。第二年，中宗被自己的爱妻韦后和爱女安乐公主合谋毒死，李家王朝又一次面临着江山易姓的局面。此时，经过多年厄运磨练在政治上已经很成熟的隆基，决定担当起救大唐江山于倒悬的重任。他联合中宗的妹妹太平公主，经过周密的准备，在6月20日晚发动宫廷政变。诛灭韦氏势力，重将父亲扶上皇帝宝座。睿宗在登位的第三天，即将平定内难有功的隆基立为太子。

虽然经过此次政变，大唐政权出现了转机，但是，女主干政的阴影并没有完全被驱散。在诛灭韦党、拥立睿宗过程中立有功勋的太平公主，又步武则天的后尘，干预朝政，这就必然与维护李唐王朝的隆基产生矛盾。太平公主对隆基英明干练的性格多有了解，她知道，要想达到目的，首先必须废除隆基而改立一个懦弱的太子。于是，她开始攻击隆基。姑侄之间的争斗日趋尖锐。

在此过程中，英明的睿宗采取逐步让位的办法，将权力移交给隆基。712年7月，他借慧星出现的机会，冲破太平公主的阻挠，将皇位让与隆基。太子既成为皇帝，要诛灭太平公主的叛乱，在政治上已占有名正言顺的优势。

聪明的隆基对父亲的安排心领神会。在7月初三天，即向姑姑发动了进攻，出其不易地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一网打尽。至此，隆基才真正拥有了皇帝的权力。

28岁的隆基虽然有重开大唐新纪元的雄心，但是，自武则天时开始的多次政变，已将以宰相班子为首的统治集团搞得七零八落，隆基要“政道惟新”，就必



须重组领导班子,而这个领导班子由谁担纲,则颇让他踌躇。其实,他的心中早已有一个人选,让他踌躇的原因是,此人能否应召即来。

这个人就是在武则天、中宗、睿宗三朝出将入相、两次执掌朝政而又被自己贬黜的姚崇。

(2) 此时的姚崇虽已 63 岁,但不论是按现在的说法还是依其政绩来衡量,他仍是年富力强的领导者。

史书上对这位三朝老臣许以“吏道敏捷”、“善应变成务”、处理政事“剖断如流,皆有条理”的评价,依其政绩来看,确实不是浪得虚名。

自 677 年姚崇以文采进入政界以来,由地方而中央,由文官而武官。相当广泛的经历,使他成为一名政绩卓著的成熟的政治家。更为可贵的是,他有不阿附权势、敢言直谏的性格。在武则天时代,当酷吏政治横行天下、人们只能道路以目的情况下,他却坦言向武则天直谏诏狱冤滥的实情。他指出:所谓谋反案件,都是酷吏罗织而成。只要停止酷吏,他愿“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反复者”。他的谏言获得了武则天的赏识,直接促成了酷吏政治的结束。在睿宗朝,正当他以果敢的胆识,整肃吏政,革除遗留弊政的时候,隆基与太平公主的争斗激化。他虽然极力维护隆基的正统地位,但隆基却为保全自己一脚将他踢开了。

以玩弄权术为乐的太平公主,在欲废隆基而改立太子时,首先在光范门将其意图告诉了宰相,力图得到他们的支持,但以姚崇为首的宰相们则激烈反对。太平公主为达到目的,决定在改组宰相班子上下功夫。姚崇和宋璟则针锋相对,秘密上奏睿宗,请将太平公主调离中央,到东都洛阳安置。睿宗接受了这一建议。

不料,事不机密,太平公主得知后,大发雷霆,并指责隆基。而隆基慑于当时太平公主的淫威,为保全自己,将姚当成马前卒加以牺牲。他上奏说,姚崇离间他们姑、侄之间的关系,罪不容诛,请求父皇降旨处死。

睿宗知道,隆基此举,虽是在诛灭太平公主时机尚不成熟之际的权宜之计,但若将他处死,将大失人心。于是,他朱笔一挥,改贬他为刺史,让他远离京城。

年轻的皇帝与姚崇的这一段过节,不但使皇帝心中有愧;而且肯定在姚崇心中留下不愉快的阴影。正因为如此,玄宗在准备起用姚崇时,很把握不准他的心态,深恐他一口回绝扫了自己的面子。

经过反复的考虑,玄宗利用姚崇喜欢打猎的爱好,煞费苦心地创造了一个与姚崇会面的机会。

这年的 10 月 13 日,玄宗在长安近郊的骊山,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军事演习。此举固然是为了显示自己新

登帝位的威风,但将讲武地点选择在骊山,则是因为离此不远的同州,正是姚崇任职的地方。

次日,玄宗即中断演习,宣称要到渭川打猎,并命使者召同州刺史姚崇相陪。一切做得不露痕迹,玄宗终于与这位老臣在打猎这样比较随便的场合相见了。

史书中对这次重要的会见,留下了生动、细致的记载,为后世为政者留下了一段足资借鉴的佳话。

当姚崇向玄宗行礼后,玄宗即仿佛是随意地问:爱卿会打猎吧?姚崇回答道:我小时不知读书,整天以打猎为乐;此后虽因折节读书并任将相,无暇为此,而且现在也老了,但这身本事还是没有丢掉的。

以姚崇的精明,当然会明白玄宗这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作法。这一番话,也以打猎为题,却琵琶反弹,顺口道出自己还可为国事谋划的志向,也给皇帝留下了保全面子的台阶。

玄宗自然明白,但既然是以打猎为借口,则不妨将气氛营造得更真一些。于是,传旨手下,放猎犬相随,两人拍马而行。沉默许久,玄宗才抬起了话题。他试探地问:许久没有见到爱卿了,每当朝中有事时却老想起爱卿,不知爱卿可否愿意再回到宰相班子来。

姚崇听到后,沉默不语,却将马速放慢,落在了玄宗后边。玄宗也只得放慢速度。过了许久,还不见姚崇前来,便停马回头问道:爱卿为什么走得这样慢?

姚崇答道:臣作外官已经很久了,不适合再进入宰相班子了。玄宗听后说道:那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怎么样?

其实,在唐朝,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即是宰相的职务。玄宗在此换个说法,是试图以幽默的口气,来冲淡姚崇因他而从宰相位子上被贬的不愉快的经历。不料,姚崇则既不点头,也不摇头,这使他很是尴尬。

尽管如此,皇帝并未对他的沉默报以冷面,此时反而赐坐。姚崇当然明白皇帝的良苦用心。他跪奏道:刚才臣之所以既不奉诏也不称谢,是因为臣有为政的十事要禀奏。如果陛下认为不可行,臣则不敢奉诏。

姚崇的口气虽然十分恭敬,但显然是在与皇帝讲条件。这种带有要挟意味的行动,不仅在历史上不多见,即令在今天恐怕也难以行得通。但是,玄宗却雍容大度地说:爱卿不妨细细陈述,如果朕能量力而行,再作决定如何?

见皇帝如此礼遇,姚崇便放胆进言,提出了十项为政的纲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事要说”。这十件事是:先仁义后刑罚;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宦官不准参与公事;国亲不作台省之官;废除原有冗官;对近密幸之徒严格执法;除租庸、赋税外,杜绝各方贡献;禁止

建造寺观宫殿；君臣之间以礼相接；容许大臣犯颜直谏；本朝外戚乱政之事情，请书于史册，永为殷鉴。

这十件事都切中时弊，与皇帝心中所思不谋而合。在皇帝的一连串的许诺声中，姚崇才起而再拜，三呼万岁。皇帝扶起这位老臣，执手而坐，一时相顾无言，泪眼汪汪。随行的官吏也为这幅感人的求贤画面所激动，纷纷落泪。

(3)进入中枢领导机构的姚崇，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国事之中，皇帝也给予积极的扶持。两人相得益彰的配合，给后人留下了津津乐道的佳话。

在以姚崇的“十事要说”为纲领，对朝政积年流弊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皇帝每做出一项决定，都要与姚崇商量。有一次，天下大雨，宫中道路泥泞，皇帝急于找姚崇议论朝政。为了不让这位老臣淋雨生病，竟令官使用标志皇帝身分的辇车去把姚崇抬来。与此同时，皇帝也放手让姚崇处理政事。有一次，姚崇就任用郎吏等小官的事向皇帝请示，皇帝两只眼睛只是看着屋顶，不表示任何意见。姚崇又提高声音说了一遍，皇帝仍然一语不发。姚崇只好既惶恐又尴尬地退朝。在一旁陪伴的高力士见状，小心翼翼地上前问皇帝：刚才宰相请示公事，陛下为何一言不发？皇帝回答道：朕任姚崇为相，是让他辅佐朝政。如果是处理军国大事，他应当向朕请示，朕也可以与他一起决定。像任用郎吏这种小官，他自己完全有权处理，何必事事都来向朕请示呢？

高力士将皇帝这番话告诉了正提心吊胆的姚崇后，姚崇十分感谢皇帝对自己的重用。朝中大臣闻此事后，都认为皇帝有人君之大度，懂得任人之道。这样，也在宫中树立起了姚崇担纲执政的地位。

“士为知己者死”。为感念皇帝的知遇之恩，姚崇在处理政事的过程中，在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同时，也极力维护皇帝的形象。在皇帝与姚崇联手治理国家伊始，大唐帝国即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713年的秋冬，天气干旱无雨雪，转年即出现“人多饥乏”的严峻形势。大旱之后，常有蝗灾。紧接着，在715年6月，山东诸州即发生了大蝗灾。在这毁灭性的自然灾害面前，老百姓除了烧香礼拜恳求老天爷保佑外，却不敢捕杀。而与此同时，在朝中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当时人们普遍崇尚佛道和妖异灾祥的情况下，捕杀蝗虫无疑是与老天爷的意志相违背。所以，当姚崇提出全力灭蝗的主张时，虽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却遭到了朝野内外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反对。就连平日尸素相位有“伴食宰相”之称的卢怀慎，也发表了反对意见。

在纷纷扬扬的反对声中，皇帝也犹豫了。姚崇再次

面见皇帝，指责庸儒不通时变，并引用历史教训，说明如不灭蝗，百姓将会面临饥饿，事关国家安危，决不能拘泥于经文。同时，他又从体贴皇帝的尊严出发，勇于为此事承担责任。他说：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劳陛下传旨令行，由臣来出牒号召。如果有闪失，请陛下削除臣的官爵；如果引起变乱的话，罪责由臣一人来承担！

面对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皇帝在感念之余也重新坚定了灭蝗的决心。他在朝议时对群臣道：灭蝗救灾的事情朕已与贤相议论已定，立即实行，如再有人进行非议，将处以死刑！

虽然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灭蝗救灾的举动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是，姚崇的为国忘身和皇帝的体恤宰相的行动，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了彪炳史册的大唐盛世产生的原因。

这一对贤君明臣固然感情笃深，但当明臣的行为与国家法律相悖时，贤君却并不以情遮眼。716年，姚崇的两个儿子依仗权势，接受贿赂，为时人所抨击。姚崇以亲情为重，在皇帝面前为儿子开脱，皇帝对此颇为不满；而当姚崇的亲信、主书赵海接受胡人的贿赂的事情被人揭发，皇帝亲自审问并令下狱处死时，姚崇却竭力为其求情。皇帝对姚崇循私妄法的行为并不姑息，并对他不具有高风亮节的情操感到遗憾。这样，姚崇只好离开了相位。

但是，令人称道的是，皇帝并未因为此事而将姚崇一脚踢开，遇有大事仍然派人到他的住处听取意见；而姚崇也没有因此对皇帝耿耿于怀，对国家大事采取撙节挑子的态度。当姚崇晚年生病行动不便时，皇帝便索性让他享受到中书省居住养病的待遇。姚崇觉得不妥，便推辞不去。皇帝却道：让你住在那里是为了国家，朕恨不得让你住在宫中才好，你又何必推辞呢！君臣为国事同心同德，那段不愉快的过节仿佛已烟消云散。

(4)721年，姚崇病情加重。弥留之际，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很想听一听他人的看法。他曾问舍人齐澣：我作宰相，可比何人？可否与古代的贤相管仲、晏婴相比？齐澣认为比不得，但又说：相公可称“救时之相”。姚崇听后，欣慰地说：救时之相是难得的呀！

此后不久，大唐帝国度过了“救时”的难关后，前途平坦，玄宗皇帝实现了开一代新纪元的愿望，成为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天子”。而与此同时，玄宗的锐意进取之心也渐渐丧失，终于酿成了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玄宗也由盛世的巨人变成侏儒。历史的发展又一次为“成于忧患、败于安乐”的古训，提供了鲜明的注脚！

姚崇地下有知，定当长歌当哭！（责编：萧徐）

# 为世妇会献上炎黄赤子一片心

● 吴 塘

8月17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女子诗书画家联谊中心、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假全国妇联办公大楼举行仪式,向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敬献书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出席世界妇女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慕华出席献书画仪式。炎黄女子诗书画家联谊中心名誉理事长袁晓园、理事长李宝光 and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启琮在会上相继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成立于1993年12月的炎黄女子诗书画家联谊中心,是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下,由一些当代女诗书画家自愿组成的群众性联谊组织。旨在弘扬中

国诗书画传统,特别是承继历代女杰为诗书画坛所作的贡献,抱着“不输男子”的壮志,“展天资,娥眉竞雄,勇舒龙蛇神笔”,共谋中华民族诗书画艺术的发展。1995年元月6日,炎黄女子诗书画家联谊中心在海南三亚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期间,与会理事和特邀嘉宾共同发起,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创作巨幅图画:《百花赞》。此画由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欧初开笔,著名画家汤文选总其成,参加创作的有来自各地的书画家林凡、周皎、徐家凤、江恩莲、唐璧珍、王琇等。李宝光题写画名,袁晓园老人题诗。诗曰:“笔底云飞舞大风,画尽千山万壑松,最难画是百花圃,

朵朵枝枝竞艳中。”以百花争艳寓全世界妇女事业的欣欣向荣。

这次敬献的另一巨幅国画,是由袁晓园题词的《孔雀展翅,百花争荣》。作者中有女界知名人士和画家胡絮青、萧淑芳、刘继英、郁风、梁洁华(香港)、周玉玲(澳门)、徐家凤、关曼青、李伟芳、王玉珏、苏华、江恩莲、潘景晴、吴光光等。

同时参献的书画,还有开映月书写的欧初长诗《今逢妇女年,我歌自愉悦》、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女书法家和诗人的集体创作《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诗词书法》、丁云青的寓意富民强国的牡丹和鲍红以“平等、发展、和平”为题的剪纸。

## 《三月风》征订启事

在青春的旅途上,《三月风》以一双真诚的眼睛关注你;关注你的人生命运;你的人生价值;你的自我追求;你的人生体验和思索;你的权益和需求。《三月风》奉献给你的是一片真诚,留给你的是一份青春的记忆……

《三月风》贴近现实,辟有:瞭望中国、人道经纬、人生短笛、心灵驿站、环球采风、两性世界、生活空间、维纳斯星座、文字众生相、社会冲击波、文化观察台、人际多棱镜、人在旅途、世间百态、心理沙龙、医林一绝等众多栏目,一册在手,尽览社会、人生;一旦相识,永难分离。

《三月风》16开48页,每册1.20元,每月3日出

版,国内统一刊号:CN11-1025/C,邮发代号:2-546,各地邮局订阅、零售。本刊办理邮购,可破季订阅,如有漏订和订阅不便的读者,也可直接向本社发行部汇款邮购(请在附言中写明刊物名称、期号、订购数和收刊人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本刊全年定价14.40元;邮购每册加邮寄包装费0.15元,国外代号:M-777,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总发行。

现尚存少量1987年、1989年、1990年、1991年、1992年的合订本,每本5元。1993年合订本,每本15元。1994年合订本,每本20元。

我社发行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惠新里甲8号,

邮政编码:100101,联系人:朱京华

发行部电话:(010)422.7842

## 膏药神奇除“消渴” 医术精湛治“噎膈”

● 冯海潮

世上多一位名医，人间便少一份苦难。北京鼓楼东大街空军后勤部医院的特色门诊部虽小，但对糖尿病、食道癌确有特殊医疗技术和药物，使很多糖尿病患者恢复了健康，使不少食道癌患者病状明显减轻。

这个特色门诊部自1993年3月开诊。应诊大夫是著名中医王申和他的女儿王胜霞。糖尿病中医称为“消渴症”，是当今威胁人类健康的四大难症之一，发病者中老年居多。是一种内分泌失调的疾病，主要表现为血糖升高及糖尿，严重的出现酮尿、酸中毒、昏迷。该病起病缓慢不易发现，主要病状为三多（多饮、多食、多尿），消瘦无力，久而久之，还会出现肢体麻木、皮肤及会阴干燥瘙痒，性欲减退，月经失调等并发症，而且老年人易促发白内障。

王申大夫出身于中医世家，他曾祖父王剑曾是中原一带名医。在祖辈的熏陶下，他自幼便立志继承祖业，做一名医德高尚的中医师。他对传统医学专著不是死搬硬套，而是取其精华，剔除糟粕；在继承自家医理时，也不一味照搬，而是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使理论不断充实完善，形成独具特色，富有成效的医术，解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

前来门诊部求医的患者越来越多，他除了具有精湛的医术外，还因为他为人正直、热情，对病人一视同仁。1993年9月，在参加全国糖尿病研讨会期间，山东淄博一位转业干部慕名前来就诊，突然发现随身携带的500元人民币丢失了。王大夫对他说：“您先治病，其他的事不要管了。”该患者住了十几天院，病情好转后出院，在临走时拉着王大夫的手说：“你真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一位从四川来的患者，用了“王氏消渴膏药”很快就得以康复。他激动地说是：“王大夫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了生命。”

今年7月的一天，61岁老人苏起龙先生顶着烈日来到空军后勤医院找王申大夫，苏老患糖尿病已四年之久，身体消瘦，少气无力。他自述服用过多种治疗糖

尿病的药物都不见效，仍感到口干、口渴、头晕，视力模糊、汗多、烦躁、皮肤刺痒，血糖在357mg%，尿糖四个加号。王大夫为他诊脉后，给老人开了“王氏消渴膏药”，针炙气海穴后贴敷上膏药。经过几次治疗，一个月后，苏老的口干、口渴、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消失了，血糖降至252mg%，尿糖降至两个加号。最让老人高兴的是把不必注射胰岛素了。

王大夫医好的病例无计其数，他们来电话或来信向王大夫表示感谢。

“王氏消渴膏药”所以有奇效，是该药选用上好的名贵中药阿胶、藏红花、海龙、海马、珍珠粉等精制而成，具有降低血糖、修复脏腑功能、培源固本的作用。

王大夫除对糖尿病有独特的医疗技术之外，他研制的“噎膈含化丸”、“噎膈回春膏药”对恶性晚期食道癌患者有显著疗效。

今年7月30日收到衡水车务段75岁的李玉玺老先生的来信：从7月21号王大夫给贴敷“噎膈回春膏”，22日又口含“噎膈含化丸”后，这几天感到精神好多了，打膈明显减少，睡眠好多了，进食很顺利，饭量已接近正常。他说是王大夫把他从病魔中解救出来。家住宣武区的姚云鹏先生也已64岁了，1993年9月进食受阻、疼痛，在301医院作透视及胃镜检查，确诊为食道上段癌症晚期。经放疗效果不佳，每天只能进一点流食，而且还疼痛、咳嗽、吐大量的白色粘液、咽干、精神很差。家人陪他来到空军后勤部医院找王大夫求医。三天后打来电话说，自从用“噎膈含化丸”和“噎膈回春膏药”治疗后，病情明显好转，能顺利的进食，咳嗽也好多了。由于病情好转的这么快，精神也好多了。他说：“以前大夫说我只有半年的活头，现在看来，我再活他个几年没问题。因为能吃饭就能维持生命，我要继续用“噎膈含化丸”和“噎膈回春膏药”治疗。”类似的病例数不胜数。食道癌患者通过用“噎膈回春膏药”贴敷气海、关元、足三里穴，使脏腑气机得到调理、气血得到活动，有通结散结之效。再配合口含“噎膈含化丸”用来泄热降浊，祛痰开窍，开郁理气，活血化瘀、益气固本，能起到独特的疗效。“噎膈含化丸”和“噎膈回春膏药”已通过中国中医学会专家的鉴定，于同年获得国家专利局专利公报上公告。并于同年5月在“王氏消渴膏”的基础上研制出了“糖尿病药袋”，送往美国，参加国际新技术产品博览会，并荣获了特等奖。

空军医院地址：北京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

邮 编 100720

联系电话 (010) 6775085

联 系 人：王胜霞 冯海潮

# 改善您的第三状态

● 穆 义

现代生活中,由于生活节奏加快、人际关系紧张、饮食结构的不合理等因素,常常使人呈现食欲不振、头疼、失眠、心绪烦躁不安、精神萎靡不振等,然而,就医检查,却未有明显的病变。医学家把这种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称之为人体的第三状态。

人体的第三状态象流感一样普遍,地球上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处于这种状态,对这种状态缺乏认识和预防,往往导致其它疾病的发生。因为,饮食不合理,诸如暴饮暴食、早餐随便或不吃早餐、挑食等都会损害脾胃功能,导致机体内营养成分的缺乏,使机体脏器处于饥饿状态,会使大脑缺氧,影响肾上腺素、生长激素的正常含量,严重者便会产生情绪抑郁、心悸、乏力、食欲不振、视物模糊等现象,久而久之可能发展成为各种疾病而后患无穷。长期接触环境中的有害因子,工作紧张、不良刺激、夜班工人生物钟转移、嗜烟、酗酒等同

样也会使人体机能紊乱,出现第三状态,降低工作效率。

如何预防和消除第三状态、防止疾病的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合理饮食、避免或减少有害因子的侵害、消除不良情绪的刺激、戒除不良嗜好是一个重要因素,但配合药物保健会收到更好的效果。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所长来辉武教授依据祖国传统医学理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元气充沛、脏腑强盛”等基本观点,在总结前人养生保健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内病外治的方法,选用数十味地道天然中草药精心研制而成的505神功元气袋,具有健脾益肾、调整气血、通经活络,平衡阴阳的功能,长期使用,可增强体质、改善微循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强机体的抗病、防病能力。其增强食欲、改善睡眠、调节情绪等作用对改善机体的第三状态,预防疾病的发生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中国咸阳保健品厂独家生产(严防仿制假冒)  
中国医学科学院西安分院医药保健研究所监制  
厂址:陕西咸阳市乐育北路19号  
电话:(0910) 213392 218328 216586  
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研制  
陕西咸阳五〇五医药保健总公司经销  
联系人:周华 邮政编码:712000  
传真:(0910) 218606 电挂:8286  
京卫药宣字 93. (07-323)



# 炎黄春秋



## 宋庆龄与三个美国友人的交往 “文革”后期被扭曲的报人办报

热心引进西方文化的清朝巡抚徐继畲

长眠于斯里兰卡的女外交家陈依弥

盛世天子李隆基与“救时之相”姚崇

轰动天京的“杖责天王”事件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 11-260 邮发代号: 82-290

定价: 1.20元